

## 毛主席语录

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

##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奔赴祖国的边疆，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普及大寨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

在英明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广大青年，继承毛主席遗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

# 从几个例子谈为什么要学点逻辑、 语法和修辞

——代前言

文章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要反映得恰当，在写作过程中必须仔细推敲。一篇文章跟读者见面，总得经过精心的修改，从来没有什么“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好文章。修改文章，首先当然要看观点是不是正确，材料是不是典型，感情是不是健康。其次要讲求安排，看中心是不是明确，条理是不是清楚，等等。此外，还须把文字逐段逐句拿来揣摩，看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例如有这么个句子：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主席台前响起了静下来的电铃。

“基本上到了”是说还有少数人没有到；既然说“都到齐了”，就不能说“基本上”。“基本上都到齐了”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判断不恰当的错误，属于逻辑的问题。“响起了静下来的电铃”含义不明确，是指已经静下来的电铃再响起来呢，还是指响起了电铃来要求大家静下来？这种概念不明确的错误，也属于逻辑的问题。我们思考问题、分析问题都要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在这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律，这就是逻辑的规律。

再看下边的句子：

消息也叫新闻，一般包括导语、主体、背景、结尾等四个部分组成。

这个句子到“部分”为止，意思已经完整；加上“组成”，反而不成话了。如果要保留“组成”，就得把“包括”改为“由”。这属于语法的问题。学习语言，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词，可是光懂得词的含义，不会正确地把它组合起来表达意思，还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这就是说，句子中的词是有规律地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的，不能任意凑合。语法讲的就是组词成句的规律。讲词的类别也好，讲句子的组成也好，都是为了说明这种规律。

下边的句子，从逻辑角度和语法角度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仔细琢磨之后，还是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经过一个上午的奋战，全体指战员把五百多担肥料送到两里多路外的田里。在送肥的路上和棉田里，自始至终洋溢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在送肥的路上和棉田里”说的是处所，“自始至终”指的是时间，两者凑在一起，缺乏了照应。最好把“自始至终”改为“到处”。这种修改属于修辞的范围。修辞上不论是选用词语和组织句子，或运用各种修辞方式，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逻辑、语法和修辞的规律，不是谁规定的，它们是客观的存在。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通常都在运用这些规律，不过不一定是自觉的。我们如果有意识地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在实践中再不断加深体会，就能够自觉地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这对提高表达能力，使写作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是有帮助的。文章写得好不好，首先决定于内容。但是，如果忽视逻辑、语法、修辞方面的斟酌，也会影响内容的正确表达。而

且，出现逻辑、语法、修辞方面的问题，往往跟内容考虑得不周到有关。由此看来，这就不单纯是什么文字技巧的事情了。对语句进行推敲、锤炼的过程，实质上往往也就是对内容进行琢磨思考的过程。

正因为逻辑、语法、修辞方面的问题跟思想内容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不仅是为了写作，为了修改文章。在阅读时，我们也可以运用这方面的知识分析文意，以便更好地理解思想内容。当然，阅读反面材料时，还可以借以发现谬误，揭穿敌人玩弄的诡辩。修正主义者为了贩卖他们的黑货，总是要在语言文字上玩弄花招的：有时隐晦曲折，包藏祸心；有时装腔作势，以假乱真。识破他们，要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揭穿他们的鬼域伎俩，有时也用得着逻辑、语法、修辞方面的知识。

下边我们采取漫谈的方式，把逻辑、语法、修辞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分做五十多个小题目来谈。各题独自成篇，不求系统全面，但也适当照顾篇与篇之间的联系，以便于青年同志们自学。

## 目 录

- 一、从“经验”和“经验主义”这两个概念谈同一律…………… ( 1 )
- 二、从任意转换话题再谈同一律…………… ( 4 )
- 三、从一则寓言谈矛盾律…………… ( 8 )
- 四、从“反动势力的捣乱和破坏是坏事,但也是好事”这句话再谈矛盾律…………… ( 11 )
- 五、从鲁迅的《立论》谈排中律…………… ( 14 )
- 六、从两个例子的修改谈概念的限制和概括………… ( 17 )
- 七、从对书刊的分类谈概念的划分…………… ( 21 )
- 八、从张春桥的“新桃换旧符”的反动实质谈揭示概念内涵的一种方法——释义…………… ( 24 )
- 九、从“这样的整顿,不正是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谈判断的多重否定问题… ( 28 )
- 十、从叛徒江青诬蔑民歌的谬论谈判断的数量范围问题…………… ( 32 )
- 十一、从“大干还是小干,这是关系到是不是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问题”谈判断的主宾相应问题…………… ( 35 )
- 十二、从讨论种柑橘的一段话谈实然判断、或然判断、必然判断…………… ( 38 )
- 十三、从“看云识天”谈推理的前提必须正确………… ( 41 )

- 十四、从三段论只可以有三个概念谈推理中的  
“四概念”错误…………… (44)
- 十五、从两人的对话谈结论超出了前提范围的错  
误…………… (47)
- 十六、从批驳“四人帮”荒谬的理论谈归谬法…………… (50)
- 十七、从一部小说中的一个情节谈排除法…………… (53)
- 十八、从衣服和炉衬谈类比推理…………… (58)
- 十九、从几个数字谈数词…………… (62)
- 二十、从解放前物价的飞涨谈量词…………… (66)
- 二十一、从“干净了每一个角落”谈动词和形容词…………… (69)
- 二十二、从“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谈名词和副词… (72)
- 二十三、从“你一言，我一语”谈代词…………… (75)
- 二十四、从一句话谈结构助词…………… (79)
- 二十五、从几条预测天气的谚语谈时态助词…………… (83)
- 二十六、从“呢”和“吗”的选用谈语气词…………… (86)
- 二十七、从“为了”同“因为”的区别谈表示目的关系  
和因果关系的连词…………… (89)
- 二十八、从“在哈萨克播种小麦而在北美洲收获”谈  
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 (92)
- 二十九、从句子的基本结构谈主语的省略和残缺…………… (95)
- 三十、从“张春桥在狂吠”谈主谓的搭配…………… (99)
- 三十一、从介词跟动词的区别谈谓语的残缺…………… (102)
- 三十二、从一副春联谈宾语问题…………… (105)
- 三十三、从“争夺冠亚军”谈动宾的搭配…………… (108)
- 三十四、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谈修饰语… (111)
- 三十五、从“把竹筏从山区经水路运到加工地点”谈  
“把”字句…………… (115)

三十六、从“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谈“被”字句·····	(117)
三十七、从“革命家长送子务农”谈兼语式·····	(120)
三十八、从“进”改为“蹲”谈用词确切的问题·····	(123)
三十九、从“事情”改为“流言”谈词语的感情色彩·····	(127)
四十、从铁人王进喜的一首诗谈押韵·····	(131)
四十一、从数量词的位置谈语序的安排·····	(135)
四十二、从一段话的修改谈句子的简练·····	(139)
四十三、从一首民歌谈比喻·····	(143)
四十四、从《庐山颂》的开头谈比拟·····	(148)
四十五、从鲁迅的一首诗谈借代·····	(152)
四十六、从词的多义现象谈双关·····	(156)
四十七、从高志扬的一句唱词谈夸张·····	(159)
四十八、从“情意缝在我心里”谈顺连·····	(163)
四十九、从“他信力”、“自欺力”谈仿词·····	(167)
五十、从替“四人帮”画像的几句话谈同字·····	(171)
五十一、从《国际歌》的几句歌词的重复出现谈反复·····	(175)
五十二、从刘禹锡的一首七律谈对偶·····	(179)
五十三、从感情、气势的表达谈排比·····	(182)
后 记·····	(187)



# 一、从“经验”和“经验主义” 这两个概念谈同一律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想方设法要打倒我们党的一大批具有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党政军老干部，他们故意把“经验”和“经验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把有经验的老干部都扣上“经验主义”的大帽子。《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十期《究竟是谁“连形式逻辑也违背了”？——戳穿“四人帮”的诡辩术》一文予以严正批驳说：

“经验”和“经验主义”这两个概念是有原则区别的。“经验”，一般指的是人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积累的实际知识，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而“经验主义”，则是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一个同志具有丰富的经验，是十分可贵的，只要不片面地满足于局部经验，或夸大为普遍真理，就绝不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反党集团，把我们党具有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篡党夺权。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在逻辑上是十分混乱的：它偷换了概念，违反了同一律。

那么什么是同一律呢？同一律是关于人们思想要保持确定性的一条规律。同一律的具体要求是：在同一思维中，人们所运用的概念或判断，必须保持确定的内容，不能任意变

更。违反同一律的错误之一是：偷换概念。

“四人帮”反党集团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故意把“经验”这个概念偷换成“经验主义”的，所以说在逻辑上违反了同一律。

掌握同一律，我们可以用来揭露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一些反动分子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经常故意地偷换概念，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他们偷换概念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经常采取的隐蔽的手法之一就是保留概念的某些语言形式，而把概念的内容偷换掉。修正主义者为了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采取这种卑劣的手法，“四人帮”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就是这样。他曾用这种手法来篡改、歪曲列宁的教导，胡说什么“列宁骂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混蛋’”。列宁果真是这样说的吗？完全不是。列宁在《给阿·马·高尔基》一文中说过：“知识分子从党内逃跑的消息在在皆是。这帮混蛋跑得正好。党清除掉这些市侩垃圾。工人将担负起更多的工作。”很清楚，列宁是说“从党内逃跑的”知识分子是“混蛋”，而根本没有说所有的知识分子是混蛋。张春桥偷换概念，骂知识分子是混蛋，正暴露了他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攻击和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妄图篡党夺权的罪恶用心。

掌握同一律，对我们自己来说，可以自觉地保持思想的确定性。无论写作、讲话或者讨论问题，在同一思维过程中，都要保持概念的统一，自觉地避免或纠正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不遵守同一律，会产生思维混乱不清、不合逻辑的现象。例如：

我这次到农村去，看到贫下中农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不怕艰苦，克服困难，夺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这

使我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思想大有提高。我一定要珍视这次大丰收，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日常工作里去。

这里，“大丰收”出现了两次，但两个“大丰收”不是同一个概念：第一个指的是农作物的丰收，第二个指的是自己思想上的丰收。这样运用概念，不合同一律的要求。如果我们懂得了同一律，就可以自觉地发现和纠正这类逻辑错误了。象上面这个例子，如果把“思想大有提高”改为“思想上也获得了丰收”，再在第二个“大丰收”的前面加上“思想上的”四个字，就合乎同一律的要求了。

## 二、从任意转换话题再谈同一律

上面谈的是违反同一律的一种表现：偷换概念。现在谈谈违反同一律的另一种表现：转移话题。

谈话当中，谈了一个问题以后，转换话题，再谈另一个问题，这是经常有并且完全可以的。但是，话题却不能任意转换。请看下面一段文章：

一次，老沈的爱人看丈夫成天在外面工作，没空顾及家里的事，心里不愉快。老沈知道后，诚恳地对她说：“干革命不是为了荣誉、地位！如果为了表扬、为了地位才工作，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接着就对爱人讲述革命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生动事例，激动地说：“今天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多做些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老沈的启发下，他爱人的思想很快通了，她不仅支持老沈的工作，而且自己也积极参加了里弄工作。

这段文章有四层意思：第一层写老沈的爱人因老沈成天在外工作，没空顾及家事，心里不愉快；第二层写老沈对爱人讲干革命不是为了荣誉、地位等道理；第三层写老沈对爱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第四层写老沈的爱人思想通了，工作也积极了。这里，三、四两层和第一层扣得较紧，但第二层和第一层就联系不上。老沈的爱人“心里不愉快”，是因为“丈夫成天在外面工作，没空顾及家里的事”，根本没有提到荣誉、地

位等问题。显然，老沈转换了话题。这种转换，使人感到突如其来，前言不搭后语。

任意转换话题，在逻辑上就是转移论题，这跟前面一篇谈的偷换概念一样，都是违反同一律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说“谈话当中，谈了一个问题以后，转换话题，再谈另一个问题，这是经常有并且完全可以的”，而上述例子中的转换话题却就违反了同一律呢？这就涉及到是不是“同一思维过程”的问题了。“谈话当中，谈了一个问题以后，转换话题，再谈另一个问题”，这表明一个思维过程已经结束，又一个思维过程开始了。一个思维过程结束，换一个话题，再来一个思维过程，这当然是允许的，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一个思维过程还没有结束，就中途任意转换话题，这就违反同一律了。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我们不仅对所运用的概念或判断要保持同一的内容，不能任意变更；而且对所议论的话题（也叫论题）也应保持同一，不能中途转移。

无论谈话也好，写文章也好，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会不自觉地犯转移论题的逻辑错误。例如：

(1) 在旧中国，有许多农村女孩子被资本家骗到上海纱厂里当包身工，上下班没有自由，连跟亲人通信的权利也给剥夺了！资本家任意打骂她们，打死了，也不算啥。这里登的就是包身工多次反抗中的一次。

例(1)，前面部分说的是旧社会的农村女孩子如何被资本家骗到上海，被骗当包身工后又如何受资本家的种种迫害；后面部分话题突然转到说包身工的反抗上，这样任意转换话题，不符合同一律的要求。如果在“这里登的”的前面加上“哪里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类的话，将前一个话题结束掉，转入另一个话题，这就通了。

有的文章，说东道西，一再转移中心。例如：

(2) 但是，在新诗创作实践中，有人往往片面强调所谓“景色”，在写景时堆砌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使景色描写游离于主题之外。这样的景物描写丽则丽矣，却不真实，也不感人。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决无共同的语言和感情，因而也没有什么可供共同欣赏的美妙的景色。

例(2)，首先提出了“景物描写游离于主题之外”的问题，但接下去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却谈起景物描写的“真实”问题来了。随后，又谈到景物描写的阶级性。东拉西扯，中心转移，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

由此可见，我们在写作时应该注意自己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如何抓住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又如何针对这个问题加以解决，行文紧扣中心，保持论题的同一。否则，就会犯转移论题的逻辑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立场反动的人惯用转移论题的卑劣手法，进行无耻的诡辩。对此，我们必须给以揭露。例如，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在上海共青团的工作座谈会上说：“不能讲青少年抽烟就不行了，我也抽烟。讨论抽烟好不好，一百年也讨论不出结论。”

张春桥在这里就是要弄转移论题的诡辩手法，以掩盖其毒害青少年的罪恶用心。关于“青少年抽烟好不好”的问题，广大革命同志是十分明确的。在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青少年出发，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张春桥一方面顽固地坚持其腐蚀青少年的反动立场，一方面又理屈辞穷，

于是故意避开“青少年抽烟好不好”这一具体问题，而泛泛地去谈什么“抽烟好不好”的问题。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阶级敌人的逻辑错误，往往是由他的反动立场决定的。

### 三、从一则寓言谈矛盾律

我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韩非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有一个卖矛又卖盾的人，他在吹嘘自己的盾的坚固时说，没有任何锐利的东西能刺穿它；他在吹嘘自己的矛的锋利时说，没有任何东西它刺不穿。有人就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时怎么样？这个卖矛又卖盾的人就张口结舌，无法回答了，因为他对矛的吹嘘和对盾的吹嘘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从逻辑上来讲，那个卖矛又卖盾的人，对他的“矛”和“盾”的吹嘘是违反矛盾律的。那么，什么是矛盾律呢？矛盾律的具体要求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条件下，从同一方面，对同一事物，不能肯定它是这个，同时又肯定它是那个；也不能同时既肯定它，又否定它，思想必须保持前后一致。那个卖矛又卖盾的人，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条件下，从同一方面，对“矛”和“盾”这两种兵器，一会儿肯定它，一会儿又否定它，所以说他在逻辑上违反了矛盾律。“矛盾律”，确切地说，应该是“不矛盾律”，但现在习惯上一般很少这样说。

懂得矛盾律，我们可以用来揭露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立场反动的人，为了反革命的政治目的，经常散布谣言，大搞诡辩。但是他们的谎言往往自相矛盾，经不住认真分析。我们可以运用矛盾律，指出其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这样，他们的谎言也就破产了。例如“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一些言论，就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下面我们来看一段



## 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一会儿说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一会儿又说什么“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没有关系”。他们散布这一派胡言乱语，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垮。（《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代表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滔天罪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上去”和“下降”不自相矛盾吗？“四人帮”反党集团所以要制造这样混乱的逻辑，目的就是要搞乱人们的思想，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懂得矛盾律，还可以使我们的思想保持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我们的同志在说话或写文章中，由于思想一时还没有理清楚，也容易出现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这样，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例如：

(1) 这些出土陶器上的花纹，已具有文字的性质，但还不能算是文字。

(2) 清晨，雄鸡报晓三更时，我就起床，准备出发了。

(3) 要写好这个剧本，困难是很多的。因为他们这几个人从来没有搞过文艺创作，虽然他们中的老李同志曾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但创作剧本这还是第一次。然而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很大，个个表示要迎着困难上。

例(1)，“已具有文字的性质”，说明应该是文字；“还不能算是文字”，说明不是文字，前面肯定它，后面又否定它，前后矛盾。这种错误，是由于对“具有”一词的概念还没有弄清楚造成的，如果把“具有”改为“带有”就恰当了，不自相矛盾了。

例(2)，究竟是东方欲晓的“清晨”，还是半夜的“三更”？这两个概念反映的不是同一时间，犯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例(3),前面说“他们这几个人从来没有搞过文艺创作”,后面说“他们中的老李同志曾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违反了矛盾律。其实,只要把“文艺创作”改为“戏剧创作”,就不自相矛盾了。

## 四、从“反动势力的捣乱和破坏是坏事，但也是好事”这句话再谈矛盾律

前面一篇，我们谈了什么是矛盾律以及学习矛盾律有什么作用。现在，着重从“条件”和“方面”再来谈谈矛盾律的问题。

看到题目中引的一句话，有人或许会说：这不是违反矛盾律吗？你看，既说“反动势力的捣乱和破坏是坏事”，又说“也是好事”，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其实不然。为什么说它没有违反矛盾律呢？这就涉及到“条件”和“方面”的问题了。因为矛盾律要求人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条件下，从同一方面，对同一事物，不能肯定它是这个，同时又肯定它是那个；也不能同时既肯定它，又否定它。这里，“条件”和“方面”是不能忽视的。先看两个例子：

(1) 在一个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  $100^{\circ}\text{C}$ ；在高山，由于气压低，不到一个大气压，水的沸点就不到  $100^{\circ}\text{C}$ ；锅炉中的蒸汽气压可达几十个大气压，水的沸点可以在  $200^{\circ}\text{C}$  以上。

(2) 金训华同志，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来到边疆，扎根边疆，最后为抢救国家的物资，在与特

大洪水搏斗中英勇牺牲。他实践了“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钢铁誓言。

……小金，他没有死，他的声音笑貌，他那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他那旺盛的革命精神，从人们的心头升起，升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例(1)，对水的沸点有这样三种不同的说法，不是互相矛盾吗？其实这三种说法并不矛盾，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三种说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所根据的不是“同一条件”。条件不同，对客观事物所作的判断当然也应该不同，这并不违反矛盾律。

例(2)，乍看起来，似乎是前后自相矛盾：前面说金训华同志“英勇牺牲”了，到了后面却说“他没有死”。原来，这里不是“从同一方面”说的，而是“从不同方面”说的：“英勇牺牲”是从金训华同志的生命这方面说的；“没有死”是从金训华同志的革命精神及其影响这方面说的——他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因此这段话完全正确，并没有违反矛盾律。

由此可知，是不是违反矛盾律，要看下判断的“条件”和“方面”究竟怎样。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题目中引的那句话。我们说，那句话没有违反矛盾律，正是因为它是从“不同条件”这点上作出的判断。反动势力的捣乱和破坏当然是坏事，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如“四人帮”一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是一件坏事，但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掌握革命的辩证法，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员去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让群众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受到一次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

义复辟的教育，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这就充分说明了条件不同，对事物所下的判断也应该不同，这是并不违反矛盾律的。

我们应该注意，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只是要求在同一条件下，从同一方面，对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有互相矛盾的两种认识。至于在不同的条件下，或是从不同的方面，对事物下不同的判断，是完全可以而且是完全应该的。离开这些，抽象地、笼统地规定不应互相矛盾，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同一性——抽象的， $a = a$ ；反过来说， $a$ 不能同时等于 $a$ 又不等于 $a$ ”，这在有机界中，在无机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列宁也指出，呆板的、纯形式的“ $A = A$ ，是‘不堪忍受的’空洞”，“理应受到‘蔑视’和‘嘲笑’”。当然，这里必须说明，题目上的那句话，在表达上省略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之类的词语，而这种省略现象，既是常见的，也是允许的。

## 五、从鲁迅的《立论》谈排中律

什么是排中律呢？先看鲁迅的《野草·立论》一文：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鲁迅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讽刺了当时社会上某些知识分子虚伪的处世态度和无是非的市侩哲学。“既不谎

人，也不遭打”，这是违反排中律的。从这篇文章来看，“我”“不谎人”就是“我不说谎话”，“我”“不遭打”就是“我要说谎话”。“我不说谎话”和“我要说谎话”这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对于这样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应该肯定其中的一个，否定其中的另一个，而不能两个都否定。

由此可知，排中律就是排除“居中”，即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要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明确选择，对真与假，是与非，不能两者都否定。

学习并掌握排中律，我们可以用来揭露违反排中律的逻辑错误。“四人帮”反党集团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他们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经常故意违反排中律，我们要给以揭露。例如：

(1) ……你抓一下学生的革命纪律教育么，他说你是“师道尊严”，是管、卡、压，要批；你不抓么，他又说你不是不負責任，放任自流，也要批。……总之，批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抓也不好，不抓也不好，无所适从，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彻底清算“四人帮”在教育界的滔天罪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文汇报》）

例(1)，说明“四人帮”一伙为了把教育革命搞糟搞乱，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抓也不好，不抓也不好，无所适从，根本无法开展工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人帮”一伙的逻辑错误是与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密切联系的。

学习并掌握排中律，就应当使自己避免违反排中律的逻辑错误，在是非、真假之间无所肯定是不够的。例如：

(2) 甲：大热天快到了，我认为我们厂应当增添防暑降温设备。

乙：根据情况，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丙：对。我们厂的防暑降温设备并不差，不必增添了。

乙：这样——恐怕也不妥当吧。

例(2)，在这个对话中，甲认为防暑降温设备“应当增添”，丙认为“不必增添”，这是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见。乙对这两种意见都采取否定的态度，使人无法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见。乙的态度，在逻辑上来说，是违反排中律的。

当然，在运用排中律时，应该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对同一对象只能作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时，才能运用排中律；如果还有第三种可能，仅从两个判断中作出选择是不妥当的。例如在“这是块合金钢”和“这不是块合金钢”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之间，可以运用排中律，指出非此即彼。如果在“这是块合金钢”和“这是块普碳钢”之间，就不能运用排中律。因为这一块钢很可能既不是合金钢，也不是普碳钢，而是高碳钢或者其他别的钢。



## 六、从两个例子的修改谈 概念的限制和概括

先看鲁迅的《藤野先生》中的一段：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这一段文章，其中“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一句，本来没有“有一间的”四个字。为什么定稿时鲁迅要加上这四个字呢？因为前面讲到“里面的几间洋房”，后面说“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那就会使人理解为“几间洋房”的“地板”都“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了。而事实上鲁迅是要说其中一间的地板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因此添上“有一间的”四个字，对“地板”这个概念加以限制，就不会使人误解了。

再看下面一段的修改：

《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一文初发表时有这样一句：

关于战术方面的论述，在“敌富吾贫”“敌众吾少，敌强吾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打胜仗的道理和认识，包含了若干朴素的辩证法。

文物出版社在将此文收入《孙膑兵法》一书时，把这句话修改为：

关于军事思想方面的论述，在“敌富我贫，敌众我少，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打胜仗的道理和认识，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

为什么修改稿要将“战术”改为“军事思想”呢？因为“在‘敌富我贫，敌众我少，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打胜仗的道理和认识”，不仅是战术问题，更主要的是战略问题。原稿仅仅说成“关于战术方面的论述”，显得概念过小，不够明确；修改稿进一步概括为“关于军事思想方面的论述”，概念就明确了。

上面两个例子的修改，分别对概念进行了限制和概括，使概念十分明确。那么，什么是概念的限制和概括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概念。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给我们指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这就是说，概念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人们对事物的本质、全体以及内部联系的认识。

一个概念总是由它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和范围两个方面构成的。例如“地震”这个概念，它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是：由于地球内部的运动引起的地壳震动；它所反映的事物的范围包括火山爆发、地壳陷落、地层断裂等原因引起的各种地震。我们把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叫做概念的内涵，把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范围叫做概念的外延。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密切联系着的。内涵的增加或减少，必然会引起外延的缩小或扩大。例如“火山地震”这个概念比起“地震”这个概念来，内涵增加了“火山”这个含义。内涵增加了，外延怎样呢？缩小了，因为“火山地震”就不包括陷落地震、构造地震等在内。反之，“地震”这个概念比起“火山地震”这个概念来，内涵是减小了，而外延却扩大了，因为它包括了各种地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原理：概念的内涵增加，外延就缩小；内涵减少，外延就扩大。这就是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反变关系。

概念的限制和概括，实际上是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反变关系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概念的限制，就是缩小概念的外延，增加概念的内涵。前面第一例的修改，就是对概念进行限制。从“地板”到“有一间的地板”，概念的外延缩小了，但内涵增加了，因为后者除了“地板”的含义之外还加上了“有一间的”的含义。概念的概括，就是扩大概念的外延，减少概念的内涵。前面第二例的修改，就是对概念进行概括。从“战术”到“军事思想”，概念的内涵是减少了，而外延却扩大了。因为“军事思想”不仅包括“战术”，还包括“战略”在内。

从这两个例子的修改可以看出，对概念进行恰当的限制和概括，有助于概念明确，因此，概念的限制和概括是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常常故意滥用限制或概括的方法来制造含混的概念。“四人帮”反党集团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例如他们胡说的“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论调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在逻辑上是极其荒谬的。“草”和“苗”本来是十分明确的概念，除草保苗，也是一般的常识。但是，这帮阴谋家、野心家故意

制造了“社会主义的草”之类的虚假的、混乱不堪的概念，用“社会主义”来限制“草”，目的在搅乱人们的思想，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 七、从对书刊的分类谈概念的划分

前面一篇，我们谈了概念以及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限制和概括；这一篇，我们来谈谈明确概念的另一种逻辑方法——划分。先看下面的例子：

(1) 新到的书刊很多。有理论书、科技书、各种期刊、外文书刊、画报和画册等等，它们都分门别类被陈列在阅览室的书架上。

例(1)，这里说的是对“新到的书刊”的“分门别类”，然而，这种分类却显得十分凌乱。比如，既说有“理论书、科技书”，又说有“外文书刊”，似乎“外文书刊”就没有“理论书、科技书”；既说有“各种期刊”，又说有“外文书刊、画报和画册”，好象“外文书刊、画报和画册”都不是期刊。总之，这样的分类，概念不明确，层次不清楚。从逻辑上来看，这里违反了划分的规则。

那么，什么是划分呢？划分，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一个概念分成几个并列的小概念。它能明确概念的外延，也是通过揭示概念的外延来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例如，“知识”这个概念，按照领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按照人的认识的发展阶段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经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对“知识”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十分明确了。

划分的具体要求又有哪些呢？

首先，在同一次划分中，必须用同一个标准。比如，要明

确“桌子”的外延，如果按照形状这个标准划分，可分为：长桌、方桌、圆桌等等；如果按照用途这个标准划分，可分为：办公桌、课桌、饭桌等等。如果在同一次划分中没有采用同一个标准，说“桌子可分为长桌、方桌、饭桌、办公桌等等”，这样的划分，是混乱的。因为“长桌、方桌”中有“饭桌、办公桌”，“饭桌、办公桌”中也有“长桌、方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2) 大扫除开始了，男女老少都参加，男的女的干重活，老的少的干轻活。

例(2)，按照这样的划分，大扫除的分工就无法进行，因为“男的女的”中有“老的少的”，“老的少的”中也有“男的女的”。很清楚，问题就出在划分的标准不统一：“男的女的”是按性别标准划分的，“老的少的”是按年龄标准划分的。这样，概念的外延很不明确，大扫除的分工也就难以进行了。

其次，划分还必须逐级进行，每次划分后的小概念应互相并列。比如说，“剧本的语言一般包括舞台说明、台词，而台词又包括对话、独白”，这就是逐级划分，划分后的小概念是并列的，因此，层次很分明，概念很明确。如果说“剧本的语言一般包括舞台说明、台词、独白”，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台词”是包括“对话、独白”的，“独白”和“台词”的关系不是并列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这种把不是并列的概念作为同一个层级放在一起，就是犯了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3) 他原是一个无知的青年，在城市里长大，什么时候种田，什么时候插秧，他全然不懂。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在参加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他才学会了种田、插秧等本事。

(4) 旧社会，尽管一家人和妈妈在厂里累死累活地

干,却还是填不饱肚子。

例(3),“种田”和“插秧”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从属的。相对地说,“种田”是大概念;“插秧”是个小概念,它同“耕田”、“除草”、“收割”等等都是“种田”这个大概念下面的并列的小概念。这里,把“种田”和“插秧”并列在一起,就犯了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

例(4),“一家人”是包括全家的每一个人的,自然也包括“妈妈”在内。把“一家人”和“妈妈”并列起来,好象“妈妈”不是“一家人”之中的一个,显然是不恰当的。这也是犯了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

## 八、从张春桥的“新桃换旧符” 的反动实质谈揭示概念内 涵的一种方法——释义

释义也是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因为通过释义把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就可以使我们对概念获得明确的认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妄想窃取总理的职位。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经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这就给张春桥这个野心家当头一棒。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这个阴谋家咬牙切齿地写下了《有感》，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华国锋同志。《有感》的末尾引了宋朝王安石当宰相以后写的《元日》一诗，叫嚷要用“新桃”换“旧符”。张春桥所谓的“新桃”、“旧符”的实质是什么呢？《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铁证——评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一文指出：“他厚颜无耻地把他们那一小撮腐朽不堪的势力比作代表新生力量的‘新桃’，而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央领导同志污蔑为‘旧符’，穷凶极恶地发誓要‘总把新桃换旧符’，不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决不罢休。”这里通过对“新桃”“旧符”的解释，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一针见



血地揭示了出来，张春桥这个反革命的真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原来，他的所谓“新桃”是把他们那一小撮腐朽不堪的势力比作“新生力量”；他的所谓“旧符”是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污蔑。这种通过对概念作解释来揭示概念内涵的方法，我们把它叫做释义。

释义的正确，决定于对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的正确。周恩来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有这么一段：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

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周总理在这里尖锐地指出了苏修叛徒集团所谓的“健康力量”、“决定性的话”、“思想胜利”、“国际主义道路”的实质，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嘴脸。

释义，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根据一定的目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属性的一种方法。因此，对一个概念要不要进行释义，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能为释义而释义。例如前面对张春桥的“新桃”“旧符”的实际含义的揭示，就是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需要出发的。

我们知道，阶级敌人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常常在概念上玩弄花招。他们或者故意制造一些虚伪的、含混不清的概念欺世惑众，麻痹人民，或者故意歪曲概念，混淆视听。对于这些虚伪的、含混不清的、被歪曲了的概念，我们尤其需要用释义的方法来揭示其真正的内涵。例如，“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推行了一条结帮营私的组织路线，公开鼓吹提拔干部的标准是什么“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他们的“领导熟悉”、“群众拥护”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根据揭发出来的“四人帮”用所谓“相面孔”和“双突”等手段网罗坏人、物色“干部”以组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大量罪行，我们便可以运用释义的方法对这些概念进行明确的解释，正象许多同志所揭露的那样：

所谓“领导熟悉”，就是“四人帮”熟悉。只要什么人肯为其篡党夺权卖力，什么人就会被“相”中，于是他就成了“四人帮”的“熟悉”对象，就会很快地被提为“干部”。

所谓“群众拥护”。“四人帮”心目中的“群众”，实际上就是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这些

家伙所拥护的“干部”，当然只能“象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

这样，通过释义就把“四人帮”的结帮营私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极右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类似上述这样的释义，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正在被我们广泛地、经常地运用着。

## 九、从“这样的整顿，不正是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谈判断的多重否定问题

“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极力反对整党整风，反对整顿领导班子，胡说什么“整顿就是复辟”，“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参加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代表，对“四人帮”的这些谬论进行了批判。在批判“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谬论时，举出了河南许昌地区的事例，指出：

河南许昌地区的十四个县市，去年普遍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整党整风，进一步端正了方向、道路，各级党委的心更齐了，劲更足了，腰杆子更硬了。他们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工作部署没有乱，领导班子没有散，群众的干劲没有松，发展了大好形势。他们带领广大群众批得修正主义臭不可闻，斗得资本主义无处藏身。许多县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该批斗的批斗，该法办的法办。革命人民扬眉吐气，社会主义积极性大高涨。全区粮食总产量增长三成，一年中就涌现了五个学大寨先进县。请问，这样的整顿，不正是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果吗？怎么倒变成“否定文化大革命”呢？（《是革命，还是复辟？——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代表批判“四人帮”破坏整党整风的罪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上面“这样的整顿，不正是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一句，它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整顿，正是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是个反问句，表示的是一个肯定的判断，因为“难道不是……吗？”等于说“是这样的”。这当中，“不是”是一次否定，反问等于一次否定，所以这是一个包含了两次否定的肯定判断。凡是运用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否定，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的方法就叫做“多重否定”。

我们怎样正确地运用多重否定呢？正确运用多重否定的作用又在哪里呢？这就要先谈一谈判断。

什么是判断？判断是对客观事物有所断定的一种思维形式。例如：

(1) 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2) 新生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例(1)，“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对“阶级斗争”直接地进行断定。例(2)，“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对“新生事物的发展”直接地进行断定。象这种断定客观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思维形式，就叫做判断。

判断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它是由主概念、宾概念和联系词三个部分组成的。主概念就是判断的对象，如例(1)的“阶级斗争”，例(2)的“新生事物的发展”；宾概念表示主概念所具有或不具有的属性，如例(1)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例(2)的“一帆风顺的”；联系词表示主概念和宾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例(1)的“是”，例(2)的“不是”。

一个判断，要么是肯定的，要么是否定的，不肯定什么，不

否定什么，就不是判断。在一般情况下，表示肯定的判断用联系词“是”，表示否定的判断用联系词“不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强调，可以采用以双重否定表示肯定、以三重否定表示否定等多重否定形式，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多重否定”。

现在来谈双重否定。例如：

(3) 古往今来，没有那一场真正的革命，不是大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罪魁祸首》，《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十二期）

(4) 十条大罪（编写者注：指“四人帮”给电影《创业》罗织的莫须有的十条“罪状”），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一张大字报的前前后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例(3)，“没有”是一次否定，“不是”又是一次否定，“没有……不是”就是“都是”，表示肯定。为了肯定每一场真正的革命“都是大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用双重否定来表示，就增强了肯定的力量，使意思更加强化。

例(4)，当中的最后一句话，“不就是……吗？”是反问语气，反问等于一次否定，其中的“不”又是一次否定，所以也是一种双重否定。这是借用疑问的形式表达陈述的内容，除了强调肯定之外，还有提醒人们注意的作用。

再谈三重否定。例如：

(5) 你不是不反对步行去参观吗？

例(5)，“不是”是一次否定，“不”又是一次否定，再加上反问——等于一次否定，共是三重否定。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现

在再加一次否定成为三重否定,就表示否定了。这样运用,可以使否定表达得更加有力量。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多重否定的形式是多种的:有双重否定,它表示的是肯定;有三重否定,它表示的是否定;其他依此类推。同时又说明,运用多重否定,能加强语气,有助于表达思想内容。但是,如果运用不当,会导致是非颠倒,造成逻辑错误。例如:

(6) 全组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这次能提前完成支农生产任务不是对支农意义认识提高的结果。

(7) 难道能否认这次讨论会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吗?

例(6),原意想强调地肯定“能够提前完成支农生产任务是对支农意义认识提高的结果”,但由于误用了三重否定,却变成了否定判断,变为“全组都认为这次能提前完成支农生产任务不是对支农意义认识提高的结果”,显然不合原意。这个句子可以把后面那个“不是”的“不”字去掉,改为双重否定,成为肯定判断,就恰当了。

例(7),原意想强调地肯定这次讨论会的成功,但误用了三重否定(两次否定,再加上反问,共是三次否定),结果成了一个否定判断。如果把“否认”改为“说”,或删去“没有”二字,这样,就比较恰当了。

说到这里,对什么是判断的多重否定问题,我们有个初步的了解了。可以看出,正确地运用多重否定,是作出准确有力的判断所不可忽视的。

## 十、从叛徒江青诬蔑民歌的谬论判断的数量范围问题

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江青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恶毒诬蔑民歌，胡说什么“民歌大多数是哥哥妹妹……下流的东西”。

大家知道，民歌大多数是抒发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歌颂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东方红》，就是陕北民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农友歌》、《秋收起义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边区十唱》、《赞歌》、《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百万农奴站起来》等等就是江西、湖南、陇东、西藏、内蒙等地的民歌。在我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很多民歌“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江青胡言乱语，颠倒黑白，说明她立场极端反动。

从逻辑上看，江青的谬论是一个判断，其逻辑错误在于主概念的数量范围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什么是主概念的数量范围呢？先看下面三个例子：

(1) 一切阶级敌人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为了破坏和反对革命，总是千方百计地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红旗》一九七六年第



十二期)

(2) 江苏各县通过整风,不少县委领导班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加自觉,“一班人”之间更加团结,抓阶级斗争更加得力,领导全县人民学大寨的步子跨得更大了。(《在同“四人帮”斗争中深入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十二期)

(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光辉典范。(《唯物辩证法的光辉照征程——纪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四十周年》,《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十二期)

上述三例是三个判断,它们都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这三个判断的主概念的数量范围是各不相同的:例(1),主概念“一切阶级敌人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其数量范围涉及一类事物的全体,这种判断叫做全称判断;例(2),主概念“不少县委领导班子”,其数量范围涉及全体中的一部分,这种判断叫做特称判断;例(3),主概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主席的一篇光辉著作,其数量范围只涉及单个事物,这种判断叫做单称判断。正因为主概念的数量范围有这三种情况,我们在下判断时,就必须严格注意是对一类事物的全体作判断,还是对一类事物的部分作判断,还是对单个事物作判断。在对一类事物的部分作判断时,又须注意这一部分的数量多寡。华国锋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所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总结报告中,在分析县委领导班子的情况时,十分恰当地指明了主概念的数量范围。总结报告指出:

我们的县委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很多,性质严重,甚至坏人掌权的,是极少数。但是,有

相当一部分县委领导班子还存在着“软、散、懒”的情况。一部分同志还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些实际上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这些情况，对深入学大寨妨碍极大。因此，为了普及大寨县，有必要普遍进行整风，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切实解决许多县委领导班子存在着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看，同样是反映全体中的一部分，总结报告中在数量范围上却有着具体的区别：说好的和比较好的县委领导班子时，用的是“多数”；说还存在着“软、散、懒”的情况的县委领导班子时，用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说实际上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时，则是用“有些”。这样，准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

如果我们忽视了数量范围的区别，就不能对实际情况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就会犯逻辑错误。例如：

(4) 文章中那些又空又长的八股形式，有的是需要抛弃的。

(5) 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两个判断在数量范围上都是不恰当的。例(4)，把全称判断误为特称判断了，因为文章中的八股形式，不管老的新的，都应统统扫除干净，而不能说“有的是需要抛弃的”。例(5)，把特称判断误为全称判断了，因为对于“做父母的”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只有革命家长，才希望自己的儿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可能是“每一个”。

## 十一、从“大干还是小干，这是关系到是不是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问题”谈判断的主宾相应问题

前面我们谈过，在作判断时必须注意正确地运用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联系词，必须注意判断对象的数量范围，现在来谈谈作判断时还必须注意主概念与宾概念是否相应的问题。

什么叫判断的主概念与宾概念相应呢？请看下面的例子：

(1) 大干还是小干，这是关系到是不是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问题。（《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速度赶昔阳》，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例(1)，这是一个肯定判断。主概念提出的“大干还是小干”的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即“大干”和“小干”；宾概念“关系到是不是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问题”也包含了两个方面，即“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不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宾概念的两个方面，确切地反映了主概念两个方面的性质：“大干”就是“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小干”就是“不贯彻执

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主宾完全相应。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对什么叫判断中主概念与宾概念相应的问题有个初步的了解了。所谓主宾相应，即我们在作出一个肯定判断时，如果主概念只具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宾概念就只能反映这一个方面的属性；如果主概念是由几个方面构成的，那么宾概念就必须反映主概念所有构成方面的性质。我们在作出判断时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犯主概念和宾概念不相应的逻辑错误。

主宾概念不相应的逻辑错误的一种情况是主概念只有一个方面，宾概念却包含了两个方面，而其中只有一个方面是反映主概念性质的。例如：

(2) 保持工农兵革命本色是每一个工农兵学员能否继续革命的关键。

例(2)，这个判断主概念只有“保持工农兵革命本色”一个方面，宾概念却有“能继续革命”和“不能继续革命”两个方面，其中只有“能继续革命”才是反映主概念性质的，另一个方面，即“不能继续革命”，同主概念没有关系。因此这个判断的主宾概念不相应。应该删去宾概念中的“能否”，或是在主概念之前加上“能否”，这样主宾才相应。

又如：

(3) 担任了班级通讯员后，小王的写作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扩大。

例(3)，在这一判断中，宾概念包含了“提高”和“扩大”两个方面，而其中只有“提高”才反映出主概念“小王的写作水平”的性质，“扩大”与主概念则不相干，因为“写作水平”是所谓“扩大”的，所以这个判断的主宾概念也是不相应的。如果把“扩大”删去，这个判断的主宾概念就相应了。

主宾概念不相应的逻辑错误的另一种情况是，主概念包含两个方面，而宾概念只反映了主概念一个方面的性质。例如：

(4) 能不能同工农相结合，是衡量一个青年愿意革命的唯一标准。

例(4)，这个判断中，主概念包含“能同工农相结合”和“不能同工农相结合”两个方面，宾概念中“愿意革命”只反映了主概念中“能同工农相结合”一个方面的性质；“不能同工农相结合”这一方面，在宾概念中则没有反映。如果这个判断改为“能不能同工农相结合，是衡量一个青年愿意不愿意革命的唯一标准”，主宾就相应了。

又如：

(5) 经过三大革命实践的锻炼，小张的政策水平和工作作风大大提高了。

例(5)，在“小张的政策水平和工作作风大大提高了”这个判断中，主概念包含“政策水平”和“工作作风”两个方面，而宾概念“提高”只反映了“政策水平”的性质，不能反映“工作作风”的性质。因为“工作作风”是不能“提高”的。如果把这个判断改成“小张的政策水平大大提高了，工作作风也有了改进”，这样，判断的主宾概念就比较相应了。

判断中主概念与宾概念相应是使判断恰当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在作判断时必须注意。

## 十二、从讨论种柑橘的一段话 谈实然判断、或然判断、 必然判断

柑橘喜暖怕寒，在气温摄氏零下五度的情况下，一般就难以成活。上海地区由于冬季的气温较低，有时要低于摄氏零下五度，所以一向被认为是不能种植柑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郊区一个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遵照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提出要从外地引种柑橘的建议。在讨论这一建议时，这个农场广大的知识青年就说：“由于冬季气温比较低，上海过去是没有种过柑橘。现在引种，除了气温条件外，我们还可能会遇到其他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有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指引，上海地区一定能种好柑橘！”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照耀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农场的广大知识青年大搞科学实验活动，不断摸索柑橘生长的规律，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使柑橘在上海地区安下了家，结出了累累果实。

前面引的知识青年的一段话，从逻辑上讲，包含着三种形式的判断。“由于冬季气温比较低，上海过去是没有种过柑橘。”这是一个表示确实性认识的判断，它的主概念与宾概念的联系是现实性的，我们称它叫“实然判断”。“现在引种，除

了气温条件外，我们还可能会遇到其他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是一个表示预测性认识的判断，它的主概念与宾概念的联系是可能性的，我们称它为“或然判断”。“有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指引，上海地区一定能种好柑橘！”这个判断的主概念与宾概念的联系是必然性的，反映了人们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把这种判断叫做“必然判断”。

实然判断的联系词一般用“是”、“确实是”等；或然判断的联系词经常用“可能是”、“也许是”、“或者是”等；必然判断的联系词常用“一定是”、“必然是”等。

在作出判断时，恰当地反映实然、或然和必然，非常重要。象前面的那段话，先用实然判断反映了现实情况；在讲到现在要引种柑橘时，用一个或然判断提出“除了气温条件外，我们还可能会遇到其他意想不到的困难”，充分估计各种困难的可能性，使人们作好思想准备，迎接困难，战胜困难；最后，用了一个必然判断，表示出对上海地区种植柑橘充满了信心。

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1) 打烂“四人帮”，百花竞开放。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指引下，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必将出现一个更加绚丽灿烂的局面！（《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2) 这所医院的第三批赴山区巡回医疗队，可能在今年七月中旬起程。

例(1)，“打烂‘四人帮’，百花竞开放”是一个实然判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革命文艺事业得到解放，被“四人帮”扼杀的优秀的电影、话剧、戏曲等等重新上映公演，好作品不断出现，呈现一派

百花竞放的景象。“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指引下,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必将出现一个更加绚丽灿烂的局面”是一个必然判断,指出革命文艺事业更加绚丽灿烂局面的出现,是必然的规律。

例(2),是一个或然判断,是对第三批巡回医疗队启程日期的预测。

我们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如果不能恰当地运用实然、或然、必然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就会犯逻辑错误。例如:

(3) 这头猪不肯睡觉,一定是病了。

(4) 二十日龄左右的仔猪如果不抓紧补料,发育可能受影响。

例(3),猪不肯睡觉,可能是病了,也可能没吃饱,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不能光从不肯睡觉这一现象断定猪一定是病了。所以这里犯了把或然判断误作为必然判断的逻辑错误。

例(4),把必然判断误作为或然判断。二十日龄左右的仔猪正是大量需要养料的时候,如果不抓紧补料,那仔猪的发育不是可能受影响,而是必然会受影响。

准确地运用或然、实然和必然的判断形式,是判断恰当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准确地运用实然、或然、必然这三种不同形式的判断,必须对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识。



## 十三、从“看云识天”谈推理的 前提必须正确

我们早上起来,有时要看一看天上的云,想一想今天的天气如何,以便更好地安排学习和工作。比方说,看到“天上鲤鱼斑”,就想到“晒谷不用翻”;看到“天上钩钩云”,就想到“地上雨淋淋”。象这样的思维过程,就是推理。

推理就是由已知的判断推出另一个判断的一种思维形式。已知的判断是推理的根据,叫做前提;从前提推知的判断,就是结论。例如,根据平时的观察,我们发现:某月某日天空出现鱼鳞片般的云彩,那是一个大晴天;后来,我们不断地看到同样的情况,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天空出现鱼鳞云的日子天气晴好。象这种从许多同类的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的道理的推理,叫做归纳推理。掌握了一般的道理和原则,还可以把它运用到有关的个别事物上去。这种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叫做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最常见的是三段论。例如:

- (1) 天空出现鱼鳞云的日子天气晴好,  
    今天是天空出现鱼鳞云的日子,  
    今天天气晴好。

例(1),在这个三段论里,第一句说明的是一般,叫做大前提;第二句指出的是个别,叫小前提;第三句是由两个前提推

出的结果,叫结论。

三段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经常运用的,但不一定完整地說出这么三段,而常常是省略了其中某些部分。在语言的表达上,有时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同一概念,这样能使语言简洁而不呆板。例如:

(2)历史上的一切阴谋家、野心家都没有好下场,“四人帮”也毫不例外。(“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黑纲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例(2)，“历史上的一切阴谋家、野心家都没有好下场”是普遍规律、一般原则,是大前提;“‘四人帮’也毫不例外(就是:‘四人帮’也没有好下场)”是结论;小前提省略了。把小前提补出来,是:“‘四人帮’是阴谋家、野心家”。这里小前提之所以省略,是因为上文已经揭露分析了“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狂妄野心,而且“四人帮”是阴谋家、野心家已是人所共知的事,省略了更简洁。

进行推理,首先应该注意前提正确。如果前提是错误的,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种种谬论。有些谬论就是从荒谬的前提进行推理的,例如谁要是搞生产,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就给你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这是一个省略大前提的三段论。它的推理过程是:

搞生产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唯生产力论者,  
(大前提)

你搞生产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小前提)

你是唯生产力论者。 (结论)

这个大前提显然是荒谬的。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

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帮’把这个叫做‘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诬蔑。”“搞生产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唯生产力论者”这个大前提既然是荒谬的，根据这个荒谬的前提推出的结论也自然是荒谬的了。

推理都必须有前提。要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前提必须正确。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末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前提正确就是指作为前提的那个判断的内容，要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不断改造主观世界。

## 十四、从三段论只可以有三个 概念谈推理中的“四概 念”错误

推理,要求前提正确,但是,前提正确了,推理是不是就能合乎逻辑了呢?也不一定。一个三段论要合乎逻辑,条件之一是它只可以包含三个概念。例如:

(1)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大前提)

赤脚医生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小前提)

所以,赤脚医生是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结论)

例(1),这个三段论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它包含三个概念,就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发展成长”和“赤脚医生”。每个概念各出现两次,组成三个判断。我们知道,三段论反映的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包括个别,凡是一般所具有的性质,从属于“一般”的“个别”也必然具有这种性质。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一般”,“赤脚医生”是“个别”,它从属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既然“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性质,那么,“赤脚医生”当然也具有“在斗争中发展成长”的性质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个概念只在前提中出现两次,它起到的是桥梁作

用。

如果一个三段论包含了四个概念，就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推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例如：

(2) 鲁迅的著作不是一天可以读完的，(大前提)

《一件小事》是鲁迅的著作， (小前提)

《一件小事》不是一天可以读完的。(结论)

例(2)，这个三段论，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正确的，但推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包含了四个概念。从字面上看，这个三段论的概念只有三个；但大前提中“鲁迅的著作”是指鲁迅的全部著作，小前提中的“鲁迅的著作”是指鲁迅著作中的一篇，概念不同。所以这个三段论中包含了四个概念。既然大前提中的“鲁迅的著作”同小前提中的“鲁迅的著作”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么，《一件小事》就不具有“不是一天可以读完”的性质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往往故意用四概念来推理，借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扼杀热情歌颂毛主席教育思想的湘剧《园丁之歌》，用初澜笔名写了一篇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毒草文章，对《园丁之歌》强扣帽子，横加罪名。他们把剧中“没文化怎能革命重担来担当”这句唱词，说成是“贩卖‘智育第一’”，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四人帮”对《园丁之歌》的诬蔑和攻击已被革命群众批驳得体无完肤。让我们从逻辑上来看它是怎样违反推理的规则：

“智育第一”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前提)

《园丁之歌》说“没文化怎能革命重担来担当”，

(小前提)

所以,《园丁之歌》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结论)

很明显,“四人帮”在这里耍弄的是“四概念”的诡辩。这个三段论出现了四个概念:“《园丁之歌》”、“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没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担当’”和“智育第一”。“说‘没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担当’”是指要为挑革命重担而学文化,以革命统率学习,正确地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这与“智育第一”根本是两码事,不是同一概念,怎么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四人帮”玩弄“四概念”诡辩,正好证明他们目的的卑鄙。

必须指出,在三段论里,看是不是犯了“四概念”的错误,不能光从字面上去判定。有时,字面上似乎是四概念,但实际上是三个概念。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里隐含着这么个推理过程:

“替天行道”的强盗是奴才,  
宋江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  
所以,他终于是奴才。

这里,“宋江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等于说“宋江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因为宋江投降后就去打方腊,替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天子”行“镇压之道”。所以这个三段论仍旧是三个概念,是合乎逻辑的。

“四概念”的错误也就是违反同一律的问题,其实质是与偷换概念相同的,不过说明的角度不一样罢了。

## 十五、从两人的对话谈结论超出了前提范围的错误

小李：近来你为什么不进行体育锻炼？

小赵：我又不是运动员。

小赵的答话虽然只是一句，但联系小李的问话，却包含着一个三段论。如果排列出来，是这样的：

运动员要进行体育锻炼，（大前提）

我不是运动员，（小前提）

我不要进行体育锻炼。（结论）

这个三段论，结论是错误的。运动员当然要进行体育锻炼，但不是运动员的人也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教导，踊跃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为革命练好身体。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小前提都没有错，概念也只有三个，为什么推理的结果是错误的呢？原因在于结论超出了前提的范围。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只说运动员要进行体育锻炼，对于不是运动员要不要进行体育锻炼的问题根本没有提，而结论里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不是运动员不要进行体育锻炼”，显然这个结论超出了前提的范围，因而是不合逻辑的。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遇到的一种逻辑错误。

当然也有人为了制造反动舆论，故意违反逻辑规则，进行诡辩。例如辛亥革命后一些复古派，为了反对革命，把孔孟之

道说成是“国粹”，狂叫“保存国粹”。对此，鲁迅曾予以痛斥：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鲁迅的这些话，打中了复古派的要害，他们于是反咬一口，说鲁迅在骂中国人，连自己也骂在里边了。这完全是诡辩。鲁迅把他们的荒谬逻辑概括如下：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

（《华盖集·论辩的魂灵》）

这里包含了一个三段论，把它排列一下，那就是：

甲生疮，（大前提）

甲是中国人，（小前提）

中国人生疮。（结论）

我们知道，三段论是把普遍性的前提运用到有关的个别事物上的推理，但上边的三段论，大前提和小前提都只说明了个别现象，合起来也不过指出“甲是生疮的中国人”而已；而“中国人”当中除了“甲”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怎么能根据这种个别现象就得出“中国人生疮”的结论呢？小前提中的“中国人”仅指“中国人中之一”，结论中的“中国人”却指所有的中国人了。结论超出了前提的范围，这就违反了推理的规则。

“四人帮”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也曾用结论超出了前提范围的诡辩来散布谬论。例如，一九七二年，在一次团干部座谈会上，张春桥诬蔑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



好”的指示是“形而上学”，他指着一个戴眼镜的同志，胡说什么“学生戴眼镜，就不是‘三好’，学生中没有一个是‘三好’的。”

张春桥说的真是屁话。戴眼镜有各种不同情况，戴眼镜的学生较多的是一般的近视眼。张春桥把所有戴眼镜的学生都说成是身体不好，显然是极端荒谬的。即使张春桥指的那位同志确实身体不好，目前还没能达到“三好”的要求，其推理过程也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我们把张春桥的荒谬逻辑排列于下：

你不能做到“三好”，           （大前提）

你是学生，                       （小前提）

学生都不能做到“三好”。（结论）

前提中不能做到“三好”的学生只是一个“你”，而结论中不能做到“三好”的却扩大到千千万万个，把所有学生都包括进去了。显然，结论超出了前提范围。这和前面所说的“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中国人生疮”的反动逻辑一模一样。张春桥故意制造这样的混乱逻辑，其罪恶目的是对抗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妄图把青年学生拉上修正主义邪路。

## 十六、从批驳“四人帮”荒谬的 理论谈归谬法

“四人帮”反党集团打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散布生产无足轻重的谬论，胡说什么“农村要搞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没关系。”真是荒谬绝伦，反动之极。报上曾有不少文章，予以尖锐的批驳。有一篇文章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如果按“四人帮”散布的生产无足轻重的反动论点，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大家都不搞生产，难道不就是要让八亿人民喝西北风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大罪证——戳穿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反动阴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光明日报》）

这段反驳，简洁有力，从逻辑上来说运用了归谬法。鲁迅当年也曾不止一次地运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斗争。在三十年代，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当时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极力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鼓吹“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作品愈高，知音愈少”等谬论。对此，鲁迅曾多次写文章进行批判。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鲁迅针对“作品愈高，知音愈少”的谬论进行了驳斥，写道：“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鲁迅在这里就是用了归谬法，一针见血地把梁实秋的谬

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归谬法是逻辑推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如果“作品愈高，知音愈少”这种论调是对的话，那么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是“谁也不懂的东西（知音一个也没有），就是世界上的绝作”这种说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因此，“作品愈高，知音愈少”的说法，也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通过这种推理，把“作品愈高，知音愈少”这个荒谬的论点推翻了。同样，“让八亿人民喝西北风”这种说法，显然是极其荒谬的，那么它所根据的那个“生产无足轻重”、“农村要搞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没关系”的论点也无疑是极其荒谬的了。

运用归谬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对方论点所推出的结论，其荒谬性必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来，苏联政治上反动，经济上凋敝，文艺上腐朽，各种社会问题成堆。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离婚率异乎寻常地增长，法院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也忙坏了一些御用学者一类人物，他们妄想掩盖正是由于修正主义上台而引起各种社会瘟疫猖獗这一事实，杜撰了一套荒谬的理论，胡说离婚率的增长是由于社会前进了的缘故，并用交通事故的增多同离婚率的增长进行荒谬的类比。说什么“古时候骑马乘车，但受难者极少”，而“汽车这种快速、舒适、美观的东西从它发明以来，已断送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对苏修这一荒谬逻辑，《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荒诞的“规律”》一文批驳道：

苏修先生把交通事故和离婚率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

的事情牵强附会地扯到一块，妄图以此说明：交通工具发达，事故必定增多；同样，社会前进了，离婚率必定增长。按照苏修这位院士的逻辑，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离婚率比沙俄时代一定会高得多，因为制度不同了，社会前进了，可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照苏修的看法，要想发展那种“善始善终的婚姻”，就非得来一个历史大倒退，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去才行。

为了加强批驳力量，上面这段文章还从另一个角度再一次运用归谬法，指出如果“社会前进了，离婚率必定增长”这个论点能够成立的话，那末“要想发展那种‘善始善终的婚姻’，就非得来一个历史大倒退，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去才行。”大家知道，要来一个历史大倒退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这样，所谓“社会前进了，离婚率必定增长”这种论调的荒谬性、反动性当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以上例子，我们还可以知道，归谬法常常带有讽刺意味，反驳起来能置对方于无从狡辩的境地，因此它在革命大批判中是经常被运用的。

## 十七、从一部小说中的一个 情节谈排除法

有一部长篇小说描写过这样一个情节：勘探队党支部委员华克刚和其他二人，为了寻找地下水去探红鱼洞，突然下落不明。勘探队的同志和当地贫下中农获讯后万分焦急。在分析他们三人失踪的原因时，勘探队代理支部书记林山认为，他们是探洞不慎落水的可能性最大；其他的可能是：迷路、失足落崖、野兽叼走；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当地还潜伏着的敌人搞破坏。但是，勘探队广大群众和当地贫下中农对林山提出的这些可能性都表示怀疑。不慎落水而失踪不可能，因为溪水水位不高，水流不急，他们三人又都会游泳；迷路或失足落崖不可能，因为他们三人中有一个是当地的红小兵，他对那里的每个山洞都很熟悉，而且这段时间又无塌方现象；野兽叼走也不象，因为野兽不可能一下子把三人都吃掉而不留下一点痕迹；当地敌人的破坏，经过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调查核实，也否定了。最后经勘探队和当地党组织、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努力，终于搞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华克刚等三人的失踪，是勘探队内部潜伏着的阶级敌人搞的鬼。那么为什么林山没有估计到这个可能性呢？这是由于林山对复杂的阶级斗争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在分析华克刚等失踪的原因时，只想到可能是当地潜伏的敌人搞破坏，却万

万没有想到可能是自己队伍中潜伏的阶级敌人搞的鬼。就逻辑来说，这里运用的就是排除法。

那么，什么是排除法？排除法的基本要求又是什么呢？排除法是通过排除客观事物具有的某些可能性，从而肯定其具有某种（或某些）可能性的一种推理方法。它的特点是大前提列举事物所具有的各种可能属性，小前提否定其中一种（或几种）可能属性，结论肯定余下的那一种（或几种）可能属性。林山在分析失踪原因时，列举了可能探洞不慎落水，可能是迷路、失足落崖、野兽叼走，也可能是当地潜伏的敌人搞的破坏等几种情况，这是这个推理的大前提；勘探队广大群众和当地贫下中农根据分析和调查，认为不慎落水不可能，迷路或失足落崖也不可能，野兽叼走不象，当地潜伏的敌人搞破坏，也不是，也就是对大前提中列举的几种可能性都一一予以否定了，这是这个推理的小前提。从大前提和小前提的特点来看，这个推理正是用的排除法，但是由于大前提中所分析的几种可能属性没有一个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以在小前提中全被否定了。这样就没有“余下的那一种可能属性”可以作为肯定的结论。由此可见，运用排除法的基本要求是，大前提要尽量列举所有可能性，如果大前提遗漏了事物的某种真实的可能性，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林山所举的几种可能性中恰恰漏掉了“自己队伍中潜伏着的阶级敌人搞的鬼”这样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极其重要的可能性，既然大前提中没有包括正确的可能性在内，怎么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呢？所以说它违反了运用排除法的基本要求。

排除法常常用来排除一些可能情况或错误观点，从而肯定一些可能情况或正确观点。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1) “四人帮”反党集团拼命挥舞“唯生产力论”的棍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证明了他们这一伙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2) 参谋长 ……现在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座山雕跑不了啦！不过，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用大兵团进剿，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地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

参谋长 ……

威虎山倚仗着地堡暗道，  
看起来欲制胜以智取为高。  
选能手扮土匪钻进敌心窍，  
方能够里应外合捣匪巢。（《智取威虎山》）

例(2)，参谋长这段念白和唱词包含了一个推理，这个推理运用的也是排除法。这里大前提提出了攻打威虎山的三种可能情况：或者是强攻，用大兵团进剿；或者是把匪徒引下山来一口一口地吃掉；或者是智取，选能手扮土匪钻进敌心窍，里应外合捣匪巢。小前提排除了前两种可能情况：用大兵团进剿，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地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于是合乎逻辑地得出“欲制胜以智取为高”的结论，最后决定用集体的智慧制定“智取”的作战方案。

排除法的实际运用是比较广泛的，它不仅经常用于论证正确观点，驳斥错误思想或反动谬论，而且在破案、诊断和科学考察、科学实验等一系列三大革命的实践中，都被普遍运

用,例如,在破案中,公安人员和革命群众,可以根据作案现场的情况作出几种可能的分析判断,然后调查核实,排除一些可能性,去伪存真,直至揪出作案的罪犯;在诊断疾病时,医务人员常常根据病人的症状,分析造成同一症状的几种可能,然后通过化验、X光拍片、超声波等一系列检查,排除若干可能,最后确诊病因,以利对症治疗。其他如科学考察、科学实验等也是如此,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 十八、从衣服和炉衬谈类比推理

什么是类比推理呢？我们先来看下面的例子。

(1) 炼钢工人在研究如何提高转炉炉龄时，他们认为提高炉龄的关键在于延长炉衬的寿命。那么，又怎样才能延长炉衬的寿命呢？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从衣服怎样才能耐穿这个普通的生活常识得到启示，触类旁通，终于解决了问题。他们认为衣服的布料结实，缝得细，穿得经心，衣服就耐穿；炉衬砖的质量高，砌得好，在冶炼过程中注意维护，炉衬的寿命也就可以延长。工人同志说：“两年多来，我们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在不断实践中摸索提高炉龄的规律性的。”（《转炉炉龄是怎样提高的？》，《红旗》一九七三年第五期）

例(1)，工人群众从穿衣服的启示到解决延长炉龄的问题这一思维过程中，就是运用了类比推理。这个类比推理的结构是：

衣服的布料结实，缝得细，穿得经心，衣服就耐穿；

（前提）

炉衬的炉砖质量高，砌得好，冶炼过程中注意维护；

（前提）

炉衬寿命就长。（结论）

这个推理的前提是特殊性的，结论也是特殊性的。由此可见，类比推理是从特殊性的前提推出特殊性的结论的一种

推理。其推理方法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甲事物和乙事物具有若干相同的性质，可以推知乙事物也具有甲事物的另一性质。让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2) “裁军”克里空，扩军发了疯。昔日希特勒如此，今日勃列日涅夫也如此。希特勒没有好下场，勃列日涅夫之流更加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在世界革命人民面前，他们都是纸老虎！（《“裁军”克里空，扩军发了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例(2)，这段文章也运用了类比推理。这个类比推理就是根据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都是“裁军”克里空，扩军发了疯，又都是世界革命人民面前的纸老虎这两项相同的性质，推出勃列日涅夫也一定会和希特勒一样没有好下场。

从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运用类比推理不仅有助于解决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因此类比推理在社会实践中运用得比较广泛。那么，怎样才能使类比推理合乎逻辑地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呢？很重要的一条是，结论与前提之间要有必然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类比推理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 1. 前提必须是类比事物的相同的属性

如果类比推理依据的不是类比事物的相同的属性，就会犯类比不当的错误。例如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中胡说什么中苏边界是沿中国江岸划定的，他们拿一八五八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签订的条约进行类比，说这个条约规定哥、尼“边界是沿圣胡安河的右岸通过的”，“尼加拉瓜共和国对这条河的水域拥有完全的占有权和司法权。”于是得出结论胡说什么《中俄北京条约》是同样的例子。这里，

苏修当局就是故意依据事物的不相同的属性来进行错误的类比，从逻辑上说就是犯了类比不当的错误。我国外交部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的文件中严厉地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

当然，任何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都有例外，关于通航江河按主航道中心线划界也是这样。但是，任何例外都必须在条约中作出明确规定。一八五八年哥尼边界条约的第二条和第六条就作了这样的规定。现在我们要问苏联政府：《中俄北京条约》在什么地方规定，中俄边界线是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的？又在什么地方规定，沙皇俄国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拥有完全的占有权和司法主权”？

我国外交部的文件指出了苏修当局用以进行类比的依据是事物的例外情况，苏修的论调政治上是反动的，逻辑上是荒谬的。

## 2. 前提必须是类比事物的本质

如果类比推理依据的不是类比事物的本质而是表面现象，甚至是假象，就会犯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亡国论者根据小而强的英国灭亡了大而弱的印度的历史事实，推论出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必定灭亡大而弱的中国的结论，他们用的就是类比推理。但是亡国论者在这里用来进行类比的根据“敌强我弱”，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因而犯了类比不当的逻辑错误。十九世纪中叶英印战争的时候，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而印度在战争中是孤立的，因此，英国能灭亡印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情况已大不相同，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而中国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红军，有了长期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经验，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在国际上

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有力援助。由于上述本质的不同，就不能进行类比。毛主席一九三八年五月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的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因此，“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历史证明，亡国论者的这个类比推理是错误的，而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是无比正确的。

## 十九、从几个数字谈数词

数字，我们每天都要同它打交道。开会发言、生产劳动、技术革新，往往要用到一些数字。有时，由几个简单的数字所反映的事实，能帮助我们加深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重大问题的认识。例如：

(1)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河北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深揭狠批“四人帮”，鼓足干劲学大寨，迅速掀起了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全省九百万农田基本建设大军，战天斗地，改造山河，规模宏伟，气势磅礴。到目前为止，已经深翻和平整土地两千一百多万亩，完成各种水利工程五万二千六百多项，新打机井十三万八千多眼，配套机井六万九千多眼。（《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河北农村战天斗地气势磅礴》，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例(1)，这里所列举的，不单纯是几个数目字，而重要的是反映了人民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揭狠批“四人帮”，鼓足干劲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表示数目的词叫“数词”，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来计算人或事物的多少的，叫“基数”，如：“一、二、五、三千、七万、零、半”；另一类是用来表示事物的先后次序的，叫“序数”，如：

“第一、第七、初三、初九”。

数词的主要语法特点是：经常与表示单位的量词结合起来使用，一般不直接放在名词前边。比如我们可以说“一台抽水机”、“两本书”、“三盏电灯”等等，而不能说“一抽水机”、“两书”、“三电灯”。

运用数词的语法错误较为常见的是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两”和“二”没有分辨清楚。

“两”和“二”这两个数词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两”是表示基数的，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二”有时表示基数，有时表示序数，如：“二百个人”、“二尺二寸布”中的“二”表示基数；“二年级”、“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中的“二”表示序数。应该注意的是：（一）一般量词（不是表示度量衡单位的“尺”、“斤”、“亩”、“吨”之类的量词）前边的基数用“两”不用“二”；（二）口头上念“liǎng”（两）的地方，书面上不能写成“二”。例如：

(2) 他们在一星期之内装配了二台机器。

(3) 这二种事物，有着不同的性质，我们必须加以区别。

(4) 今天下午我们年级二班进行了乒乓球比赛，增进了班与班之间的友谊。

这三个句子中的“二”都应该改为“两”。其中例(4)的“二班”更易引起误解。从字面看，“二班”是“第二班”的意思，可是联系下文看，“二班”是两个班级的意思。把“二”改为“两”才不会产生误解。

二、分数与倍数没能正确地运用。

分数和倍数都属于基数。“二分之一”、“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十”等等，叫做分数；“一倍”、“十倍”、“一百倍”等等，叫

做倍数。运用分数和倍数时，往往要和动词“增加到”、“增加为”、“增加了”、“减少了”、“减少到”等等相联系。分数与倍数没能正确地运用，往往和不了解“增加到”、“增加为”、“增加了”、“减少到”、“减少了”等这些词的含义有关。例如：

(5) 这个生产队去年集体养猪五十头，今年打算集体养猪八十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

(6) 进口这种仪器，每台要四千元。工人同志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制造，每台成本只化了五百元，不但价格便宜八倍，而且质量也超过了进口仪器。

例(5)，“增加到”应改为“增加了”或“增加”。“增加到”（“增加为”）同“增加了”（“增加”）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包括底数在内，后者不包括底数，只表示增加的部分。如果要用“增加到”这个字眼，那末百分数应作相应的调整，全句可改为：“这个生产队去年集体养猪五十头，今年打算集体养猪八十头，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六十。”

例(6)，增加可用倍数，减少不用倍数。可改为：“便宜了八分之七”或“只占进口价格的八分之一”。

三、定数与约数没有说明确。

定数与约数也都属于基数。定数是表示确定的数字，如：一、十、五十、三分之一、三倍等等；约数是表示不完全确定的数字，如：“几(天)”、“五十上下”、“七十左右”、“成千(人)”、“上万(人)”、“三五(个)”、“十六七(斤)”等等。在说话或写作时没有把定数与约数说明确的表现是把两种说法混在一起。例如：

(7) 我们花了整整五个小时左右，才装好了这台机器。

例(7)，用了“整整”，表明是定数，但后边又用了“左右”，

表明是约数,定数与约数相混。这句话要么说成“我们花了整整五个小时……”,要么说成“我们花了五个小时左右……”。



## 二十、从解放前物价的飞涨谈量词

解放前的物价不断上涨，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有关单位曾经计算出：国民党反动派发行的纸币一百元，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两头牛，一九四一年能买一口猪，一九四三年只能买一只鸡，一九四五年只能买一条鱼，一九四六年只能买一个鸡蛋，一九四七年只能买五分之一根油条，一九四八年只能买两粒米了。这种说明比讲“解放前物价年年涨、月月涨、一日数涨、一涨几倍”具体得多了。原因是运用了具体的数字，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数字后边都有个表示单位的词，如“元、头、口、只、条、个、根、粒”之类。这种表示单位的词，在语法上叫做量词。

汉语的量词非常丰富。比如，牛以头计，马以匹计；桥梁的单位论座，军舰的单位论艘。事物不同，使用的量词也各异。又如，鱼可以论条，可以论筐，还可以论担；炮弹既可以论颗，又可以论发；草药有时论味，有时论帖，有时论包。同一事物可以用不同的量词，然而意义并不相等。因此，选择量词，有对与错的问题，也有好与更好的差别。下边谈谈使用量词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要注意跟名词是不是对口。请看下边的句子：

(1)《水游》是一本宣扬投降主义、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黑标本。

例(1)，要么说“一个黑标本”、“一种黑标本”，要么说“一

本反面教材”。“一本黑标本”不合我们语言的习惯。

量词跟名词不对口的问题，有时要联系上下文来考察，才能发现。例如：

(2) 《风波》这部小说，便是从江南农村的一角入手，描写了张勋复辟事件在一个普通农村引起的一场“风波”。

例(2)，“小说”可以用“部”来计数，这时“小说”指的是成书的中篇或长篇，特别是长篇。“小说”如果指短篇，这时只能用“篇”来计数，不能用“部”。大家知道《风波》是短篇小说，显然，这里把“篇”误写为“部”了。

二、要注意如何使表达的意思明确。请看下边的句子：

(3) 采取了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一般效果很好，只发现几个医院的小病人服药后有腹泻现象。

例(3)，是“几个医院”还是“几个小病人”，不明确。如果是前一种意思，宜将“个”改为“所”，如果是后一种意思，宜将“个”改为“名”。这样才不致使人误解。

根据表达的需要，选用适当的量词，有时可以使语言鲜明、生动。例如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场，杨子荣打死猛虎之后，又听到山上的枪声，知道是匪徒们下山来了。这时杨子荣有一段说白，当中的一句是：“刚刚打死一只，现在又来一群，叫你们同样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一群”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野兽。但人还可以用“一帮”、“一批”等数量来指称，这里作者选用了“一群”，把野兽和匪徒巧妙地联系起来。语意双关，说明这群作恶的匪徒同野兽一样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这样就收到了较好的表达效果。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选用量词一般应该以普通话为标准。古今量词有差异，不但同一事物用的量词古今常有不同，

而且同一量词古今常用于不同的事物。例如“匹”，今天普通话用来称骡马，古代却用来指小鸡（“几匹雏”）。各地方言用的量词也有不少差异，如普通话讲“一辆汽车”、“两台机器”，有些方言却讲“一部汽车”、“两部机器”。如果大家都照自己的方言习惯写作，不但妨碍思想的交流，也不利于促进语言纯洁健康地发展。当然，文艺作品中要描写古代生活或表现地方色彩，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 二十一、从“干净了每一个角落”

### 谈动词和形容词

一个单位，有一次进行了春季卫生大扫除，把整个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同志很兴奋地说：“今天我们进行大扫除，干净了每一个角落！”话一说完，旁边有个同志带有疑问地说：“你这句话好象不合语法。”于是大家就议论起来了。

“今天我们进行大扫除，干净了每一个角落！”这话到底合不合语法呢？确实不合语法。“干净了每一个角落”这个说法尽管意思大家都能够理解，但听起来很别扭。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这里把形容词当作动词用了。我们知道，动词表示的是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的，而动作、行为、发展变化是可以涉及或影响到某些人或事物的。比如“看”这个动作，可以涉及到“书”、“报”、“电影”等等许许多多事物，所以可以说成“看书”、“看报”、“看电影”等等。在语法上，把这里的“书”、“报”、“电影”叫做宾语。宾语总是跟在动词后边的。形容词能不能带宾语呢？不能。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的。它能描绘或说明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而并不象动词那样要涉及或影响到人或事物。比如“结实”这个形容词，可以用来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说成“他很结实”、“这个包裹很结实”等等；但是不能说成“结实他”、“结实这个包裹”。由此可见，形容词不能带宾语是现代汉语语法的一条规律。

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干净了每一个角落”为什么不合语法了。“干净”是个形容词，不是动词，它不能带宾语，而现在它却带了宾语“角落”，因此，就使人听起来感到别扭了。如果说成“今天我们进行大扫除，打扫干净了每一个角落”就合乎语法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打扫”是个动词，可以带宾语，说“打扫干净了每一个角落”，使“角落”成为“打扫”的宾语（这里，“干净”只是用来补充说明“打扫”的）。如果不愿意增加“打扫”这个动词，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修改办法，比如，说成“今天我们进行大扫除，使每一个角落都干净了”，这也是合乎语法的。因为这里“干净”已不带宾语，而只是用来表示“角落”的性质、状态了。

不能带宾语，这是形容词的语法特点之一。形容词还有其他一些语法特点。比如大多数形容词前边能加“很”、“十分”、“非常”等表示程度的副词。一般动词没有这个特点。我们不能说“很走”、“非常走”、“十分走”，而只能说“很好”、“非常好”、“十分好”等等。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应该注意的。许多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它们的前边能加表示程度的副词。比如我们可以说“很赞成”、“非常想念”、“十分了解”等等。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末这种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与形容词怎样区别开来呢？它们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看能不能带宾语，能带宾语的是动词，不能带宾语的是形容词。比如我们可以说“非常想念他”、“十分了解这件事”、“很赞成这种意见”，可见“想念”、“了解”、“赞成”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我们不能说“非常好他”、“十分熟练这件事”、“很正确这种意见”，可见“好”、“熟练”、“正确”，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

掌握了上述动词和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有助于我们正确

地运用它们，有助于我们发现并纠正这方面的语法错误。看下面两个例子：

(1) 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充沛着革命热情。

(2)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那里的工作已经相当开展了。

例(1)，“充沛”是形容词，后边不能带宾语，而这儿却带了宾语“热情”。纠正的办法可以将形容词“充沛”改为动词“充满”。那末，怎么会知道“充沛”是形容词、而“充满”是动词呢？我们可以看能不能在前边加“很”、“非常”、“十分”等等表示程度的副词。我们可以说“精力很(非常、十分)充沛”，而不能说“精力很(非常、十分)充满”。再联系到它们能不能带宾语的情况来看，可以断定“充沛”是形容词，“充满”是动词。

例(2)，“开展”是动词，而不是表示心里活动的，因此，它的前边不能加表示程度的副词“相当”。可以改为“那里的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或“那里的工作已经开展得相当好了”等等。

## 二十二、从“比赫鲁晓夫更赫鲁 晓夫”谈名词和副词

我们说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赫鲁晓夫是长期来就隐藏在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代表苏联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发动反革命政变，夺取了苏联党政军大权，从而使苏联改变了颜色。勃列日涅夫上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在国内大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称王称霸。他的野心之狂妄，阴谋之毒辣比赫鲁晓夫尤有过之。因此，“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这短短的一句话，就非常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苏修叛徒集团头子勃列日涅夫的反动本质。

“更赫鲁晓夫”这种说法比起“更阴险”、“更毒辣”、“更反动”等等说法要形象得多，概括得多。因为，赫鲁晓夫是人所共知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隐藏在苏联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典型人物。用这个臭名昭著的典型人物和勃列日涅夫相比，就可以具体形象地揭露勃列日涅夫的反动本质。这种句子，从语法上看，有一个特点，就是副词“更”和名词“赫鲁晓夫”相结合，用副词去修饰名词。那末，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认为汉语中副词能够修饰名词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谈一谈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副词，以及他们有哪些主要的语

法特点等问题。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词，它经常受形容词、数量词的修饰，而不能受副词的修饰。拿“水”、“工人”、“拖拉机”这些名词来看，能在它们前面加上形容词、数量词，说成“清水”、“一桶水”、“先进工人”、“一位工人”、“新式拖拉机”、“五台拖拉机”等等，而不能在它们前面加上副词，说成“更水”、“更工人”、“更拖拉机”之类。

副词是表示动作、行为、发展变化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肯定、否定等等的。它经常用来修饰动词、形容词而不能用来修饰名词。拿表示否定的“不”和表示程度的“很”这两个副词来看，能用它们去修饰动词或形容词，说成“不跑”、“不高”、“很好”等等，而不能用它们去修饰名词，说成“不水”、“不工人”、“不拖拉机”或“很水”、“很工人”、“很拖拉机”之类。

副词不是很多，但也有一定的数量。

常见的表示程度的副词有：非常、十分、很、最、太、过于、稍微、更、更加、越、极，等等。

常见的表示范围的副词有：都、共、只、仅仅，等等。

常见的表示时间的副词有：马上、立刻、顿时、渐渐、忽然、常常、往往、偶然、永远、一直、一向、已经、曾经、刚刚、才、正在，等等。

常见的表示否定肯定的副词有：不、必、必定，等等。

此外，还有表示重复、连续、语气、频率等等的副词，如：又、再、也、还、却、竟、偏、难道、一再、再三、屡次，等等。

副词所表示的意义一般都比较抽象，因此要判断某一个词是不是属于副词有时比较困难；但是只要掌握它的语法特点，是能够分辨清楚的。识别某一个词是不是副词，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拿它与名词、动词、形容词试行组合，凡是不能修



饰名词而能修饰动词或者形容词的，一般是副词。比如“果然”这个词，是不是副词呢？我们可以拿它与名词组合，“果然水”、“果然工人”、“果然拖拉机”，显然不成话，再拿它与动词或形容词组合，“果然来了”、“果然好了”，有这个说法，可见“果然”是个副词。

根据名词和副词的这些主要语法特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前面提到的“更赫鲁晓夫”这个说法是一种特殊用例，这里把名词“赫鲁晓夫”临时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了。这种词的活用是一种修辞手段，当然不能由此类推，得出副词可以修饰名词的结论。下边的句子不属于修辞上的活用而是语法上的词性误用。

(1) 我们要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勇气。

例(1)，“勇气”是名词，不能用副词“更加”来修饰。可将“勇气”改为“勇敢”，说成“……锻炼得更加坚强、勇敢”，这就合乎语法了。又如：

(2) 这个故事本来很趣味，给他这么一讲，更加吸引人了。

例(2)，“趣味”是名词，不能用副词“很”去修饰。可将“趣味”改为形容词“有趣”，说成“这个故事本来很有趣……”，这就合乎语法了。这儿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名词误作形容词使用。再如：

(3) 他们都愿望自己的劳动能对社会主义祖国有所贡献。

例(3)，“愿望”是名词，既不能在前面用副词修饰，又不能在后面带宾语。可将“愿望”改为动词“希望”，说成“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对社会主义祖国有所贡献”，这就合乎语法了。这儿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名词误作动词使用。

## 二十三、从“你一言，我一语” 谈代词

讲起“我”“你”这两个词，大家都很熟悉。“我”代替说话的人，“你”代替听话的人。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却有另外的用法。例如：

(1) 我们小组昨天开会，研究技术革新问题。老王师傅首先提出他的设想，接着，大家热烈讨论，你一言，我一语，都同意老王师傅的设想，并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连平时不大发言的小张，这次也根据她入厂两年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改革工艺的建议。小组会开得热气腾腾，这是打倒“四人帮”后出现的新气象。

例(1)，“你一言，我一语”中的“你”“我”，并不是指确定的某一个人，而是说明发言的人众多，议论的气氛热烈。这种不确定指某一个人的用法，叫虚指。另外两个代词“他”和“她”，指代的对象是确定的，“他”代替“老王师傅”，“她”代替“小张”。这种确定指代某一个人的用法，叫实指。

代词“自己”“人家”等也有实指虚指两种用法。例如：

(2) 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工作上感到很困难。”

(3) 每个同志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例(2)，“自己”指的是说话人本身，这句话等于说：“我文

化水平不高，……”这是实指的用法。例(3)，“自己”是泛指每一个人，这是虚指的用法。

又如：

(4) 你老是埋怨人家，好象你的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给你造成的。

(5) 你还能和他比呀？人家已经在干明年三月的工作，你呢？

例(4)，这里的“人家”泛指别人，是虚指。例(5)，这里的“人家”指的是上一句中的“他”，是实指。

使用代词要分清实指和虚指。如果在一句话或一段文章中，实指虚指同时运用，就特别要避免实指和虚指相互纠缠，否则就会造成指代不明。例如：

(6) 我拎了行李刚下汽车，就你拿提包，我背棉被，一下子就两手空空了。面对着这一切，我只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头。

例(6)，实指和虚指同时运用，但没有注意避免实指和虚指相互纠缠，因而使人感到“我”这个代词指代不明。在“你拿提包，我背棉被”中，“我”是虚指，泛指欢迎的人；而另两个“我”却是实指，专门指作者。两种不同用法的“我”连在一起，容易使人误解。这段文章可以改为：“我拎了行李刚下汽车，许多人就涌了上来。这个拿提包，那个背棉被，我一下子就两手空空了。面对着这一切，我只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头。”

如果在一句话或一段文章中，代词都是实指，指代的对象也必须明确具体，否则仍旧会造成指代不明。例如：

(7) 小李正觉得口渴，端起凉茶就喝。地主婆鬼鬼祟祟假装也想喝茶，可是她看到自己，就不敢走过来。

(8) 昨天晚上，这个车场的老驾驶员得知要下雪的

消息后，就主动告诉青年驾驶员在冰天雪地情况下行车应注意的事项。场党委领导同志及时组织了讨论，发动群众做好战大雪的准备工作。今天一早，他们又不顾工作辛劳，指导青年驾驶员安全行车。

例(7)，“自己”这个人称代词，指代谁？从“地主婆鬼鬼祟祟假装也想喝茶，可是她看到自己……”这些话来看，“自己”应该是指“地主婆”。这样，就说成了“地主婆看到地主婆”。显然，这是不合作者原意的。“自己”应该改为“小李”。

例(8)，这里有三个句子，主语分别是“老驾驶员”、“场党委领导同志”、“他们”。“他们”究竟指谁？不明确，应该根据作者的原意将“他们”改为“老驾驶员”或“场党委领导同志”。

“我”“你”“我们”“他们”“自己”等，都属人称代词。人称代词是指代人或事物的。代词中还有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指示代词是指点、区别人或事物的，如：“这、那、这里、那里”等等。疑问代词是表示疑问的，如：“谁、什么、怎么样、哪些”等等。同人称代词一样，它们除了实指的用法之外，也都还有虚指的用法。例如：

(9) 他每次到基层，总是参加劳动，深入群众，问这问那，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10) 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了西郊公园，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可高兴啦！

例(9)，“问这问那”中的指示代词“这”“那”，并没有确定指代某一事物，这是虚指用法。例(10)，“这儿瞧瞧，那儿看看”中的“这儿”“那儿”也没有确定指代某一处所，也是虚指的用法。

又如：

(11)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亿万农民学大

寨的洪流，波澜壮阔，滚滚向前，谁也挡不住。

例(11)，“谁也挡不住”中的“谁”是疑问代词，在这里泛指那些妄图阻挡革命洪流的家伙，是虚指用法。

同人称代词一样，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不管是实指还是虚指，使用时也都要求做到指代明确。

## 二十四、从一句话谈结构助词

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大寨人高度的路线觉悟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久经考验的大寨人，勇敢地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

这句话中的“的、地、得”，在语法上叫结构助词，它们的读音相同（都念 de），作用也相似，都是放在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第一个“的”用在“大寨人”和它的修饰语“久经考验”之间。“地”用在“排除”和它的修饰语“勇敢”之间。“得”用在“举”和它的修饰语“更高”之间。这几个结构助词都表示它们的前后的词语有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那么，它们能不能互换呢？不能。这是因为：

第一，修饰语的位置不同，要使用不同的结构助词。

修饰语在前，用“的”或“地”，修饰语在后，只能用“得”。例如“举得更高”，“更高”修饰“举”，修饰语在后，用“得”。“更高地举起”，修饰语“更高”修饰“举”，修饰语在前，就不能用“得”了<sup>①</sup>。

第二，修饰的对象不同，要使用不同的结构助词。

---

① “大家都跑来了，高高兴兴地。”这里的修饰语“高高兴兴”本来是在被修饰语“跑来”之前的，为了表达的需要，倒装在后面了，所以结构助词用“地”，不用“得”。这种句子的特点是结构助词不用在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

“的”和“地”都表示修饰语在前，可是，修饰语的对象如果是名词，只能用“的”，不能用“地”。“久经考验的大寨人”不能写成“久经考验地大寨人”，因为“大寨人”是名词。

第三，修饰语回答的问题不同，要使用不同的结构助词。

修饰的对象如果是动词或形容词，结构助词通常用“地”，但是有时也用“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地”，又在什么情况下用“的”呢？这就要看修饰语回答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了。如果修饰语回答的是“谁”、“什么”之类的问题，结构助词用“的”，如果回答的不是这类问题，结构助词用“地”。比如，“同志们的帮助”，回答的是“谁的帮助”，“热情地帮助”回答的是“怎样帮助”，这里回答的问题不同，用的结构助词也两样。上边例句中的“排除”和“干扰”都是动词，可是它们前边分别用了“地”和“的”，这是因为前者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后者回答的是“谁”的问题。

懂得了上边所说的规律，我们可以用来说明下列句子中的问题了。

(1) 在阳光的照耀下，河水亮的使人眼睛也睁不开。

(2) 听说同志们胜利归来，大家高兴的赶到门口去迎接。

(3) 风湿病的发作一般与季节地变化有关，但病因至今尚未十分明了。

例(1)，“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是“亮”后边的修饰语，“的”应该改为“得”。例(2)的“赶到”和例(3)的“变化”都是动词，“高兴”是回答“怎么样”的，后边的“的”应该改为“地”；“季节”是回答“什么”的，后边的“地”应该改为“的”。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汉语中有一些词兼属动词和名词，如“教育、代表、生活、

影响、计划、报告、发明、工作、领导、武装、希望”等等。它们充当主语或宾语，是作为名词用的，前边的修饰语带“的”，不带“地”。充当谓语是作为动词用的，前边的修饰语带“地”，不带“的”。下边是用错的例子：

(4) 他的先进事迹，使大家受到了深刻地教育。

例(4)，“教育”是兼属动词和名词的，在这里用作宾语，是名词，“地”应当改成“的”。

三个结构助词中，“的”用得最多。有些人看到“我们的学校”和“我们学校”的意思一样，“光荣称号”跟“光荣的称号”意思差不多，就认为多用一个“的”，少用一个“的”关系不大。其实并不全是如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5) 今年夏熟又夺得了丰收，三麦产量超过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八，比前年增长近一倍。

(6) 他们设立了十几张简易病床，先后收治了五十多名新发的结核病病人。

例(5)，多了一个“的”。“超过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等于说产量只比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就是说，赶不上去年，哪里谈得上“又夺得了丰收”？显然，这里把意思说反了，原因就在于多了一个“的”。删了“的”，是说超过的部分有百分之二十八，就合乎原意了。

例(6)，“的”的位置放得不恰当。照字面讲，似乎有种结核病叫“新发的结核病”。应该写作“新发结核病的病人”。

即使在某些句子里，多一个“的”或少一个“的”不影响意思的正确表达，但是如果仔细推敲，也还有选择的必要。例如：

(7) 工人阶级的心最红，眼最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例(7)，这个句子既合乎造句的规则，又不会引起任何误



解。但是因为有了“的”，陈述的对象共有三个：第一个逗号前边陈述的对象是“工人阶级的心”；第二个逗号前边陈述的对象是“(工人阶级的)眼”；第二个逗号后边陈述的对象是“工人阶级”(这四个字承前省略)。句子很短，陈述对象变来变去，没有必要。如果删去“的”，陈述的对象就只有“工人阶级”了。这样一贯到底，不但句子的结构紧凑，语气也显得有力些。

## 二十五、从几条预测天气的谚 语谈时态助词

劳动人民口头上流传的预测天气的谚语，是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观察天气的经验总结。这些谚语不但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天气，而且也是供我们学习群众语言的好材料。例如这里有三条谚语：

蚱蜢扑着脸，下雨不会远。

蚂蚁成了群，雨水不会停。

响过雷，再刮风，有雨也不凶。

第一条用了个“着”，说明蚱蜢扑脸的现象是持续的；如果偶然有个蚱蜢扑一下脸，那就不足为准了。第二条用了个“了”，表示蚂蚁成群的情况是刚完成的；就是说，蚂蚁原来是较分散的，现在都聚在一起了。第三条用了个“过”，是说雷已经响了一阵，然后再刮风；如果雷仍旧在响，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着”、“了”、“过”不能互换，这正是群众语言精确的一种表现。

附在动词后边的“着”、“了”、“过”是时态助词，它们表明动作变化的状态。用“着”，表示动作变化持续不断或者仍然在进行。用“了”，表示动作变化已经完成或刚刚出现。用“过”，表示曾经有什么情况或者有什么经验教训。在大多数句子里，时态助词是不能互相替换的，否则表达的意思就会两

样,甚至语句不通了。请比较:

- (1) 他笑着回答说……
- (2) 他笑了一下,回答说……
- (3) 他到了北京没有?
- (4) 他到过北京没有?

例(1),用“着”,表示“笑”这种动作在持续着,和“说”是在同时进行的。例(2),用“了”,表示“笑”这种动作已经完成,或者刚刚完成,是先“笑”后“说”。这两句的“着”和“了”不能互换,否则句子就不通顺了。例(3)和例(4)的时态助词不同,问的问题也完全两样。前者问的是“他现在是否已经到达北京”,后者问的是“他有没有到过北京这种经历”。

下边是误用时态助词的句子。

(5) 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批判了资本主义,才能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6) 雷锋同志的事迹,一直鼓舞我们前进着。

例(5),“只有……才”构成的句子表示条件和结果的关系,结果部分叙述的动作变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的,不可能有完成、进行等时态,“坚持”后边的“了”应该删去。

例(6),“鼓舞”和“前进”的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着”表示进行、持续,应该接在“鼓舞”的后边,说明推动“我们前进”的力量是持续的。

有人认为:“着”表示动作是现在发生的,“了”和“过”表示动作是过去发生的。这是误解。比如“了”,我们可以说“他昨天到了北京”,指的是过去。可以说“他刚才到了北京”,讲的是现在。还可以说“你到了北京就给我来封信”,是指将来。正因为时态并不等于时间,在日常说话时,有时会出现时态助词互相通用的情况。例如:

(7) 听过·动员报告，他就拿了·决心书找支部书记去了。

(8) 听了·动员报告，他就拿着·决心书找支部书记去了。

例(7)和例(8)这两个句子，虽然也可以看出一点细微的差别来，但是，它们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附带要说一说“了”和“着”的读音。时态助词“了”读“le”（勒，轻声），不读“liǎo”（潦）。例如“了了这件事”，前一个“了”读“liǎo”，是动词；后一个“了”读“le”，是时态助词。时态助词“着”，读“zhe”（遮，轻声），不同于“着衣”的“着”（读 zhuó），也不同于“着凉”的“着”（读 zháo）。“着衣、着凉”的“着”都是动词，所以它们后边还可以带时态助词，如“着了衣”、“着了凉”之类。

## 二十六、从“呢”和“吗”的 选用谈语气词

“呢”和“吗”都是用在句子末了表示语气的词。它们虽然不表示具体的意义，作用可并不小。有时一个句子的许多词都可以不说出来，而“呢”和“吗”却不能省略。比如，有位同志一进门就问：“老李呢？”我们听了准知道他的意思是：“老李在哪儿呢？”屋里有人没听清楚，不知道他找的是老李还是老黎，于是反问一句：“老李吗？”意思当然就是：“你问的是老李吗？”请看，“老李呢？”“老李吗？”这两句话的内容不全靠语气词“呢”和“吗”来区别吗？

当然，表示疑问语气，并不一定非在句末加上个语气词不可。“他在家吗？”也可以说成“他在家？”基本意思一样。可是，仔细辨别一下，这当中仍有细微的差别：用了“吗”，单纯表示疑问；不用“吗”，多少带有几分疑惑的意味。“呢”的情况不同，不用时表示的是单纯的疑问，用了多少带有几分深究的感情色彩。举个例说吧，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方海珍听赵震山说钱守维不知道有台风，于是说：“怎么？他不知道？”为了强调疑惑，这里不用“吗”。接下去又说：“雷阵雨就要来了，怎么把两千包出国小麦放在露天呢？”这里不只是怀疑，而且要追根究底，所以用上了“呢”。

所以，语气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有时可以使语言精练，

有时可以使表达的内容更加丰富。

“呢”和“吗”都表示疑问语气，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简单地讲，用“吗”，仅仅要求听话的人点头或摇头就行了（当然并不排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用“呢”，要求对方回答提出的疑点（谁、什么、哪儿、怎样等等），或者要对方在问句提出的几项内容中选择答案。请比较：

(1) 找老李吗？（回答时只要点头或摇头就行了）

(2) 找谁呢？（要回答提出的疑点“谁”）

(3) 找老李还是找老黎呢？（要在“老李”和“老黎”当中选择答案）

(4) 是不是找老李呢？（要在“是”和“不是”当中选择答案）

懂得了它们的区别，可以来修改下边的句子了。

(5) 人初生的时候，究竟有天赋的才能吗？

例(5)，用“吗”的句子只要求听话的人表示肯定或否定，而句中的“究竟”却表示要追根究底，所以“究竟”和“吗”不能凑在一块儿。这个句子要么删去“究竟”，要么改为：“究竟有没有天赋的才能呢？”

疑问语气，不仅仅指有疑而问，也包括无疑而问。无疑而问就是通常所说的反问。反问句借用了问句的形式，表达肯定或否定的内容。字面是肯定的，真正的意思是否定；字面是否定的，真正的意思是肯定。“难道是这样吗？”意思是“不是这样”。“难道不是这样吗？”意思是“正是这样”。反问句用“吗”的比较多，用“呢”的比较少，因此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反问句的语气词只宜用“吗”，这样就出现了如下的错句：

(6) 有这种革命干劲，哪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吗？

例(6)，是一个反问句。反问句既然借用问句的形式，在

“呢”和“吗”的选用方面跟一般问句不能两样。在问句里，“哪”表示疑问，句末用“呢”，不用“吗”。这个句子如果要保留“吗”，就得删去“哪”。

上边谈了语气词“呢”和“吗”的选用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注意用与不用的细微差别，二是要注意用甲还是用乙怎样才符合语言的习惯。这两方面的问题其实不仅在使用“呢”和“吗”时应该注意，在使用其他语气词时也是这样。我们常用的语气词有“呢、吗、的、了、吧、啊”。现在再以语气词“的”和“了”作个补充说明。

语气词“了”和“的”经常用在句末，表示陈述的语气。可是用与不用，意思不完全一样。比如，“他在农村工作了十多年”，仅仅说明他曾经有过这段经历。如果在句末加上个“了”，说成“他在农村工作了十多年了”，那就是把这段经历算到说话时为止。又如，“他熟悉这里的情况”，是一般的说明；“他熟悉这里的情况的”，含有“确实如此”的意思。同样一句话，末了用“了”或“的”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我知道了”是说“我原先不知道，现在知道”。“我知道的”是说“我本来知道”。

## 二十七、从“为了”同“因为”的区别 谈表示目的关系和因果关 系的连词

在请人介绍情况的时候，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话：“为了时间关系，所以只能简单介绍一下。”这句话对不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为了”这个词的意义和用法。

在汉语里，“和、跟、同、为了、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可以用来连接词、词组或句子，一般叫做连词。“和、跟、同”常用来连接词或词组，如“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为了”和“因为”等，常用来连接句子，如“因为他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刻苦钻研业务，所以工作做得很出色。”“为了”指明采取某种行为的目的，表示目的关系，“因为”指明产生某种结果的原因，表示因果关系。目的关系和因果关系，都是客观事物中固有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句子里，需要用恰当的连词来表示。连词用错了，关系也就变了，表达的意思当然不可能是准确的。上边的例子，本来应该用“因为”，却误用了“为了”，把因果关系误作了目的关系。

在说话写作中，不理解“为了”和“因为”的区别，也有把目的关系误作因果关系的。例如：

- (1) 因为掌握多方面的农业技术，他不知花了多少



心血。

(2) 因为确保工农兵乘客上车，各车场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增加出车率。

例(1)和例(2)中的“因为”都用得不对。“掌握多方面的农业技术”不是“他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的原因，而是目的；“各车场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增加出车率”目的是“确保工农兵乘客上车”；这里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目的关系，“因为”应改为“为了”。当然，也可以改为“因为要”，这样用也是表示目的关系的。

“以便”、“借以”、“以免”、“以防”等，也是表示目的关系的连词。但是，这几个词和“为了”在句子里的位置不同，“为了”一般是放在句首，讲了目的再说行动，“以便”等一般放在两句之间，讲了行动再讲目的，如“练好硬功夫，以便打豺狼”。不了解这种用法，有时也会出现关系混乱的句子。例如：

(3) 为了充分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实质，我们必须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毫不手软，毫不放松，以便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例(3)，前面用“为了”表示目的，后面又用“以便”表示目的，句子别扭。这里说的两个目的，其实只是一个目的两个方面，用不到分开叙述，应该放在一起来说，或者说成“为了充分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实质，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或者说成“……以便充分揭露‘四人帮’的反革命实质，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二者取其一，句子就明白顺畅了。

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除了“因为”，还有“由于”、“之所以……是因为……”等。这些连词，在用法上有所不同。“由于”和“因为”意义相同，用法一样，一般是表示原因的句子在前，

表示结果的句子在后，如“由于他很忙，所以不去了”。用“之所以……是因为……”，表示结果的句子在前，表示原因的句子在后，含有强调的意味。如“他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没有因果关系的句子，是不能随便用上这些连词的。下面这个句子，“由于”用得~~不当~~。

(4) 这种由于集体力量鼓舞起来的无畏精神，作品里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例(4)，这个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语(无畏精神)——谓语(表现出来了)”，其余部分都是修饰语，是一个简单句。句中没有因果关系，“由于”应当改用介词“由”。

“原因”、“结果”之类的名词，也可以表示因果关系。一般地说，句子中不宜把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同“原因”、“结果”等重叠使用，下边的句子宜加修改：

(5) 金训华同志能成为毛泽东时代的英雄，是因为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6) 这个厂生产成绩之所以如此突飞猛进，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广大工人深入地批判了“四人帮”形而上学的谬论。

例(5)，应删去“因为”。例(6)，或者删去“因为”，说“其根本原因是”；或者删去“其根本原因”，用“是因为”，句子就简洁一些。

## 二十八、从“在哈萨克播种小麦 而在北美洲收获”谈表 示转折关系的连词

在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克里姆林宫头目被授予最高勋章，有人问：“功勋何在？”答曰：“创造了奇迹，发明在哈萨克播种小麦而在北美洲收获。”

“笑话”的作者，用简练幽默的语言，深刻地揭露了苏联农业的凄惨景象，辛辣地讽刺了勃列日涅夫所谓“锅里有一只鸡”的假共产主义，逼真地描绘了苏修靠从美国、加拿大进口粮食糊口的叫花子形象。

从地理上看，苏联的哈萨克和北美洲，相距何止万里！“在哈萨克播种小麦”怎么会“在北美洲收获”呢？这样矛盾着的两项，怎样能够连接起来呢？

原来，在语言里，有一些词，诸如“而”、“但是”、“可是”、“然而”、“却”等，可以把意义相反或对立的两项连接起来，表示语意的转折。例如上边引文中的“而”，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而”字的用法有多种多样。它连接的两项，有时是并列的，如“简单而朴素”、“强而有力”；有时是承接的，如“战而胜之”、“一扫而光”。它连接有转折意义的两项，也是一种常见的用法。当然，表示转折关系，还可以用其他连词。例如：

(1) 今年虽然有自然灾害,但我们仍旧夺得了丰收。

(2) 苏联是世界上幅员最广大的国家,过去一直是一个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可是,经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七搞八搞,落到了靠进口粮食糊口的地步。

例(1)和例(2)用“但”、“可是”把语意相反的、矛盾的、对立的两项连接起来,句子关系非常清楚,收到了对照鲜明、表意准确的效果。

在说话或写作中,容易发生的问题是语意并无转折而用上了表示转折的连词。例如:

(3) 小李和小林,应届毕业生,年龄差不过,志向却相同,城市不肯留,决心去农村……

(4) 对他的缺点,不仅不应该袒护,而应该指出批评。

例(3)，“差不远”也就是“相近”。“年龄相近”跟“志向相同”是并列的关系，不能用“却”表示转折。可以把“却”改为“也”。例(4)，“不应该袒护”跟“指出批评”意思一致，不过“指出批评”比“不应该袒护”有进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句子里边两层意思是递进的关系，而不是转折的关系。应该把“而”改为“而且”。“不仅……而且”是用来表示递进关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句子表面上也没有相反的或对立的两项，但是仍旧可以用上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例如：

(5) 我很爱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更爱农村广阔的天地。

例(5)，这个句子包含的两层意思的关系是递进的，然而这里边隐含着更深的思想内容。那就是说：城市虽然可爱，但是有志的青年不能留恋城市，应该到大有作为的地方去。这层意思没有直接说出来。正因为使用了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

“但是”，所以能使读者体会到。

表示转折关系，有时单独使用“但是”、“可是”之类，有时使用成对的连词，如“虽然”跟“但是、然而、可是”搭配，“尽管”跟“但是、却”搭配，“即使”跟“也”搭配，等等。那么，成对使用跟单个使用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有明显的转折关系时才适宜于成对使用，如果表面上没有转折关系而实际上含有转折内容的句子，如前边的例(5)，不宜用成对的连词。

第二，成对使用时，前边一层意思说完之后不能用句号句断。单独使用“但是”、“不过”之类，可以在说完第一层意思时用上句号（一般都是句子较长时才这么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看到“但是”之类用在一段的开头。

第三，一般地说，可以单独用“但是”、“不过”之类，不能单独用“虽然”、“即使”等等，不了解这一规律，就会产生表意不清的问题。例如：

(6) 他虽然已连续两天两夜战斗在第一线，不怕艰苦，克服种种困难，夺取了胜利，这是值得学习的。

例(6)，由于在后边省去了“但是”，句子的关系不够清楚，读来似乎感到语意未完，应该在“不怕艰苦”之前加上“但是”这个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

## 二十九、从句子的基本结构谈 主语的省略和残缺

句子是可以分析的，常见的句子可以分析为两个部分。  
例如：

赤脚医生 || 来了。

新生事物 || 好。

前一部分是句子的陈述对象，指明说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叫主语；后一部分对主语加以陈述，指明人或事物怎么样，叫谓语。有些用动词作谓语的句子，谓语后边还带上个动作所涉及的对象，叫宾语。例如：

社社队队 || 有 | 先进人物。

“社社队队”是主语。“有”是谓语。“先进人物”是“有”涉及的对象，即宾语。

上边的句子可以归纳为一个格式：

主语 || 谓语 | (宾语)

这就是一般句子的基本结构。主语、谓语、宾语即使带上很多修饰语，句子的基本结构仍旧不变。例如：

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 || 从前边来了。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 好得很。

全国的社社队队 || 都有 | 在阶级斗争中成长的先  
进人物。

这些句子中带点的都是修饰语。修饰语是用来限制或描写主语、谓语或宾语的。

主语和谓语虽然是句子的基本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包括上下文）中，却可以省略，特别是主语的省略，更为常见。例如：

(1) 湘剧《园丁之歌》|| 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湘剧《园丁之歌》)|| 歌颂了党领导教育革命取得的辉煌胜利。

(2) (我们)||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我们|| 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3) “四人帮”|| 在一九七四年十月挑起了“风庆”轮事件，(它)|| 紧密配合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

括号里边的是省略了的主语。例(1)和例(2)两个分句<sup>①</sup>的主语相同，于是省去一个。例(1)，说出前边分句的主语，后边分句的主语“承前”省略；例(2)，说出后边分句的主语，前边分句的主语“蒙后”省略。例(3)，两个分句的主语不同，后边分句的主语也“承前”省略，不过不是承前边的主语而省略，而是承前的宾语而省略。比较起来，例(1)的情况较为常见。

省略主语是为了简练，但是，省略主语不能妨碍表情达意的明确。如果不当省而省，那就是主语的残缺了。例如：

(4) 封建地主阶级贩卖“人之初，性本善”的谬论，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5) 小赵终于使她母亲想通了，并积极对她父亲做思想工作。

例(4)，原意是两层意思，包括两个分句，后边分句的主语

---

<sup>①</sup> 由几个句子组成一个大句子，叫复句，原来的句子作为复句的组成部分，叫分句。

“这种谬论”承前省略了。可是这样一省略，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一个简单的句子，误认为逗号之前是主语，那就变成“封建地主阶级贩卖……谬论||不符合|客观事实”，岂不把意思说反了？因此第二分句的主语不能省，应该在“是”字前边加上“这种谬论”四个字。如果要把两句并作一句说，就要在“贩卖”后边加上个“的”，让“谬论”作主语。

例(5)，第二分句的主语省略了，会产生歧义：“对她父亲做思想工作的”是“小赵”自己，还是“小赵的母亲”呢？因此，作者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思把主语添上。

上边所说的“不当省而省”，从结构上看，不是不许可，可是从表达效果上看，是不宜省略的。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主语残缺的情况，那就是从结构上看，句子缺少了主语。例如：

(6) 在听了泥城公社棉花“三黄三黑”的经验以后，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7) 从我们车间多次试制新产品的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搞科研不是轻而易举的，向科学进军必须要有“攻关”的精神。

例(6)和例(7)的头上都用了介词结构，而介词结构是不能作主语的。因此，这两个句子都缺少了主语。其实，陈述的对象是写了出来的，不过，因为拴在“在……以后”、“从……中”这样的介词结构之中，在结构上不能作主语罢了。所以，例(6)只须删去“在听了”和“以后”，让“泥城公社棉花‘三黄三黑’的经验”作主语就行了。也可以保留“听了”，删去“在”和“以后”，同时删去介词“对”，这样就成为两个分句了：“听了泥城公社棉花‘三黄三黑’的经验，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主语是“我们”，前一分句的主语蒙后省略。例(7)只须删去“从”和“中”，让“我们车间多次试制新产品的过程”作主语就行了。



或者删去“使”，让“我们”作主语，让句首的介词结构作全句的修饰语。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我们的语言里，还有一类句子，叫无主句。无主句不同于省略句。省略主语的句子，主语虽然没有出现，但是省略的主语是读者能明确补上的。无主句则不然，虽然没有主语，意思是明确的，结构上也是许可的。例如有些口号和有些文章的标题就是如此。“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句口号，从意义上讲，当然有陈述的对象，可是这个陈述的对象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不必说出来。此外，有一些格言，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吃一堑，长一智”；某些说明自然现象的句子，象“刮风了”、“下雨了”；又如一些公共场合的标语，象“爱护花木”、“禁止吸烟”等等，都属无主句。无主句既然不需要说出主语，当然无所谓主语残缺了。

## 三十、从“张春桥在狂吠”

### 谈主谓的搭配

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有篇文章批判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讲到他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反对华国锋同志时，说他在狂吠。“吠”这个词本来是用来叙述狗叫的，现在用在狗头军师张春桥身上，当然是很合适的，何况张春桥本来就是国民党的狗特务呢！然而这里的主要意思却在形象地描绘这个复辟狂迫不及待、凶相毕露的嘴脸。当我们把反动派比作禽兽时，就可以用上“狂吠”、“嗥叫”、“哀鸣”之类的词。

汉语的词汇是十分丰富的。拿表示鸟兽发声的动词来说，除了“吠”、“嗥”、“鸣”之外，常见的还有“啸”、“吼”、“嘶”、“啼”、“噪”等等。哪些动物的发声该用哪些词来叙述，要根据语言习惯和表达的需要来加以选择，不是可以任意搭配的。比方说，“吠”只能用来叙述“狗”，“嗥”只能用来叙述“狼”，所以习惯上只讲“狗吠”、“狼嗥”，而不说“狗嗥”、“狼吠”，否则就属于主语和谓语搭配不当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虎啸”、“狮吼”、“马嘶”、“猿啼”、“鹊噪”等等，都是搭配得当的。

当然，这里所谓搭配得当，并不是指某一动词只用来叙述一种动物的发声。例如“鸣”，不但可以说“鸡鸣”，还可以说

“蝉鸣”、“驴鸣”；又如“啼”，不但可以说“猿啼”，还可以说“鸡啼”、“乌啼”。所以，某种动物的发声也就不限于用某一固定的动词来叙述。究竟选择哪个动词，这就要根据表达的需要了。比如，“喜鹊叫”跟“喜鹊噪”的意思不尽相同，如果要表达声音嘈杂的意思，应该选用后者。所有这些问题，归纳到一点，就是在写作中要注意主语跟谓语搭配恰当。

主语跟谓语搭配不当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根据产生问题的原因加以分析，可以归纳出应该注意的几点。

### 一、要注意词语的意义。

(1) 在万恶的旧社会，这深沉、凝重的涛声，倾泻着盐民的血泪。

例(1)，主语是“涛声”，谓语是“倾泻”。“倾泻”是指大量的水从高处流下，用来描绘“涛声”不恰当。如果改为“倾泻着盐民的血泪家史”，主谓才搭配得拢。

### 二、要尊重语言的习惯。

(2)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例(2)，主语“英雄事迹”跟谓语“活”搭配不当，因为“事迹”无所谓死或活。修改的办法：或者把“的英雄事迹”五个字删掉，让“革命先烈”作主语；或者把“活”改为“铭记”。

有时，谓语用上了并列的词语，写作时顾了一头，忽略了另一头，这种粗心大意也常使主语和谓语的搭配违反了语言的习惯。例如：

(3) 经过大家的努力，产品的质量已逐步解决或有所提高。

例(3)，主语是“质量问题”，谓语是“逐步解决或有所提高”。说“质量问题已逐步解决”可以，说“质量问题已有所提高”不行。这个句子可以修改为：“经过大家的努力，产品的质

量问题已逐步解决。”也可以修改为：“经过大家的努力，产品质量已有所提高。”

### 三、要摆好词语的位置。

(4) 霞光映着队伍，在雄伟的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前进。

例(4)，踏着坚定的步伐的不是“霞光”，而是“队伍”。这句话用的词并没有什么不妥，由于词语的位置安排不对，主语和谓语的搭配就成了问题。可以改为：“队伍披着霞光，在雄伟的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前进。”

### 四、要考虑修辞的因素。

(5) 工人老师傅的一番话，好比一股强大的暖流说到我的心田。

例(5)，“话”和“说到”本来是可以搭配的，但是因为用上了比喻“好比一股强大的暖流”，反而不能搭配了。这是由于没有考虑到修辞因素而产生的主谓搭配不当的问题。修改的方法可以将句中的“说到”改为“送到”。

## 三十一、从介词跟动词的区别 谈谓语的残缺

我们的语言里，有一类词，叫介词。介词的数量不多，却是经常用得着的。常见的有：

表示时间、处所的，如“自、从、往、朝、沿、在、向、于”等等；

表示依据的，如“在、当、根据、遵照、依照、凭”等等；

表示对象、范围的，如“对、对于、把、被、比、和、跟、同、给、为、关于”等等；

表示目的的，如“为、为了、为着”等等。

介词很象动词，可是它的用途跟动词不一样。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它们的差别：

{ 我到北京。	{ 他在上海。
{ 我从北京	{ 他在昨天

“我到北京”、“他在上海”都是句子，说出来人家懂得是什么意思。在这两个句子里，“到”和“在”是动词，作谓语。“我从北京”、“他在昨天”都不成句，原因就在这儿的“从”和“在”是介词。

介词后边接上名词（如“从北京”、“在昨天”）或接上名词性词组（如“从祖国的边疆”、“在火红的年代里”），组成的单位叫介词结构。介词结构在句子中充当修饰语，通常用来修饰

谓语句。“我从北京”、“他在昨天”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只出现了谓语的修饰语，缺少了谓语。如果说成“我从北京来”、“他在昨天动身”之类，才算把话说完整了。正因为如此，下边的话都缺少谓语，句子是不完整的。

(1) 我自从读了这篇文章之后

(2) 他们在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

例(1)，应该接着说“我”怎么样；例(2)，应该接着说“他们”怎么样，因为“自从……之后”、“在……上”都是介词结构，不能充当谓语。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觉察的，可是一到文章中间，就往往被忽略了。例如：

(3) 我们自从听了金训华同志的先进事迹的介绍以后，我们班级的面貌迅速地改变了。

(4) 这个大队的社员群众，在批判“四人帮”斗争的推动下，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例(3)，“自从……”是个介词结构，后边应该出现谓语，说明主语“我们”怎么样，可是话没有说完，又另外开了个头，说“我们班级的面貌”如何如何了。修改的办法很简单，只须把“我们”放到“自从”之后，说成“自从我们听了金训华同志的先进事迹的介绍以后”，让这个介词结构作全句的修饰语就行了。

例(4)，“在……下”是个介词结构，后边应该出现谓语，说明主语“这个大队的社员群众”怎么样，可是话没有说完，又另外开了个头，说“生产”如何如何了。可以把介词结构放在句首，后边改为“这个大队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再举两个例子：

(5) 公司通讯组为了更好地提高通讯员的写作水平，本刊连载逻辑讲话，供通讯员同志学习参考。

(6) 今年以来,这个大队的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经过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生猪饲养量和圈存量比去年同期都有显著增加。

例(5),开头说的是“公司通讯组”,接着应该说这个通讯组怎么样,可是下边只出现个介词结构“为了……”,话没有说完,忽然另外起了个头,说“本刊”怎么样了。这样一来,谓语就残缺了。修改的方法也很简单,只须在“本刊”前边加上个介词“在”,让“在本刊”这个介词结构修饰谓语“连载”,就没有语病了。

例(6),“今年以来”是全句的修饰语,接着出现的是主语“这个大队的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再往下是介词结构“在……下”和“经过……”,它们是谓语的修饰语。可是谓语并没有出现,便另起炉灶,换了另一个主语“生猪饲养量和圈存量”。前边一句话只说了一半,听的人自然不能满足,应该在两个介词结构后边添上“进一步发展了养猪事业”之类的话,才算表达出完整的意思。

## 三十二、从一副春联谈宾语问题

有个生产队的青年，排了一个锣鼓快板《送春联》的节目，准备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出。可是，在念到“破旧立新，争当闯将；移山填海，看齐愚公”这副春联的时候，排练却停了下来，原因是有人认为“看齐愚公”这个说法不合习惯。经过讨论，大家认为“看齐”这个动词不能带宾语，我们可以说“暂做愚公”，但不能说“看齐愚公”。

原来，在句子中，动词谓语的后面可以带上个动作所涉及的对象，我们叫它宾语。汉语中的动词大部分都能带上宾语，但也有少数不能带的，如致敬、协作、开幕、启程、互助、呐喊、咳嗽，等等。我们可以说“向他们致敬”，却不能说“致敬他们”。可以说“同他们协作”，却不能说“协作他们”。不能带宾语的动词带上了宾语，这是一种语法错误。这种语法错误也是较为常见的。例如：

(1) 宋江百般乞怜高俅，一心想受招安。

(2) 为了摸清发病规律，我们医院挂钩几个单位，经常进行调查研究。

例(1)，“乞怜”这个动词不能带宾语，宜改为“乞求”。也可以说成“向高俅乞怜”。例(2)，“挂钩”这个动词不能带宾语，宜改为“联系”。也可以说成“跟几个单位挂钩”。

不该带宾语的动词带上了宾语，会犯语法错误。可以带宾语的动词，带上了宾语，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可不一定，



因为还有个宾语类型对不对的问题。

宾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名词性宾语，一种是非名词性宾语。例如“进入”这个动词，它带的宾语是名词性的，包括名词及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我们可以说“进入工厂”、“进入另一个阶段”，等等。又如“进行”这个动词，它带的宾语是非名词性的，包括动词及以动词为中心的词组。我们可以说“进行讨论”、“进行改革”、“进行正面教育”，等等。下边是误用的例子。

(3) 我们的工作已经进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制订全面规划。

(4) 同学们把每天发现红铃虫的情况告诉公社，由公社通知生产队，进行各种措施。

例(3)，“进入”后边的宾语不是名词，也不是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应该在句末加上“的阶段”三个字，才符合“进入”所需要的宾语的类型。例(4)，“进行”后边带的宾语是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各种措施”)，不符合“进行”所需要的宾语类型。可以改为“进行防治”，或者改为“采取各种措施”。

绝大多数动词所需要的宾语是名词性的，只能带非名词性宾语的动词为数较少，常见的是“进行、加以、遭到、受到、开始”，等等。宾语类型误用的问题主要是该用名词性的宾语用上了非名词性的。这类错句使人读起来觉得少了点什么，改正的方法往往只须加上个“的”和一个适当的名词就行了。再举两个例子：

(5) 我们必须学习他们那种为革命而刻苦锻炼，每天坚持长跑。

(6) 他们跨过万年冰川，顶住透骨严寒，克服了高山缺氧和体力上的极大消耗，再次登上了最高峰。

例(5),“学习”这个动词应该带名词性的宾语。“他们……刻苦锻炼”不是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是非名词性的,不能作“学习”的宾语,应该加上“的精神”才行。

例(6),“克服”带的宾语是“高山缺氧”和“体力上的极大消耗”。“克服”需要的宾语是名词性的,但“高山缺氧”是非名词性词组;“体力上的极大消耗”虽然是名词性词组,但与“克服”搭配不当。可以改为“高山缺氧和体力上的极大消耗造成的困难”。

当然,另一种误用的情况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这里再补充个例子:

(7)《红楼梦》中的金钊儿,只因同宝玉开了一句玩笑,便遭到了王夫人的耳光。

例(7),“遭到”这个动词带的宾语应该是非名词性的,“耳光”是名词,所以不符合要求,宜改为“打骂”。如果要保留“耳光”一词,可改为:“……便被王夫人打了耳光”。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动词,要求带不同的宾语。名词性的宾语一般表示事物,非名词性的宾语一般表示动作行为。但也有个别动词,既能带名词性宾语,又能带非名词性宾语。象“喜欢”就是这样。“喜欢他”,带的是名词性宾语,“喜欢打球”,带的是非名词性宾语。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 三十三、从“争夺冠亚军”

### 谈动宾的搭配

农场场部的小王在黑板上写了一条消息：“我场秋季篮球联赛男子组的比赛，已进入争夺冠亚军的阶段。今天下午三时，由三连和七连在场部球场决赛。欢迎同志们前往观看。”小李看到之后，顺手将“争夺冠亚军”中的“亚”字措去，成了“争夺冠军”。小高却说不如把“争夺”改为“决定”。小李为什么要措去“亚”字呢？因为两个单位进行冠亚军的决赛，“争夺”的是“冠军”，而不是“亚军”，说“争夺亚军”就成了笑话了。因此，小李措去“亚”字是有道理的。当然，小高主张将“争夺”改为“决定”，说“决定冠亚军”，那也是可以的。

“争夺冠亚军”，从语法上讲，这是一种动词谓语句同宾语不相对应的语法错误，通常叫动宾搭配不当。

动宾搭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1) 我们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例(1)，这个句子里有三种形式的动宾搭配：一是“掌握”这个动词带“武器”这个宾语，属于“一带一”。二是“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动词带着“罪行”这个宾语，属于“二带一”。三是“肃清”这个动词带的宾语包括“流毒”和“影响”，这属于“一

带二”。

常见的动宾搭配不当的情况，大多出现在“一带二”、“二带一”的形式里。其原因往往是由于写作时粗心大意，照顾了一头而忽略了另一头所造成的。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应当注意。例如：

(2) 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总是要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

例(2)，动词谓语“散布”带一个联合词组充当的宾语“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散布”可以同“思想”搭配，但同“方式”搭配就不恰当了。这句话应当再加一个动词，说成“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总是要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和宣扬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就比较合适了。

上边是属于“一带二”的，再来看一个“二带一”的例子：

(3) 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故意地欺骗和麻痹我们的革命斗志。

例(3)，谓语“欺骗”和“麻痹”共带一个宾语“斗志”。“麻痹斗志”可以这么说，“欺骗斗志”可没有这个说法。如果将“欺骗”改为“瓦解”，或者索性删去“欺骗”一词，就合乎习惯了。

除了因为顾此失彼而造成的动宾搭配不当的语法错误外，还有些句子，由于宾语的前面有较长的修饰语，谓语跟宾语之间的距离较远，因而没有照顾好动宾的搭配。例如：

(4) 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一个皇帝，但是并没有丝毫触及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也没有推动农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去推翻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状态。

例(4)，“……推翻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状态”，动宾搭配显

然是不当的。如果把“推翻”改为“改变”，说成“改变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状态”，就比较恰当了。在宾语带上较长修饰语的句子中，应当特别注意动宾搭配是否得当。

附带说一下，动宾搭配的问题不能机械地理解，象“救火”、“打扫卫生”之类的说法，在事理上似乎说不通，但已经是“约定俗成”了，大家都在广泛运用，谁也不会误解。比如“救火”，大家都理解为把火熄灭掉，而不会理解为把火“救”得越来越旺。因此，对于这种语言现象，我们必须承认是合乎规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任意类推，随便“创造”，以致造成语言的混乱，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 三十四、从“‘丧家的’‘资本家的 乏走狗’”谈修饰语

词和词组合在一起，有各种关系，其中一种叫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个词组，是由“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组合而成的。在这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是用来修饰“走狗”的，我们叫它修饰语，“走狗”是被修饰的，我们叫它中心语。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鲁迅用来指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之流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梁实秋之流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极力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否定文学的阶级性，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为地主资本家效劳，所以人们送他一个“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可他狡辩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针对梁实秋的嚎叫，鲁迅十分明确地指出：“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不知道”“主子是谁”，正说明他是只地地道道的“丧家犬”。梁实秋的反动谬论被鲁迅批得臭不可闻之后，他就用极其卑鄙下贱的手段，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妄图陷害鲁迅，“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足见其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极端空虚和贫乏。所以鲁迅说：“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鲁迅抓

住梁实秋之类走狗的特点，在“走狗”之上加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这些修饰语，从阶级本质、特征等方面维妙维肖地刻画了梁实秋之流的丑恶嘴脸，剥下了他们的画皮。

修饰语运用得好，可以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内容。如果运用得不恰当，就会影响文意的表达。修饰语运用不当的现象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 一、修饰语多余。

如“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即将在望”之类。在“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中，“有文化的”修饰“知识青年”，可是“知识青年”本身就含有“有文化”的意思，所以“有文化的”这个修饰语是多余的。“即将在望”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再如：

(1) 大家从广播里得知明天有雨讯的消息，心里就盘算开了。

例(1)，“讯”就是“消息”的意思。“讯”用在这里，不能增添新义，是一种累赘，应当删去。

### 二、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这类搭配不当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不了解词义，有的是因为顾了一头而忽略了另一头。先谈因为不了解词义而产生的问题。例如：

(2) 一天晚上，我和老师傅休戚相关地交谈着。

例(2)，“休戚相关”是个成语。“休”是欢乐的意思，“戚”是悲哀的意思。“休戚相关”，形容利害一致，它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这里作为“交谈”的修饰语，用来说明动作的状态，就产生了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的现象。如将“休戚相关”改为“亲切”就得当了。

(3) 旧社会贫下中农的生活极其困苦，特别是遇上青黄不接的自然灾害。

例(3)，“青黄不接”也是个成语。“青”指田里的青苗，“黄”指黄熟的谷子。“青黄不接”指庄稼还没有成熟，陈粮已经吃完，它不属于自然灾害的范围。“水灾”、“暴风雪”、“地震”等才是自然灾害。这里的“青黄不接”应删去。

再谈顾了一头忽略了另一头而产生的问题。

修饰语同中心语的搭配，从结构上来说，有同一个修饰语修饰联合的中心语的，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修饰语，修饰“革命”和“建设”；有同一个中心语带上几个不同的修饰语的，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一例。遇到上述情况就要全面考虑，不要顾了一头，忽略了另一头，否则会犯顾此失彼的错误。例如：

(4)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我们要勇敢地战斗和学习。

例(4)，“勇敢”是“战斗”和“学习”的共同修饰语。“勇敢地战斗”可以，“勇敢地学习”就讲不通。“勇敢”不能同“学习”搭配。如果将“勇敢”改为“努力”或“顽强”就可以了。

(5) 一切有志气的革命青年要以自己的行动来缩小三大差别，为那光辉灿烂的美丽富饶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例(5)，“光辉灿烂”、“美丽富饶”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修饰语。“光辉灿烂”可以修饰“共产主义事业”，“美丽富饶”却不能。我们可以说“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美丽富饶的祖国大地”，却不说“美丽富饶的共产主义事业”。原因是“美丽富饶”一般用来描绘具体的地方，不能修饰表示理想的、意义比较抽象的名词。

三、修饰语之间有矛盾。

有的句子，用了几个修饰语，但修饰语之间互相矛盾。例



如：

(6) 这种情况，明显地在人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

例(6)，“明显地在人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是一个长修饰语，修饰“存在”。“明显地存在着”，“在人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都讲得通，“明显地在人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讲不通。问题出在“明显地”与“看不见的”，这两个修饰语是互相矛盾的。作者的原意可能是“这种情况，在人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这是十分明显的”，或是“十分明显，这种情况，在人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但组织得不好，把应分开来说的内容，放在一起叙述了。

(7) 我们应该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把自己毕生精力放在当前的工作上。

例(7)，“毕生”修饰“精力”，不错；“当前”修饰“工作”也正确。但是“把自己毕生精力放在当前的工作上”就不行。“毕生精力”就是一生的精力，它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精力。要把“过去和未来的”这一部分精力放在“当前”的工作上，是难以想象的。“毕生”同“当前”在句中有矛盾，应删去“毕生”改为“的”。

## 三十五、从“把竹筏从山区经水路运到加工地点”谈“把”字句

“把竹筏从山区经水路运到加工地点”这句话中用了介词“把”字，可以叫做“把”字句。这个“把”字用得对不对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把”字的主要作用是把动词支配的对象提到动词的前边。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办好农场”这句话，就可以改用“把”字句，说成“我们一定要把农场办好”。能不能用“把”字句，首先要看动词谓语管得着管不着“把”字后边的词语，管得着的才能用。象“把农场办好”的“农场”，在意思上仍是后边动词“办好”的支配对象，换句话说，动词谓语“办好”在意思上管得着“把”字后边的词语“农场”。不符合这个要求，用“把”字句就成问题了。比如：“她刚到养猪场，嫌猪粪臭，总是把手帕捂得紧紧的”。这个“把”字句就不行，因为“捂”住的不是手帕，而是嘴巴、鼻子，所以应该说成“总是用手帕把嘴巴、鼻子捂得紧紧的”。根据这个要求，标题中的那个句子里的“把”字是用得对的，因为动词“运”在意思上管得着“把”字后边的词语“竹筏”。

但是，上面那个句子读起来总觉得别扭，似乎还有毛病。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把”字后边的词语“竹筏”跟动词“运到”离得太远，它们中间插进了“从山区经水路”这样的结

构,所以显得不合适。如果调整一下词语的位置,说成“从山区经水路把竹筏运到加工地点”,这样就好了。至于用否定副词“不”或助动词“应该”、“可以”之类将“把”字后边的词语和动词谓语隔开,则是更常见的毛病。比如说,“我们把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应该不断提高到路线斗争觉悟的高度。”这样的话之所以不合乎一般的语言习惯,就是因为“把”字后边的词语和动词“提高”之间插入了“应该不断”。如果说成“我们应该不断地把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到路线斗争觉悟的高度”,就对了。

上面的分析说明了两点:第一,动词谓语应该管得着“把”字后边的词语;第二,应该尽量让“把”字后边的词语靠近动词,尤其不能用否定副词或助动词把它们隔开。这两点是重要的,是运用“把”字句时必须注意的。但是,“把”字句要运用得好,还应该注意这样一点:“把”字句的动词谓语前后总还要有一些别的词语,也就是说,“把”字构成的介词结构后边不能只是单个的动词。比如,我们可以说“请大家把这份材料学习一下,以后再抽时间讨论”,或者说“请大家把这份材料学习学习,以后再抽时间讨论”,但是不能说成“请大家把这份材料学习,以后再抽时间讨论”,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一般的情形。至于戏曲、诗歌中有“把话拉”,“把船拴”,“把重担挑”之类的说法,或者是为了押韵,或者是为了音节的匀称,是特殊的情形,不能到处套用。

## 三十六、从“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 谈“被”字句

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之后，灾区人民在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英勇奋战，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

“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这个句子的主语是“英雄的人民”，指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人民。谓语是“不可战胜”，它对主语加以描写，说明中国人民具有克服一切困难、打败一切敌人、创造人间奇迹的英雄气概。有人问：“战胜”是个动词，动词的作用是叙述动作、变化的，在这里怎么起了描写的作用呢？原来关键在这里的“可”字。许多动词一加上“可”，就变成形容词或相当于形容词的词组了。如“可爱”、“可靠”、“可亲近”、“可歌可泣”等等。形容词有描写作用，所以“不可战胜”这个谓语不是叙述主语的动作、变化而是对主语加以描写的。

有人把“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写成“英雄的人民不可被战胜”，这个“被”就是多余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被”是加在动词谓语前边，叙述动作、变化，并指明主语是被动者的。“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既然不属于叙述动作、变化的句子，“被”字自然不必用了。

由此可见，“被”字句的谓语必须是动词充当的，不能由形容词充当，更不能由名词充当。下边的句子不合这个要求，应该加以修改。

(1) 经过大家的帮助之后，小王的情绪被稳固下来，革命的热情也高了。

(2) 同学们满怀革命豪情，跨出校门，踏进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被工人同志们一致好评，夸为“听毛主席话的好青年”。

例(1)，“稳固”是个形容词，前边不能用上“被”，应该把“稳固”改为“稳定”。“稳定”虽然也是形容词，但它兼属动词，可以带宾语。在这里，它是动词，前边能用上“被”。

例(2)，“好评”是个名词，而这里需要的是动词，可以把“一致好评”以及后面的逗号删去。或者不用“被”，把“被”改为“得到”，“被”移至“夸”的前面。

那么，是不是凡是用动词作谓语来叙述动作、变化，而主语又是被动者的句子，都要用上个“被”呢？那也不是。下边句子中的“被”也是多余的。

(3) 他从群众中被推选出来，当上了干部，仍旧跟过去一样，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批判、一起劳动。

(4) 世界上有些地区，近年来都被遭受了自然灾害。

例(3)，既是“从群众中推选出来”，主语当然是被动者，没有必要再用“被”。例(4)，“遭受”本来就有被动意味，“遭”、“受”、“挨”这些词前边都不能再加“被”。

“被”字句的主语既然是被动者，那么，动词谓语在意义上就必须管得住主语。比如，“敌人被我们打倒了”这个句子，当中的“打倒”管得住“敌人”，因为可以说成“打倒了敌人”。下边的句子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

(5) 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那个地区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都被克服了。

例(5)，句中的谓语“克服”管得住“困难”，却管不住“破坏”，宜把“克服”改为“战胜”。

附带说一说“被……所”这个格式。

“被……所”由文言文中的“为……所”演变而来。这种格式里的“被”的后边一定要出现主动者，“所”后边的动词也须管得住主语。一般地说，“所”后边的动词如果是单音节的(就是用一个字表示的)，这个“所”不能省。例如“敌人被我们所败”，不能说成“敌人被我们败”，但是可以说成“敌人被我们打败”。可见，“所”在“被”字句里往往是因为有音节上的需要才用上的。

## 三十七、从“革命家长送子务农” 谈兼语式

“革命家长送子务农”这句话，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风尚。广大革命家长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坚决支持子女奔赴农村干革命，为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了贡献。

“革命家长送子务农”这句话，从语法上看，是一个主谓句，但是它同一般的主谓句又不相同。一般的主谓句，谓语不象它那样复杂。如“赤脚医生好”这个句子，只有“好”这一个谓语，很单纯。又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这个句子，谓语“奔赴”虽然带上了宾语“农村”，但就整个句子来看，只有一个谓语，因此谓语也很单纯。再如“我们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这个主谓句，谓语“学习和推广”尽管有两个动词，但就整个句子来看，谓语还是只有一个，即联合词组充当谓语。因此，这个句子的谓语还是比较单纯。但是“革命家长送子务农”这个主谓句，谓语部分就比较复杂。从“革命家长”与“送”的关系来看，“送”是个谓语；从“子”与“务农”的关系来看，“务农”也是谓语。这个句子就有了两个谓语。而“子”既充当“送”的宾语，又兼做“务农”的主语。这种动宾关系和主谓关系套叠在一起的复杂的谓语，语法上称作兼语式。兼语式是较为常见

的。再看两个例子：

(1) 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智取威虎山》)

(2) 叔叔，您还是让我去吧！(同上)

例(1)，“我们”既是“指引”的宾语，又是“向前”的主语；例(2)，“我”既是“让”的宾语，又是“去”的主语。这两个句子都是兼语式。

兼语式有这样一个特点：前一个谓语大都有“使令”、“促成”等的意义，常由“使”、“请”、“叫”、“让”、“派”等动词充当。

懂得什么是兼语式，有助于我们在说话和写作时，自觉地将它与“杂糅”这种结构紊乱的语法错误区别开来。请看下面一个例子：

(3) 最近我们学校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正在不断深入。

例(3)，从形式上看，似乎也象兼语式：“运动”既是“开展”的宾语，又是“深入”的主语；其实不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前一个谓语“开展”没有“使令”、“促成”一类的意思，它只涉及到宾语“运动”，而不能涉及到后一个谓语“深入”。这个句子不是兼语式，而是把两个句子杂糅在一起。纠正的办法是理清它的结构，分成两句：“最近我们学校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这个学习运动正在不断深入。”如果一定要并成一句，可以将一部分意思化作修饰语，说成：“我们学校开展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正在不断深入。”这样，从句子的结构来说，是“主语——谓语——宾语”，属一般的主谓句。总之，原句不是兼语式，也不能用兼语式。

再看一个例子：

(4) 这个故事多么使人感动人心啊！

例(4)，从前后两个谓语的关系来看，是兼语式。“使”有



“使令”的意思，“感动”确实是“使”的结果。但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总感到很别扭，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也在杂糅上：把一个多余的宾语“人心”硬塞了进去。如果去掉这个多余的宾语，句子就通了：“这个故事多么使人感动啊！”如果作者坚持要用“人心”这个宾语，那么就不能用兼语式。宜将“使人”去掉，同时将“感动”改为“激动”。说成“这个故事多么激动人心啊！”这样，就句子结构来说，是“主语——谓语——宾语”，是一般的主谓句，不是兼语式。

## 三十八、从“进”改为“蹲”谈 用词确切的问题

白洋淀有个渔民诗人，写过一首忆旧社会渔民苦的诗：“渔民苦，渔民苦，渔民没有安身处。一到夜晚进庙堂，白天讨饭把门数。”写好后念给人家听，有人说富人们烧香也是“进”庙呀！这时作者想起自己要饭时，夜晚又饿又冷地蹲在庙角落的情景，于是把“进”字改为“蹲”字。这样就与富人们烧香进庙堂分开了，而且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渔民苦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一个“蹲”字改得十分确切。

用词确切，说简单些，就是选用的词语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例如一九七一年八月《安徽日报》刊登的《白衣红心李月华》，其中有一段：

大门一开，一阵寒风吹进片片雪花。李月华认出是草沟大队西南生产队的蒋大娘，赶紧让她进屋坐下。老大娘不肯坐，杂乱地叙述着她外孙的病情。

后来，此文以“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为题，在报上刊载时，将“杂乱”改为“慌乱”，为什么这样改呢？因为“杂乱”指说话多而乱，没有条理，“慌乱”则指由于慌忙而致言语混乱。因此，用“慌乱”要比“杂乱”来得确切。

要做到用词确切，除了对客观事物要有正确、深刻的认识之外，还须对词的意义有透彻的了解。

词有一定的意义，词和意义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一个词往往不止一个意义；另一方面，一个意义又往往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示。了解词和意义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辨析词义，选择最确切的词来反映客观事物。

语言中的词绝大多数是多义的，例如“高”，在“房子高”里是指从下到上的距离长，在“质量高”里是“好”的意思，在“声音高”里是“响亮”的意思，在“程度高”里是“深”的意思。这种有好几个意义的词叫作多义词。

多义词虽有几个意义，但当它出现在一定的上下文里时，意义就确定下来了。如果在一定的上下文里，几个意义都能解释得通，那就有可能产生歧义。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从此就看见许多新的先生，听到许多新的讲义。”“新的先生”和“新的讲义”中两个“新”字，意思上都是两可的。“新的先生”可能是指“新来的”，也可能对作者说是“生疏的”；“新的讲义”可能是指内容的“新奇、新鲜”，也可能不是指内容。为了避免产生歧义，鲁迅在定稿时，改成“陌生的先生”和“新鲜的讲义”。这样，词义就明确了。

不同的词可以表示相同的意义。多数情况是几个词只是基本意义相同，各个词之间有比较细微的差别，并不是在任何上下文里都能互相替代的。例如“明白”和“清楚”，“损坏”和“毁坏”，“处理”和“处置”等等。这些在意义上有比较细微差别的词叫近义词。

用词确切与否，多数是属于近义词的选用问题。选用得恰当，就确切，反之，就不确切。下面着重谈谈选用近义词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侧重之点有差异。

有些词基本意义虽然相同，但意义的侧重之点不一样。例如：

(1)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鲁迅《藤野先生》）

例(1)，句中的“鼓励”一词，在原稿上用的是“奖励”。“鼓励”和“奖励”都有“勉励”的意思。但“奖励”侧重于对已有成绩的赞扬、勉励和奖赏；“鼓励”有发动、使人振作的意义，侧重于对今后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勉励。掌握了这两个词在意义上的侧重点，就可知道，用“鼓励”比用“奖励”更确切。

### 二、表达的语意有轻重。

有些词的细微差别表现在语意的轻重上。例如：

(2) 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鲁迅《坟·题记》）

例(2)，句中“指斥”一词，在鲁迅手稿中原用的是“指摘”。“指摘”和“指斥”都有指出缺点错误加以责备的意思，但“指斥”语意较重，有“痛斥”之意。鲁迅觉得用“指摘”显得分量不够，于是改为“指斥”。一个“斥”字包含了强烈的感情，义正词严，大义凛然，表现了鲁迅对那些自称是“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的切齿痛恨。

### 三、使用的范围有大小。

有些词的细微区别表现在使用范围不完全相同。例如有一篇文章中原稿有这么一句话：“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后来发表时把句末的“出现”改为“涌现”。原因是“出现”和“涌现”虽然都含有产生、显露的意思，但它们使用范围不同。“出现”使用范围广，不论人

或事物、具体的或抽象的、好的或坏的、多的或少的都能用，而“涌现”所指的往往是具体的、好的、大量的事物。这里叙述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不是其他别的，所以用“涌现”更为确切。

## 三十九、从“事情”改为“流言”

### 谈词语的感情色彩

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这段话提到的告知藤野先生的“这事”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鲁迅同级的学生会干事到他住的地方去，说要借他的讲义看，当鲁迅把讲义给了他们之后，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未带走。但干事一走，鲁迅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大意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好的成绩。上文中鲁迅讲到的“流言”就是指匿名信内容的传说。“流言”一词，在原稿中写的是“事情”。把“事情”改为“流言”，不但符合实际，用词确切，而且增加了语言的感情色彩。“流言”是贬义词，用在这儿，表现了鲁迅对这种无中生有、散布流言蜚语的卑劣行径的憎恶。

这就说明，有些词语除了表示一定的意义之外，还明显地带有感情色彩，即褒和贬的色彩。所谓“褒”，就是肯定、赞许的意思，表示喜爱或崇敬的感情；所谓“贬”，就是否定、贬斥的

意思，表示憎恶或鄙视的感情。例如“果断、坚定、鼓舞、团结、成果、意气风发、乘风破浪”是褒义词语，“武断、固执、煽动、勾结、后果、意气用事、兴风作浪”是贬义词语。选用词语，不仅要掌握意义，还要辨别感情色彩，才能更好地表达思想内容，加强语言的准确性、鲜明性。在这方面，我们谈话应该注意的地方。

### 一、使用褒义词语或贬义词语要恰当。

在一般情况下，褒义词语用在好的方面，贬义词语用在坏的方面，不能混淆。下边是误用褒义词语的例子：

(1) 这首诗洋溢着一种消极悲观、孤芳自赏的情调。

例(1)，“洋溢”带有褒义，总是用来表示好的气氛、情绪，而这里说的是一种不好的情调，显然不妥当。可以把“洋溢着”改为“流露出”。

下边是误用贬义词语的例子：

(2) 他的文章连篇累牍都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

例(2)，“连篇累牍”指文章冗长，含有贬义，用在这里不合适。可以改为“字里行间”。

但是，有时为了取得特定的修辞效果，可以将褒义词语用在坏的方面，将贬义词语用在好的方面，这种活用的情况，在修辞上属于“反语”。当然，运用反语跟上边讲的误用是两回事。例如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指出反对革新的顽固分子胡适之流“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并且讽刺说：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

研究好。

这一段话中的“革命家”、“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都是褒义词语，却用于揭露和讽刺，既风趣横生，又辛辣无比。

二、注意中性词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所表现的感情色彩。

词语的绝大部分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即所谓中性词语。但是，中性词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也可以表现出感情色彩来，例如：

(3) 沙四龙 鬼子走了，该把伤病员同志接回来了！

(《沙家浜》)

例(3)，“回来”一词，在一九六七年本里是“出来”。“回来”和“出来”都是中性词，然而“回来”比“出来”能更深刻地表现沙家浜人民群众对新四军伤病员的亲密关系。“接回来”同前面沙奶奶的唱词“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相照应，写出了军民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因此，“回来”用在这儿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为什么中性词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能表现出感情色彩呢？我们可以再举鲁迅修改诗句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鲁迅的“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表达对烈士的哀思，对反动派的愤慨，也写出了自己的坚贞的斗志。诗的五六两句，原稿是“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后来改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眼”和“忍”都是中性词，但这一字之改，就准确而充分地表现出作者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者的阶级友爱来。这是因为“眼看”只说明客观事实，“忍看”则不同，不但说明事实，而且说明了作者对事实的态度，也就是说，包含了强烈的感情。“刀边”改为“刀丛”也是一样。“刀边”描写



凶险的客观环境，“刀丛”更充分表达了作者要揭露白色恐怖的心情。总之，中性词用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由于它传达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表现出爱憎或喜怒，所以能带上感情色彩。当然，语言感情色彩的鲜明，不能单纯理解为选用词语的恰当，从根本上说，这是以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基础的。

## 四十、从铁人王进喜的 一首诗谈押韵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  
天大困难也不怕。

铁人王进喜的这首诗，多少年来一直印在群众心里，活在群众口上，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它原先是铁人在劳动时随口唱的号子。那时铁人一边扛着钻机，一边唱起这个自编的号子，而他的战友们和以“海索——海索”，如同进军的号角，在大草原上回响，有力地鼓舞着人们向地层开钻，向帝修反宣战。后来，这首诗经文字记载下来，便广泛流传开了。再后来，《创业》的作者把这首诗的头两句写入一首歌词，经作曲者谱上高亢激昂的曲子，成了电影《创业》的主题歌，便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回响了。为什么劳动时唱的号子，会变成众口传诵的好诗，人人爱唱的好歌？这是因为唱出了铁人精神，唱出了无产阶级的心声，同时又自然和谐，有韵顺口，利于传诵。好的诗歌押了韵，便于谱曲歌唱；谱了曲的诗歌，插上了音乐的翅膀，能够在人民口头上飞翔。

那么什么叫“押韵”呢？在诗歌里，用若干同韵字（即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放在诗句的末尾，这就叫押韵。象上述铁

人诗句中的“吼”(h-ou)和“抖”(d-ou)，这两个字的韵母(ou)相同，就押韵了；“大”(d-a)和“怕”(p-a)，这两个字的韵母(a)相同，也押韵了。这首诗前两句和后两句分别押韵，念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和谐悦耳。

诗歌押了韵，能使音调和谐，节奏鲜明，易诵能唱，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所以鲁迅主张写诗要讲究节奏和韵律。

除诗歌要求押韵外，戏曲、曲艺等对语言的音乐性也有较高的要求，也需要押韵。散文虽然并不要求押韵，但有时在某些地方适当用韵，有助于提高表达效果。象《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有这样几句：“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诗一样的语言，抒发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无限赞美和崇敬的感情。

押韵在人民群众的语言中用得很广泛，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比如谚语、格言、顺口溜等要求上口易诵，往往都自然地押上了韵。象“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眨眼就要到”“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念起来都有韵顺口。

押韵应该自然贴切，不能离开思想内容去硬凑。鲁迅说过，“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因此，在需要押韵的地方，用词要精心严谨。怎样才能做到押韵既和谐顺口、又自然贴切呢？这需要在用词方面作精心的选择和反复的推敲。

汉语丰富的同义词语给押韵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同是表达“心”这个意思的词语有“心头”、“心坎”、“心间”、“心田”、“心怀”、“心扉”、“心胸”、“心中”、“心底”、“心房”、“心窝”等等，我们可以按内容和韵的需要恰当选用。例如：

(1) 五指飞拨，琴声奔放，

心声和着琴音欢唱；  
赞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呵，  
琴声飞进千万人的心房。（《琴》，《诗刊》一九七七年第八期）

(2) 呵，敬爱的周总理走来了，  
含笑抚着我的肩，  
殷切的期望象春水，  
哗哗流淌润心田。（《周总理用过的一只碗》，《诗刊》一九七七年第六期）

例(1)和例(2)分别用了“心房”、“心田”两个词，既押韵又切合内容表达的需要。下面一首诗由于不善于选择同义词语，可以押韵而未能押韵。

(3) 我是一名清洁工，  
为人民服务记心怀，  
挥舞革命铁扫帚，  
扫除一切旧传统。

例(3)，第二句“怀”不押韵，念起来不顺口，可将“心怀”改为“心胸”或“心中”（“心中”通俗些更好），意思差不多，但有韵顺口了。

同义词语虽然给押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有时不免会碰上找不到合适的字眼，这就要借助于其他一些辅助手段，比如对某些词语的次序作合理的调整，以收到押韵的效果。

(4) 日月星辰，  
见识了您的革命胆略——  
排云驱雾挥臂降魔妖；  
江河湖海，  
看到了您的英明远见——

扭转乾坤凯歌传九霄；……（《我们心向华主席》，一

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文汇报》）

(5)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

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

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智取威虎山》）

例(4)，将“妖魔”说成“魔妖”，例(5)将“改天换地”说成“改地换天”，都是由于押韵的需要对词语所作的调整，但并不改变词语原来的意义。

(6) 头顶一弯月，

脚下灯万盏。

新建的大罐上，

焊工正夜战。（《我们都是半边天》，《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

号）

例(6)，第二句的词序作了调整。“万盏”原是“灯”的修饰语，一般应放在“灯”的前面，而这里由于押韵的需要移到后面去了。

必须指出，运用这种押韵的辅助手段，应该严谨慎重，一方面不能妨碍内容的正确表达，另一方面也要力求通俗自然，合乎习惯，否则会产生硬凑生造的毛病。

## 四十一、从数量词的位置谈 语序的安排

说话和写文章，词句的安排必须依照一定的顺序，这是任何语言都是如此的。不过，有些语言的语序比较固定些，有些语言的语序比较灵活些。汉语属于前者。比如，汉语一般是主语在谓语之前，动词谓语出现在宾语之前，修饰语出现在中心语之前，等等。说是固定，却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数量词修饰名词，位置常常可以灵活安排。我们可以把“公社办的一所学校”说成“一所公社办的学校”，可以把“工人的两项决议”说成“两项工人的决议”。然而这种灵活性仍有一定的限制，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如果不考虑上下文的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班里的三个青年”可不宜说“三个班里的青年”，因为还可以理解为“三个班”的青年。如果要表达这个意思，就得说“三个班里的一些青年”或“三个班里的青年们”等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灵活性所受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往往是在具体的运用中才表现出来的。正因为非常具体，所以不是几句话可以概括。然而，只要在写作时多从读者的角度去着想，这些问题都是不难发现并加以解决的。在这方面，谈谈应该注意的地方。

一、语序的安排，要防止产生歧义，以免引起读者误解。

上边讲的“三个班里的青年”之所以要改变说法，就是因

为不合这个要求。再举两个例子：

(1) 神农、黄帝、尧、舜都是夏朝以前传说中的古代帝王。

(2) 他们顶住透骨严寒，克服种种困难，登上绝顶，再一次从北坡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最高峰。

例(1)，“夏朝以前”的位置摆得不对，应该放在“传说中”之后。原句容易使人误解这种“传说”是夏朝以前就有的。

例(2)，“再一次从北坡”的位置摆得不对，应该放在“登上绝顶”之前。原句容易使人误解“再一次”是指插五星红旗这件事，其实作者要说的是再一次从北坡登上顶峰。而且，“从北坡”修饰插五星红旗，在意思上也很费解。

二、语序的安排，要合乎情理，也就是说，在事理上要讲得通。

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一九六七年的本子中有这样一句道白：

老杨，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发现一只血手套，近旁还有一具女尸。

一九七〇年演出本对这句道白作了这样的修改：

老杨，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发现一具女尸，身旁还有一只血手套。

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呢？从剧情的发展过程来说，发现血手套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但从侦察的过程来说，既然血手套和女尸距离很近，而尸首的体积比手套大得多，所以首先发现女尸，再见到手套，更为合理。这句道白是叙述侦察的过程，所以原句宜加以调整。再举个例子：

(3) (我们)把情况告诉了队长，我们就和队长亲自到工地里去检查，发现小王的这种操作方法是危险的，也

是错误的，于是及时提出了意见，避免了事故。

例(3)，“(我们)把情况告诉了队长”，下边是说队长了解情况之后怎么样，所以应该把“我们就和队长亲自……”改为“队长就亲自和我们……”，才合乎情理。“这种操作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是先说一层意思，再推进一层意思。应该说成“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由轻而重，才合乎层层推进的顺序。当然，如果说成“是危险的，所以也是错误的”也行，不过，这是推论因果的说法，而不是层层推进的说法了。

三、语序的安排，要考虑上下文的连贯，不能使文章前后脱节。

(4)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孔孟的衣钵。他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宣扬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5) 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同学们不怕困难，一路上以解放军为榜样，歌声嘹亮，决心为革命练出一副铁脚板。

例(4)，包括两句，但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不紧密，不如把“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放在“继承了孔孟的衣钵”之前，同时把第一个句号改为逗号，这样就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同“孔孟的衣钵”的关系交代得较为明确了。

例(5)，“以解放军为榜样”下边接“歌声嘹亮”，衔接不够紧密。宜改为两句：“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同学们以解放军为榜样，不怕困难。一路上歌声嘹亮，决心为革命练出一副铁脚板。”

当然，上边讲的只是一般的原则，为了特殊的需要，有时却故意写出不符合一般语序的句子来。例如按照汉语的语序，动词谓语在前，宾语在后。可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却把“有跳车的？”说成“跳车的有？”这是因为按照日语的语序



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而这里正是要用日语化的汉语。这是文学作品为了描写人物故意这样写的,我们不能据此来否定一般习惯的存在。

## 四十二、从一段话的修改谈 句子的简练

关于修改文章，鲁迅曾经教导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许多作者就是这样做的。例如有一位工人作者在他的一篇题为《钢与诗》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次，到渤海湾的一个渔村参加“社教”运动，住在一位贫渔妈妈的家里。有天吃饭时，听到这位贫渔妈妈给当生产队长的儿子忆起三代人的苦。我听后很受教育，当天就写了一首诗：《端起饭碗想过去》。转天整个渔村开大会，领导非让我上去读一读。刚读一半，会场上泣不成声……

一九七六年《诗刊》第八期转载时，作者作了修改：

一次参加“社教”运动，住在一位贫渔妈妈家里。有天听这位贫渔妈妈给当生产队长的儿子忆起三代人的苦，我很受教育，当天就写了一首诗：《端起饭碗想过去》。转天渔村开忆苦大会，领导上让我上去读。刚读一半，会场上泣不成声……

这段文章是介绍《端起饭碗想过去》这首诗的写作经过的，就这个要求来说，“到渤海湾的一个渔村”、“吃饭时”是可有可无的成分。前边说了“听”，后边的“听后”就是多余的；既

然讲了“开大会”，“整个”也就不必要了。“读一读”有尝试的意味，跟“读”的意思不完全一样，删去“一读”，更切合当时的情况。可见，只有反复推敲，认真修改，才能使句子简练。当然，简练并不等于苟简，当删的固然要删，当增的还得增。比如上边修改过的文字中，加上了“忆苦”这个词儿，指明了“大会”的内容，使前后的关系更明确，意思更连贯，这也是必要的。

句子不简练的主要表现是语意重复。造成语意重复的原因，常见的是：

第一，由于对选用的词语的含义没有完全弄明白，自己以为并不重复，实际上是叠床架屋。例如：

(1) 在“三秋”战斗中，他干劲很大，尽管每天汗流浹背，衣服都湿透了，但从不叫苦。

(2) 区图书馆最近举办文艺评论学习班，对一些反映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若干短篇小说，开展了讨论。

(3) 割到田头，贫下中农捎来了茶水……他递给罗冲一碗大麦茶，说笑着聊了几句。

例(1)，“汗流浹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出汗很多，下边的“衣服都湿透了”无非也是说明这层意思，因此显得不够简洁。宜把“衣服都湿透了”删去。

例(2)，“若干”是一个文言词，和“一些”同义。两者用一个就行了。

例(3)，“聊”是一个方言词，意思是“闲谈”，在这里和“说”连用，意思重复，可删去“说”。

总之，在选用成语、文言词、方言词以及较生僻的词语时，要弄清它们的含义，确切掌握它们的用法。

第二，由于没有把上下文连起来观察，不能发现可有可无的成分，或者随手写来，造成不必要的重复。例如：

(4) 我们建议领导重新把过去提出的扩建方案再考虑一番, 尽量做到投资少, 功效大。

(5) 小张想进去抢救, 可是房门紧锁着, 他使用脚踢开门, 扑了进去……

例(4), 前边有了“重新”, 后边又用上“再”, 显得重复。删掉“再”, 既简洁, 又明确。

例(5), 既然说“踢”, 当然用的是脚, “用脚”两字属可有可无的成分。

我们主张删去句子当中可有可无的词语, 这当然不等于否定那些适应表达的需要、有意的重复。请比较下边的句子:

(6) 王进喜和英雄的大庆工人们,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 困难的地方, 困难的条件下, 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夺油大战。

(7) 如何合理密植的问题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问题,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例(6)中“困难”一词出现了三次。正是借助这种重复, 强调了环境的困难, 衬托出铁人王进喜和英雄的大庆工人“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这样的重复是表达所必需的。例(7)就不同, 句中的四个“问题”并不都是必需的。第一个“的问题”和后边的两个“这个问题”都是多余的。删去之后, 一点也不影响原意的表达, 而且更觉清楚。

语言的简练常常是和思想内容的提炼紧密相联的。例如有一篇写王国福同志先进事迹的通讯, 原先的标题是“拉革命车不能松套, 要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后来作了修改, 删去“能”和“要”两个字, 改为: “拉革命车不松套, 一直拉到共产主义!”

经过这样的修改，不只是语言简练，而且思想内容更加深刻。因为原句有了“能”和“要”，着重表现的是一种愿望，经过删改，就鲜明地突出了王国福同志勇往直前，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

## 四十三、从一首民歌谈比喻

这里是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民歌：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这首民歌是歌颂人民公社的，它打了好些比方，既简练，又形象，还能启发人们的想象，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打比方，在修辞上叫比喻。比喻都是由被比的事物（本体）和拿来作比的事物（喻体）构成的。例如“单干好比独木桥”这个比喻，“单干”是本体，“独木桥”是喻体；“互助好比石板桥”这个比喻，“互助”是本体，“石板桥”是喻体。这两个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用上了“好比”，人家一看就知道在打比方，所以通常把这种比喻叫“明喻”。明喻除了用“好比”来联系本体和喻体之外，也可以用“象”、“似”、“如同”、“好象”等等。“合作社铁桥”其实是“合作社象铁桥”或“象铁桥一样的合作社”的意思，“人民公社是金桥”也是把人民公社比作金桥，都是在打比方。不过，这两个比喻没有出现“好比、象”之类的词语，通常把这种比喻叫“暗喻”。此外，“天堂”这个词，在这里是用来比喻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本体没有写出来，用喻体“天堂”来代替了本体，这种比喻通常叫“借喻”。

一般的比喻，都给人以形象的感受，但是有些比喻还引导人们认识真理，例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中的比喻就是这样。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里，作者号召无产阶级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歌词中的“夺回劳动果实”是实行第一个彻底的决裂，“让思想冲破牢笼”是实行第二个彻底的决裂。“牢笼”是比喻剥削阶级制造的精神枷锁。“趁热打铁”的比喻说明无产阶级要抓住革命的有利时机，把斗争进行到底，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这是作者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惨痛教训而得出的一个宝贵经验。这两个比喻把深刻的革命道理，极为形象地表达出来，更利于广大劳动群众理解、接受，并化为战斗的力量。

运用比喻，首先要对本体有正确、深刻的认识，使比喻能显示出事物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无产阶级强烈的爱憎感情。我们还是引《国际歌》中的比喻为例来说明。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一节诗中用“寄生虫”、“毒蛇猛兽”来比喻一切剥削阶级，形象地揭露了剥削阶级贪婪、野蛮、残暴的本质，表达了作者对剥削阶级的无比憎恨和深刻批判。用“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来比喻光辉灿烂的新世界，说明作者对共产主义未来事业的热情向往和坚定信念。由于作者正确、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因而上述的比喻不但非常贴切，而且具有鲜明的爱憎感情。

下面我们来比较两个例子：

(1) 你是一只铁手臂，高呼口号举上天；

你是一枝大毛笔，描画祖国好春天。（《上海民歌选·烟囱》）

(2) 在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偏僻的乡村，已经听见了马达的歌唱，还有那数不尽的烟囱，它们象披发长吟的诗人一样，傲立在一处处过去是一无所有的荒郊！

例(1)和例(2)这两个例子都是想通过对烟囱打比方来歌颂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蓬勃发展，可是效果不一样。例(1)给人的印象是豪情满怀，奋发有为；例(2)给人的印象是精神颓废，无所作为。为什么会迥然不同呢？关键在对客观事物是否有正确、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分不开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看到我们社会真正的精神面貌。

其次，在喻体的选择上，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

一、喻体和本体必须有共同点，而这种共同点越明显、突出，这个比喻就越贴切。

(3) 唐山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解放军在抗震



救灾中的好人好事，就象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华主席和人民心连心 军民情谊似海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4）但是，乌鸦的翅膀绝遮不住太阳的光辉。真理是永远封锁不了的。（《光辉的历史文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

例(3)和例(4)，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共同点非常明显、突出。例(3)，解放军在抗震救灾中的好人好事千千万万，唱不完、赞不尽，这不正象天上的星星一样，看得见，数不清吗？例(4)，无论“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指示封锁也罢，歪曲也罢，伪造也罢，都无法阻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到亿万人民的心坎里，这不正如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一样，真理的传播也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拿来作比的事物和被比的事物之间总有共同之点。这个共同之点有时不说出来，让读者去体会（如“党的恩情似海洋”）；有时说了出来，便于读者理解（如“党的恩情似海深”，这个“深”就是共同之点）。如果两种事物没有共同点，就不能拿来作比。例如“坦克爬山轻如燕，劈开云层直上天”，这里把坦克爬山比作燕子飞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轻”。这个“轻”是轻巧的意思，用来说明燕子是可以的，当作坦克的特征就不确切，尤其是联系下文“劈开云层直上天”来看，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二、选择喻体，除了要求跟本体有共同点，还须注意色彩协调。

这里讲的色彩，首先是感情色彩。例如：

（5）当前，一场声势浩大的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人民战争正在迅猛地展开。猖狂一时的王张

江姚“四人帮”，已成了四条落水之狗。我们如何把这几条被打落水的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批倒批臭？读一读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很有启发的。（“打“落水狗”不能手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汇报》）

鲁迅曾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叭儿狗”、“猫一样的狗”等等来比喻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揭露他们的反动本性，大家都比较熟悉。例(5)用“落水之狗”和“被打落水的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来比喻被粉碎了的、人们深恶痛绝的阶级敌人——“四人帮”，喻体和本体不仅共同点明显、突出，而且感情色彩协调一致。

色彩协调，也指喻体能跟语言环境融为一体。例如：

(6) 他们说，开火车离不开铁道线，干革命离不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灯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永开革命车》，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

(7) 指战员们无比气愤地说，“四人帮”是五指山密林中的毒蛇，南海里的黑鲨，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愤怒揭批江青三次窜到海南岛捣乱破坏的滔天罪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文汇报》）

例(6)，出自铁路工人之口，用开火车离不开铁道线作比，来说明干革命离不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比喻带有个性，既贴切，又新鲜。

例(7)，海南岛的解放军指战员用五指山密林中的毒蛇和南海里的黑鲨来比喻“四人帮”的凶残可恶，这个比喻就地取材，自然贴切。

选择喻体虽然不一定都从人物所处的环境中取材，但是，如果能把比喻跟环境融为一体，往往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 四十四、从《庐山颂》的开头谈比拟

《庐山颂》是一首热情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诗。全诗把写景和抒情揉在一起，情景交融，激动人心。诗一开头就引吭高歌，展现出一幅十分宏伟壮丽的画面。

呵，庐山！  
风吹浪打，  
你傲然挺立；  
电劈雷轰，  
你威镇狂澜！

这里是写庐山，但不是写静止的庐山，而是写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屹立的庐山。这里是写景，但是并非一般的描写，而是倾注了革命的豪情。这种融情于景，使景物“人格化”的写法，在修辞上属于“比拟”。

比拟，除了象上边那样把物当作人来写之外，还可以把人当作物来写，或者把甲事物当作乙事物来写。例如有篇散文叫《翡翠的河》，写的是青年园林工人的成长，文章把“树木”和“树人”结合了起来。当中有一段：

爷爷帮我整理背包，笑逐颜开地说：“去吧，请贫下中农帮你们理理枝，砍掉些横枝歪杈，长成参天大树，好作社会主义大厦的栋梁啊！”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运用比拟，不仅能很好地抒发感情，而且能形象地说明事理。一般地说来，运用比拟

应该注意下列两点。

一、在比拟中应该倾注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好的比拟，不论是拟人还是拟物，实际上都是为了写人，都是在表达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感受。我们抒发的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扁担吱吱，一路奏小调；红旗招展，喜迎春风笑。”写的是春光，却倾注了新社会农民的劳动热情。

再举一首叫《月下织网》的诗中的两段为例：

指儿尖，梭儿快，线儿长，  
织进一片片银色的月光。  
姑娘们把满腔的激情，  
也密密麻麻地织在网上。

待到明日去湖上捕鱼，  
网网撒下金色的希望；  
今晚满地皎洁的月色，  
将化作鱼鳞在网内闪光。

这里把月光和激情拟作网线，是一种以物拟物的写法。这么写是有客观根据的：渔家姑娘们在月下织网，想到鱼汛就要到来，争着为社会主义祖国多作贡献。由于梭儿快，自然觉得月光跟着在晃动；由于月光闪闪，自然想到满网耀眼的鱼群。这一切联想，都出自一个“织”字；而加快地织，却正是姑娘们共同的心愿。把月光和激情织进渔网，是叙事，但主要是抒情。这种抒情能给人以丰富的启示，因为它把渔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生动地表达出来了。

二、运用比拟，既要注意环境气氛，还要注意事物本身的特征，务须使它们协调一致。

下边一首诗，描写的是战士们夜间练习瞄准，把星星当作灯靶的情况：

枪口对准星星，  
星星大吃一惊！

看它呀，躲躲闪闪，  
看它呀，跳跳蹦蹦。

星星，不要害怕，  
战士们的眼睛最清！

我们揍的是空中强盗，  
瞄你，只是练功。

星星笑了，  
笑着跳上准星。

眼睛——星星，一条线，  
牵来了多少黎明！

这里把星星人格化了。先讲它们“大吃一惊”，后写它们“笑着跳上准星”，既反映战士们的严肃认真，又表达出欢乐活泼的心情。整个气氛都是协调一致的。从星星本身来看，“躲躲闪闪”、“跳跳蹦蹦”也是十分切合它的特征的。

下边再举个散文的例子。

我们这次下农村，正值三秋季节。放下背包，跨进大田，哟，好一派丰收的景象！棉桃竞争着张开雪白的圆脸，向我们微笑。水稻直把头来点：“快让我进仓吧！沉

沉的稻穗压弯了我的腰。”

“微笑”、“把头来点”跟丰收的喜悦气氛是协调的。同时，把棉花成熟时的形状拟作“雪白的圆脸，向我们微笑”，把长势好的稻子拟作“把头来点”、“压弯了腰”也符合事物本身的特征，因而使人感到贴切、生动。

下边的例子是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晚上，我们都坐在院子里乘凉，听爷爷讲革命故事。讲到紧张的时候，大家都屏住了气；讲到轻松的时候，大家都拍手大笑。……月亮却探头探脑，冷眼瞧着我们。

“冷眼”旁观是一种漠不关心的表情，有的甚至是不友好的。月亮本来没有什么感情，这里运用了拟人的描写，目的是通过写月亮来叙述人的内心活动。可是，孩子们在听革命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会把月亮看作不友好的旁观者呢？丝毫也找不到要这么描写的根据，所以是外加上去的，宜删除。

## 四十五、从鲁迅的一首诗谈借代

一九三四年鲁迅应日本友人的要求，写了一首《无题》诗，愤怒地揭露和控诉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同时坚信国内外反动派的掠夺屠杀，必将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抗。毛主席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毛主席将这首诗书赠访华的日本朋友，表示深信日本人民将战胜国内外反动派，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全诗是这样的：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一、二句写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遭受日寇和蒋匪帮的压迫剥削，出没在野草之中，痛苦不堪，在法西斯统治下，连悲歌哀吟也都不能了。接着作者写自己的心情和感觉：想到全中国，想到革命前途，相信中国人民在残酷统治下的表面沉默中，必将爆发反抗的春雷，战斗的吼声。

诗中以“墨面”代替受尽压迫的人民，描绘出面容黑瘦、神情憔悴的形象，使人看到的是一幅民不聊生的悲惨图景。这种用有密切关系的事物代替原来要叙述的事物的修辞方式称为借代。这里的“墨面”称为借体，被代替的“受压迫的人民”

称为本体。诗中的“广宇”是广阔的天地的意思，这里用来代替全中国的革命事业，也属借代。“广宇”是借体，“全中国的革命事业”是本体。

借体必须是与本体有密切关系的事物，这样才能相代。上边的“墨面”是事物的特征，“广宇”是事物的处所，所以可以用作借体。当然，借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以“笔墨”代文章，是以工具代事物；以“一针一线”代一切东西，是以部分代全体。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使用借代要注意下列各点：

### 一、借体的含义要明确。

下边是叶副主席的《远望》一诗。

- (1)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例(1)，《远望》这首反修的壮丽诗篇，是叶副主席一九六五年秋天在大连棒棰岛写下的。同年十月十六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称赞。毛主席在他七十二岁生日时，亲笔书写了这首诗给毛岸青和邵华，激励下一代的革命者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诗中的五六两句运用了借代(当然，其中也运用了比喻)。诗句中的“赤道”指非洲，“椰林”指东南亚，合起来泛指第三世界的革命人民；“雕弓”、“匕首”指武器，在这两句里是说第三世界的革命人民敢于拿起武器反击苏美两霸。这里，借体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

下边的一个例子就不同了。

- (2) “奔袭”一百八，  
又战黑山头，



枪声砰砰炮声隆，  
山上山下惊雷吼……

例(2)，“一百八”代替什么？这个借体大家不熟悉，上下文没有交代。从内容看，这首诗写的是军事训练，“奔袭一百八”，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奔袭一百八十里，也可以理解为奔袭一百八十米高地。总之，有歧义。这是借体“一百八”本身含义不明确造成的。

二、选择借体既要注意形象，又要有客观依据。

有一篇散文《珍珠赋》，写洞庭湖地区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当地人民英勇奋斗的业绩。文章的开头是介绍时间、地点，但作者不直接说“湖南的秋天”，而是这样写的：

(3) 芙蓉花开的日子，我和几位同志访问了浩瀚的洞庭湖。

例(3)，文中用“芙蓉花开的日子”代秋天，因为芙蓉花(木芙蓉)在秋天开放。湖南盛产芙蓉，古有芙蓉国之称，用“芙蓉花开的日子”代湖南的秋天就十分合适。这样开头，用生动的形象代替了一般性的叙述，给人以色彩鲜艳、繁花似锦的印象，使人联想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好形势。这样的修辞效果，完全是以客观事实作依据才能取得的。

下边的例子只注意了形象，忽略了事实的依据，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

(4) 闪亮亮的刺刀挑落了一弯晓月，  
清脆的军号唤来朝霞如血。  
哨棚里我随手推开了望小窗，  
在祖国的南疆把新的一天迎接。

例(4)，这里用“朝霞”代替清晨是可以的，符合客观实际。

但是用“挑落一弯晓月”代替驱走夜晚就不妥了。因为弯弯的月牙不是一下子落下去的。我们知道：一个月里只有农历下旬很少几天在拂晓时能看到月牙（又称蛾眉月），而这几天的月牙到天亮后还不会落下去，只是颜色渐淡，在阳光照耀下逐渐隐没。这里说月牙是一下子落下去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缺乏事实依据。

### 三、选择借体要注意褒贬色彩。

用人物形体上的特征作为借体，一般都带有贬义。例如鲁迅的《药》里有“花白胡子”、“红眼睛”、“驼背”这些人物就是用这伙人的外貌特征作借体，都含贬意。

用人物形体特征作借体，有时不带贬义，这往往是用来表示亲昵，如“小胖子”、“小辫子”、“高个儿”等。但在庄重严肃的场合，一般不宜用人物形体特征作借体，所以写英雄人物时运用这种借代方式要慎重。

## 四十六、从词的多义现象谈双关

一词多义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如“运动”这个词，可以指体育活动，也可以指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等等。又如“地方”这个词，在“你住在什么地方”中，指的是处所；在“这篇文章有些地方要修改”中，指的却是事物的一个部分了。词的绝大多数都是多义的，可是在通常的情况下，用在句子当中的词却只有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没有歧义。否则，人们在交流思想时就会发生障碍了。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却利用词的多义性，特地使句子中的某些词获得双重意义。例如：

- (1) “百货”布满土柜台，  
商店搬进钢厂来，  
财贸新花火样红，  
伴着钢花日夜开。

- (2) “万石头呢？”我急切地问。

“喏！”小青年朝天指了指手，我向上一望，在最高的山峰顶上，新出现了一条用青石砌起的大标语：“农业学大寨！”在“大寨”二字当中，果然有个人影在移动。

“他在用水泥砌缝。”小青年说着，快步向上走去，我也紧紧跟着，向峰顶，向“农业学大寨”的方向，向万石头跑去。……（《出山》，《上海文艺》一九七七年第一期）

例(1)，“开”这个词可以指“开花”，也可以指“开门”，还可以指“开会”等等。因为上文有“新花”，所以可以理解为“开花”；因为上文有“商店”，所以可以理解为“开门”。其实这里是语意双关。例(2)，万石头是牯山大队看山老人。他无私无畏，嫉恶如仇，一心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是县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代表。因此，最后一句中的“‘农业学大寨’的方向”，字面上看，是指峰顶上砌有“农业学大寨”标语的地方，但实际上是指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一语双关，语意丰富深刻。

类似上边这样的用词方法，使句中的词具有多重意义，或者为了给人以启示，或者为了增添语言的余味，或者为了说得委婉，或者为了讲求策略，言在此而意不尽在此，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是修辞上的双关。

双关可以利用词的多义性构成，但是更多的双关是利用修辞上的比喻构成的。例如：

(3) 一天，连长带领着几个战士，步行四十里，到郊区去开会，回营时误了吃饭时间，连长带着大家走过一家又一家酒楼饭馆，总不停下来。战士问：“连长，你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呢？”连长不吭声，继续走，最后在一个弄堂口的小饭店前停下来了。连长招呼大家坐下来，给每人买了五分钱的汤，一大碗米饭。吃饱喝足，连长便问大家：“这顿饭吃得怎么样？”战士们笑着回答“满意，满意”，而且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连长这个路带得好。”

例(3)，“连长这个路带得好”，这里的“路”既指找饭店所走过的路，又比喻艰苦奋斗的革命道路。寓意丰富，发人深思。

运用双关，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作品中人物的对话里运用双关，要根据特定的场合，使含蓄与显豁都恰到好处。例如：

(4)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智取威虎山》)

例(4)，这段唱词全部都是语义双关的。表面看来，好象是在庆贺座山雕得到了联络图，实际上是在抒发革命的豪情壮志。这样的语言，在座山雕之流听来，并无可疑之处，但是观众完全了解其中的弦外之音；这样的语言，既符合杨子荣改扮胡标时的身份，又仍然保持杨子荣的英雄本色，具有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这里做到含蓄而不含糊，显豁而不过露。

第二，双关能增添语言的风趣，但是，双关的主要作用却在于它能加深言辞的余味，富有启发性。当然，我们所讲的余味，应该是以认识的深刻性和内容的战斗性为基础的。例如：

(5) 张万山 大叔受过苦中苦，我知道从哪条道上  
才能找到甜上甜，要让大车走正路，咱不掌鞭谁掌鞭！  
(《青松岭》)

例(5)，“要让大车走正路，咱不掌鞭谁掌鞭”这一双关语，说出了以张万山为代表的广大贫下中农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的坚强决心，同时也有力地表现了他们对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深刻认识。

## 四十七、从高志扬的一句唱词谈夸张

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第一场“突击抢运”中，高志扬有这样一句唱词：

装卸工，左手高举粮万担；  
右手托起千吨钢。

这句唱词出于高志扬之口，可它却是所有装卸工的豪言壮语。作者在这里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这样写有几个好处：第一，它比简单地说“装卸工人力量大”生动、形象；第二，它不仅叙述了装卸工人力量大这一事实，而且表达了敢挑重担的英雄气魄；第三，这里用万担粮和千吨钢概括了装卸的包包件件，启发人们联想到装卸工作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紧密联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夸张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扩大、强化的描写的一种修辞方式。

运用夸张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一、要以客观现实为基础，避免主观臆造；要以深切感受为依据，切忌浮夸藻饰。

夸张通过对事物的扩大或强化来表达作者的感受，但这种对事物的扩大或强化不是随意的，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的。如果无视这个基础，那就是谬说了。鲁迅在《漫谈“漫画”》中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

‘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这就说明夸张并不是无视事实、完全凭主观臆造的。

夸张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同时还须以作者的深切感受为依据。如果作者的感受不是强烈的，却要运用夸张，那就容易流为浮夸。诗歌之所以经常运用夸张，这是与它的强烈的抒情性这一特点有关的。我们可以举一首诗为例：

(1) 大红旗下逞英豪，  
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  
哪方干旱哪方浇。

例(1)，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安徽庐江县贫下中农的一首歌谣。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指引下，我国广大贫下中农激发起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干劲。他们战天斗地，意气奋发，任凭多大的干旱都可以战胜。他们引巢湖的水浇灌了受旱的农田，夺取了农业生产的丰收。偌大的巢湖，在千百万贫下中农的擎天手掌里，犹如一只水瓢，可以任意使用。这是多么伟大的英雄气魄！正因为作者在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有深切的感受，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动人的诗句。

如果无视客观的事实基础，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运用夸张手法描写事物，就会脱离实际，那是不可取的。例如：

(2) 一朵棉花打个包，  
压得卡车头儿翘。  
头儿翘，三尺高，  
好象一门高射炮。

例(2)，诗里的“棉花”、“打包”、“卡车”虽然都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但是读了全诗，却感到它总没有反映生活的真

意味,把这两者组合在一起,出现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这种夸张是不恰当的。



## 四十八、从“情意缝在我心里”

### 谈顺连

夜里天冷北风急，  
班长下岗月儿西；  
手拿针线灯下坐，  
为我熬夜缝军衣；  
线儿缝在军衣上，  
情意缝在我心里。

上面六句是反映部队生活的诗。这里，把“缝军衣”的“缝”顺势用到了“心”上，巧妙而形象地表现了我们革命队伍中同志之间的战斗情谊，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当叙述两个有联系的事物时，把本来只适用于前一事物的词语很自然地连用到后一事物上来，以增强语言的生动性、深刻性，这种修辞方式叫顺连。顺连总是由前项和后项组成并由顺连词连接起来的，例中的“军衣”是前项，“心里”是后项，“缝”是顺连词。

顺连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在事物的名称与事物的情况相一致或相反的时候，顺势把用于名称的词语用来说明事物的性质、状态等，从而使得语言生动风趣，简练含蓄，如“乐园大队更乐了”，“熊猫不是猫”，前者是一致的，后者是相反的。事物的名称与事物的实际情况一般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

一定的情况下，二者具有内容上的联系，这时用顺连方式来表达，就能收到较好的修辞效果。

运用顺连这个修辞方式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首先要注意顺连必须恰当自然，意思明确。

运用顺连不能单纯注意字面上的联系，主要的是从内容方面的内在联系来考虑，才能使之恰当自然，意思明确，有助于提高表达效果。例如：

(1) 老支书鼓励我们：青年人，干吧，努力磨炼。劳动能磨亮铁锨，也能磨掉思想上的锈斑啊！（《在广阔天地里·闪光的锨板》，《诗刊》一九七六年二、三期）

例(1)，这里，“磨”这个顺连词很自然地由“铁锨”顺势用到“思想上的锈斑”，说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使思想觉悟越来越高，其中因果关系是清楚的，意思是明确的。

(2) 太平洋上不太平，上海港也不是避风港。（《海港》）

例(2)，太平洋是个地理名称，“太平”这个词与这个海洋的政治状况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因为如今的太平洋已成为苏美两霸扩张势力的必争之地，也是它们与沿岸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矛盾集中的地区之一，太平洋上风云变幻，越来越不安宁，实际状况与它的名称的含意恰好相反，于是顺势在“太平”前面加上“不”并用来做为后项，说明这个海洋地区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用得既自然确切又意思明白。

二、运用顺连还要注意含义丰富深刻，有启发性。

顺连除了要做到恰当、自然、明确外，还要注意做到含义丰富深刻，有启发性。前述例(1)例(2)都符合这种要求，让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例子。

(3) 小冬子偎近爸爸：“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潘行义：“后来，你吴大叔又帮你把红星戴到了军帽上，是不是？”

吴修竹：“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心头上！这些年里，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孩子可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啊！”（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

例(3)，从吴大叔“帮你把红星戴到了军帽上”到“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心头上”，这个“戴”的连用，不仅恰当自然，而且深刻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潘冬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自觉地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使自己成为党的好孩子，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这个顺连的运用概括了冬子的革命品质，概括了整个故事的主题思想，含义丰富深刻，具有极大的启发教育意义。

用事物的名称来说明事物的性质的那种顺连，如“无花果有花”、“稀有金属不稀有”、“干冰不是冰”之类，除了说明事物是怎么样，或者不是怎么样，教人不要“顾名思义”之外，有时还会有更丰富深刻的含义。例如有一篇介绍用科学方法栽培果树的文章，谈了三个问题，用了如下的三个标题：

小年不小

幼树不幼

密植不密

文章首先分析果树之所以有大小年（间年丰产），是因为长树和结果之间有争夺养料的矛盾。再分析果树有所谓“十年穷”的现象（幼树不结果），又是由生长和结果的矛盾造成的。分析矛盾之后，再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即用修剪来控制养料的分配，做到了年年丰产，幼树早期结果，这就是“小年不小”、“幼树不幼”。文章最后分析合理密植的问题，认为解决密植与光照的矛盾，主要在培育好树形，也就是“密植不密”。

上边的三个标题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果树丰产问题的经验的概括,包含了深刻的道理,很有启发性。

总之,这里讲的含义丰富深刻,就是不仅能帮助人们认识事物,而且能帮助人们懂得怎样去认识事物。

## 四十九、从“他信力”、“自欺力”谈仿词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寇加紧侵略、我国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时候，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采取屈膝投降的反动政策。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为了掩盖其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在“救国”的幌子下，胡诌什么：人民“缺乏自信”，不能抵抗日本。鲁迅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对于这种谬论作了有力的批判，指出失掉自信力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他们的谬论不过是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辩护，自欺欺人。文章中说：

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种他信力都失掉了。……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鲁迅在文章中还满腔热忱地赞扬正在“前仆后继的战斗”的中国人民是“中国的脊梁”，说他们“有确信，不自欺”。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月里，鲁迅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真诚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共产党，而对于国民党反动派，仿照“自信力”造出了“他信力”和“自欺力”这两个词来揭露它的反动性。以“他”易“自”，以“欺”易“信”，更换一个字，仿造一个词，就更深刻地显示了事物的本质，同时使语言带有讽刺。

揶揄的感情色彩，增加了表现力。这种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词或词素、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以提高表达效果的修辞方式叫做仿词。

运用仿词这种修辞方式时，主要应注意两点：

一、仿词本身的含义必须显豁。

仿词本身往往有独特的含义，为使人能充分领会，就必须明确显豁。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须借助上下文或让被仿造的词语和仿造的词语同时出现。例如：

(1)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喻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例(1)，“狭人”这个词孤立起来看是不易理解的，但是看了前后的词语和被仿造的词，它的意思就清楚了，前面说“要读经”，后面说“喻的一阵”“也说要读经”。“要读经”的“阔人”指的是反动统治集团的权要人物，那么大叫也要读经的“狭人”，当然指的是“阔人”们的应声虫，即依附于反动统治者的反动文人。鲁迅在这里按“阔”“狭”字面上相反的意思临时仿“阔人”而造“狭人”，既描绘了反动文人的丑态，也尖锐地讽刺了反动统治阶级鼓吹尊孔读经，企图麻醉人民的卑劣手段。因此，“狭人”这个仿造的词既有必要的上下文，而被仿造的词“阔人”又同时出现，在这样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它的意思就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了。

有时，使用仿词这种修辞方式，只出现仿造的词语，被仿造的词语并不出现，而意思仍然是显豁的，原因是被仿造的词语是大家都熟悉的。例如：

(2) 龙二井又有油和水的矛盾，这是它的特殊性。

周队长说：要促使矛盾转化，就要捞水，把水捞干。我们

想一不做，二不休，搞它个水落油出！（电影文学剧本《创业》）

例(2)，“水落油出”是仿“水落石出”而造的，指的是在石油大会战的特定环境中，石油工人学习了《矛盾论》，认识了油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了龙虎滩二号钻井一定能出油的科学论断，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鲜明地显示了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巨大威力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以“油”易“石”，一字之改，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而被仿造的词语“水落石出”因为是群众所熟悉的成语，虽然在这里没有同时出现，却毫不妨碍对仿造的“水落油出”的理解。

## 二、仿词本身的含义应力求丰富深刻。

一个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仿词决不是现成的语言材料所能代替的，正因为如此，运用仿词就应该是使语言具有更丰富深刻的含义。试看下面的例子：

(3) 多少年来，苏美两家凭借着它们大量的炮舰、船只，任意在公海上耀武扬威，横冲直闯，它们两家实际上已经把公海变成了它们的“私海”。（《驳海上霸王的诡辩》，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例(3)，仿“公海”而造的“私海”一词，巧妙地利用了“公”的反义词“私”，有力地揭露了两霸飞扬跋扈、任意侵犯他国利益的强盗面目以及妄图化“公”为“私”、从划分势力范围到独霸世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侵略野心。“私海”一词的仿造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增强了语言的尖锐性。如果用现成词语“领海”，就远不如“私海”来得尖锐、突出。由此可见，利用反义词来仿造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更易揭示事物间的矛盾，更能表达深刻的含义。

(4) 什么是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也很清楚的。而阴谋家、野心家王洪文心目中

的“一元化”，却是他的“一人化”，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一帮化”。（《是“一元化”还是“一帮化”，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例(4)，这里的“一人化”、“一帮化”是按照“一元化”临时仿造的。这两个仿造的词恰好尖锐有力地揭露了王洪文这个政治流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面目：他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帮派，阴谋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企图把社会主义江山变成他们的“帮天下”。他目中无党，只有他自己，只有他一帮。这里仿词手法的运用正刺中这批反党分子的要害，含义丰富深刻。

至于明明有现成的恰当的词可用却偏要去造一些不伦不类、谁也不懂的词，那就不是仿词而是生造词语了。例如：

(5) ……从事这工作决不是渺小，而是渺大。

例(5)，从形式上看，“渺大”是仿“渺小”而造的，但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渺”是微小的意思，那么，“渺”与“大”组成一个词，到底是说“大”还是说“小”，令人费解。这种生造词语只能造成语言的混乱，是应该避免的。



## 五十、从替“四人帮”画像的 几句话谈同字

在狠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位老工人用概括的几句话替“四人帮”画了一幅像：

挂着共产党的牌子，坐着当权派的位子，  
过着资产阶级的日子，走着资本主义的路子。（《掀起批  
判“四人帮”的革命怒潮》，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对于“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这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这伙地地道道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幅画像真是象极了。它起到了揭露敌人、批判敌人的战斗作用。

勾勒这幅画像的几句话，在形式上有个特点，就是每句句末的一个字都是相同的。这种用相同的字放在每句末尾的语言形式，在修辞上叫做同字。同字可以使语言顺口易记。比如上面四句话，每句都以“子”字结尾，念起来琅琅上口，并因“子”字的重复出现，容易引起意义上的联想，便于记诵。

同字需要在每句句末重复出现相同的字，但由相同的字构成的各个词却是互不相同的。比如上面四句话中，“牌子”、“位子”、“日子”、“路子”分别为四个不同的词。如果由相同的字构成的各个词也是相同的，就不属于同字，而属于反复了。不妨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1) 华国锋主席当我们党的领袖，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放心，一万个称心。

(2) 毛主席放心，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红心永向华主席》，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例(1)，“一千个放心，一万个称心”都以“心”字结尾，而“放心”、“称心”又是两个不同的词，这是“同字”。例(2)，情况则不同，虽然各句也都用了“心”字结尾，但由“心”字构成的是同一个词：“放心”。这就不是同字，而是反复。

同字是人民群众喜欢采用的一种修辞方式。例如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贯穿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拥护，代表们都说“这样干，有劲头，有奔头”。“有劲头，有奔头”这朴素的赞语采用的也是同字这种修辞方式。工农群众的熟语、谚语、豪言壮语以及顺口溜、说唱等等，要求上口易诵，也常常采用同字这种修辞方式。如“困难是石头，意志是镢头，镢头敲石头，困难就低头”就是这类例子。文章标题如果自然地采用同字也利于上口，便于记诵，例如有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杂文，标题为《帽子·棍子·骗子》，就是运用同字这种修辞方式。

运用同字，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一、同一个字的重复，一般应该是内容的重点所在，这样可以收到突出重点的表达效果。例如：

(3) 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有了这“三股气”，封锁怕什么？扔原子弹怕什么？我们顶天立地地站着！（电影文学剧本《创业》）

例(3)，当阶级敌人冯超对我们自力更生方针进行恶毒诬

蔑和猖狂挑衅时，受到石油工人周挺衫怒不可遏地痛斥。这响遏行云的语言，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意志。这里连用了“民气”、“士气”、“志气”三个词，使“气”字在句末一再出现，更加突出了表达的重点，充分表现了大庆工人敢于同帝、修、反斗，同错误路线斗，同大自然斗的顶天立地的伟大革命志气。真是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帝、修、反的威风！

二、同一个字的重复，如果能恰当地运用于意思截然相反的两个语句之中，可以收到显示矛盾对立的表达效果。例如：

(4) 惯于欺世盗名的“四人帮”，无耻地把自己封为新生事物的“代表”，“文艺革命的旗手”，实际上他们是盗窃文艺革命成果的扒手，是残害革命文艺战士的黑手。

(《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

例(4)，“旗手”与“扒手”、“黑手”意思截然相反，这里由于同一个“手”字的重复出现，更鲜明地显示了它们的矛盾对立，从而有力地剥下了“四人帮”的画皮。

三、由同字构成的词应该是规范的，不能是生造的。试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5) “四人帮”对革命同志扣上“黑帽子”，是为了向革命者狠狠地“打棍子”。(《帽子·棍子·骗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文汇报》)

(6) 林彪和孔丘唱的是一个调子，走的是一条路子，复的是一个礼子。

例(5)，“帽子”、“棍子”这两个由“子”构成的词，都是现成的，合乎规范的词，因此自然贴切，语意鲜明。例(6)，“调子”、“路子”两个词也是现成的，合乎规范的，运用得也自然贴

切,但“礼子”一词显然是为了追求形式,硬凑“同字”而生造出来的,因此念起来不顺口,听起来语意不明确。在运用同字时,这种生造词语的现象是必须避免的。

## 五十一、从《国际歌》的几句歌词的 重复出现谈反复

列宁指出，国际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战歌。歌中反复出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几句歌词，更显示了无产者实现共同的目标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表达上的需要，在文章中重复出现某些词句，这就是修辞上的反复。反复，从形式上看，有词的反复，有词组的反复，也有句子的反复；有连续的反复，也有间隔的反复。从作用上看，有的是为了突出某种思想或强调某种感情，有的是为了显示文章层次或构成特定旋律。当然，在具体的作品中，反复可以兼有这两方面的作用，不过往往有所侧重罢了。上边举的《国际歌》中的反复，主要是用来突出主题思想和加强战斗气氛，同时也起了标志段落和增添节奏感的作用。

下边谈谈运用反复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一、运用反复来强调思想感情，必须抓住关键性的词句。例如：

(1) 红日照我心头暖，  
石油工人斗志坚。  
提起“四人帮”，  
牙齿咬得钢筋断，  
手拍井架轰轰响，  
眼望长天怒火燃！

“两论”做指南，  
驾起顶风船，  
针锋相对，  
发出豪迈誓言：  
大干社会主义有理，  
大干社会主义有功，  
大干社会主义光荣，  
大干了，还要大干！（《走遍油田》）

例(1)，接连几个“大干社会主义”，反复出现“大干”，显示了石油工人跟“四人帮”针锋相对，为建设社会主义团结战斗的决心。

(2) 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例(2)，这里排列了四个相同的句式，而且重复出现了四个“使”，四个“一定”，这是用来讽刺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孔孟之道禁锢人们的思想，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的。同时，这四个“使”和四个“一定”还把反动势力的顽固性描绘了出来。这种用法，初看起来似乎很平淡，实际上含义深刻，这正是精心安排的结果。

有一篇报道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解放军驻唐山某部报务员吴东亮同志在十八分钟内抢救出电台，首先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

现在的时间是四点整。

从三点四十二分地震发生到四点，这中间仅仅只有十八分钟。

在这十八分钟里，吴东亮冒着生命危险，三进三出摇摇欲坠的报房。

这十八分钟，饱含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

这十八分钟，凝结着一个革命战士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忠心！

这十八分钟，显示了一个通讯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红色电波通北京》，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这十八分钟”反复出现，强调了时间的紧迫，任务的艰巨，因而突出了吴东亮同志英勇战斗、舍生忘死的精神，表现出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二、文章的每段开头或结尾反复出现某些词句，常常带有指明层次的作用。这样用时，要求每个段落有明确的重点。例如：

（3）王张江姚“四人帮”，是罪大恶极的“复辟帮”。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迫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凶狠毒辣的“阴谋帮”。他们结成宗派，死抱一团，自成体系，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祸国殃民的“害人帮”。他们

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四不干实事，手中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专门舞文弄墨，四出游说，制造谣言，搞乱人心。……（《狠批“四人帮” 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红旗》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

例(3)，这样安排，由于运用了反复，层次清楚，观点鲜明。

文章的层次是由内容决定的，如果内容组织得凌乱，即使在文字上运用了反复这一修辞方式，也不可能收到表达上的效果。例如：

(4) 革命歌声震天响，  
千军万马斗志昂，  
牵着河水上梯田，  
高山处处献棉粮。

革命歌声震天响，  
泰山压顶腰不弯，  
双手劈开千重岭，  
誓为革命夺高产。

革命歌声震天响，  
男女老幼上战场，  
艰苦奋斗谱新篇，  
喜看稻海千重浪。

例(4)，诗分三段，内容是交叉的，有不少重复之处。每段重点不突出，也看不出段与段之间的关系，所以显得有些凌乱。虽然每段的开头运用了反复的手法，还是不能起到分清层次的作用。



## 五十二、从刘禹锡的一首七律谈对偶

提起对偶，有些人会想起旧体诗当中的律诗来，因为律诗都是要用上对偶的。比如七言律诗吧，每句七个字，一共八句，每两句成为一联，当中的两联必须是对偶，有些七律的第一联也用上对偶。我们可以拿唐朝中期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作例：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遭到保守派迫害，被贬到边远地方做官。后来得到机会返回洛阳，旅途中遇到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写了一首诗送给刘禹锡，调子比较低沉。刘禹锡便写了上边这首诗回答他。

诗中第一联写被贬谪的地方和离开中原的时间，以“凄凉地”和“弃置身”（被排挤被打击的人）表达处境和心情。第二联用了两个典故<sup>①</sup>，写出对旧友的怀念和对人事沧桑的感慨。第三联是全诗的主旨，指出了新生事物必然要战胜腐朽事物的客观规律，也表现了作者朝前看的乐观精神。第四联记叙

---

<sup>①</sup> “闻笛赋”，指《思旧赋》，是晋朝人向秀写的思念死去的朋友的文章。“烂柯人”是神话中的人物，传说有人到深山打柴，看到两个小孩在下棋，一局终了时斧头柄（就是诗中的“柯”）已经烂了。

白居易赠诗的事，同时也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喜悦。所以，诗的四联，其实是四层意思。

这首诗，象唐朝人的许多律诗一样，前边三联都用了对偶。对偶有上下句，不但字数相等，而且结构一致。拿这首诗的第三联来看，“沉舟”跟“病树”相对，“侧畔”跟“前头”相对，“千帆过”跟“万木春”相对，十分工整。拿第一联来看，“凄凉地”跟“弃置身”相对，“巴山楚水”是处所，“二十三年”是时间，所以也能相对。比较起来，第一联不如下边两联对得那么工整，这就是所谓“宽对”。可见所谓结构一致，只能是相对的。

对偶的优劣，主要决定于内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所以脍炙人口，首先，因为它形象地说明了新生事物前途灿烂这条真理。其次，也因为运用了对偶这一形式，读来顺口，容易记忆，便于流传。

从上下句之间的关系看，对偶大致有三种：

一、正对 上下句从不同角度或两个侧面来说明同一事理，内容互相补充。上边那首七律的对偶，都属正对。又如：

(1) 光辉业绩千秋颂，革命路线万代传。

(2)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插队落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反对 上下句形成对比，往往是公与私、新与旧、好与坏等等的矛盾对立。例如：

(3)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自嘲》）

(4) 旧社会比黄连更苦，新社会比蜜糖还甜。（谚语）

三、串对 也叫流水对，上下句有承接、因果、递进等关系。例如：

(5) 奋起千钧棒，砸烂“四人帮”。

(6) 吃过黄连苦,方知蜜糖甜。(谚语)

形式的整齐匀称,是对偶的显著特点,但我们不能故意在形式上雕琢。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运用对偶要求整齐匀称,但根据内容的需要,可以有灵活性。例如:

(7) ——掌上有老茧呵,  
高举红旗手不抖;  
——肩上有硬肉呵,  
重担上身不摇晃。(《庐山颂·干校天地·誓言》)

例(7),从内容上看,是描述革命干部在干校经受锻炼的收获。从形式上看,上下句整齐匀称,但由于内容的需要,避免字面的重复,也不强求词性的相当(如“高举红旗手不抖”与“重担上身不摇晃”相对),然而顺口易记的特点并未稍减,上下句互相映照的修辞效果,仍然显著。

第二,上句和下句不仅在形式上要整齐匀称,而且在内容上也应该轻重相称,大小相宜。如果只讲究形式的整齐匀称而不注意内容的相称相宜,那是不可取的。下边是使用不当的例子:

(8) 场地上,粮食堆成了山,玉米笑裂了嘴,……

例(8),粮食跟玉米相对,可是粮食包括了玉米,大小不相称,这种对偶就是不妥当的。

## 五十三、从感情、气势的表达谈排比

一篇文章，记叙事情，总得把事情写清楚；阐述道理，必须把道理讲明白。除了这个基本要求之外，有些文章有时还要突出地把作者的感情、说话的气势表达出来。表达感情、气势不外乎锤炼词语和选择句式。例如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一文，以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用精炼的词语和整齐的句式明确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文章说：

他们实际上另立了一个中央，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反对和迫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和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诋毁和诬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破坏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权威，大树特树“四人帮”的反革命权威。他们践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作风，煽起各种反动思潮，不停顿地“打倒一切”，无休止地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层层揪“代理人”，处处抓“走资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党的组织搞乱，把革命的队伍搞乱，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一切。他们是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罪魁祸首。

这段话痛斥了“四人帮”篡党的罪行，从他们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到践踏、破坏党的纪律、作风，再以三个“搞乱”，三个“破坏”指出他们的反党行径所造成的恶果。文章充

分表达了强烈的感情和革命的气势，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象这样把结构相似、意思关联、语气一致的语句一连串地排列在一起，借以表达感情和气势的修辞方式，叫做排比。

从内容上看，排比有两种：

一、排比的几项虽然互相关联，却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例如：

- (1) 插队山乡已三年，  
妈妈来信要我寄张像，  
说要看看女儿的容貌，  
三年来变得怎么样。

妈妈呀，我的变化可大啦，  
你到底想看哪张像？  
是灯下读毛主席著作，  
还是长工屋里听老贫农把家史讲？  
是春播插秧的画面，  
还是白云深处开山造田的景象？  
是练兵场上的飒爽英姿，  
还是狠斗顽敌的愤怒脸膛？（《山乡寄语》）

(2) 一拿起枪来，就好象又要随卫主席巡视大江南北；一站到哨位上，就如同还在为主席站岗放哨；一走过主席的窗前，我们还象往日一样自然地放轻脚步，生怕影响主席的工作和休息；一合上眼睛，主席魁梧的身体和慈祥的面容就浮现在我们面前。（《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例(1)，把三个问句并列在一起，显示了几个不同的镜头，然而熔化的内容却非常丰富。画面虽然不多，却概括地说明

了作品中的“我”三年来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不断成长。并列的几项虽然是具体的事例，却充满了激情，反映了“我”在农村中自觉改造的积极态度。

例(2)，把几件事情排列在一起，既写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遍祖国大地，日夜操劳的光辉形象，又表达了战士们时刻都在缅怀毛主席的深切哀思。

上述两个排比为什么能使人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呢？这是因为排比的事例是经过精心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所以使人感到说得全面而不罗嗦，说得周密而不堆砌。

二、排比的几项之间有承接、因果等等关系，这种排比多用于说理，同时也表达感情，可以说是情理交织。例如：

(3)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建成以后，世世代代人民群众将在这里亲眼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亲身感受毛主席的教育和鼓舞。（《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仪式上华国锋主席的讲话》，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4) 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认真学习了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认真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七年元旦社论，回顾了一九七六年的战斗历程，赞颂了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愤怒声讨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一小撮余党的反革命罪行，畅谈了当前的大好形势，并联系上海郊区的实际，交流了经验，明确了任务，研究了规划。（《打一场揭发“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加快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步伐》，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文汇报》）

例(3)，“瞻仰……缅怀……重温……感受……”是承接的关系，从行动到思想感情步步加深地指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

对今后推动中国人民继续革命的重大意义。例(4),三个“学习了”和“回顾了……赞颂了……声讨了……畅谈了……”之间的关系也是承接的,这七个排比句跟后边的“交流了……明确了……研究了……”之间又有条件、因果的关系,说明了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落实了大会提出的任务。这样的排比,不但连贯畅通,步步深入,而且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对读者既能“喻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发挥了排比这一修辞方式的作用。

从表达形式来看,运用排比必须注意讲求语句结构的近似和语气的一致。拿前边的例子来说吧,例(1)中的三项排比,都是用“是……还是”构成问句,不但语句的结构相同,语气一致,而且句子的长短也较匀称。例(2)的几项排比,都用“一……就(还)”这种句式,结构相同,语气一致。而前边两项较短,后边两项较长,给人一种气势递增、感情充沛的感觉。例(3)例(4)的各项都是动宾结构,例(3)的动词不用任何辅助成分,例(4)的动词都带上“了”,句式整齐,语气贯通。例(4)最后三个承接性的排比句,都用了简短整齐的结构形式,更能显示与前面各项意义上与层次上的区别,从而恰当地表达了承接与因果的关系。

总之,运用排比,要根据表达的需要,内容应该加以提炼,形式也应进行选择。如果内容轻重不称,仅仅在形式上求其匀整,那是不可取的。例如: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残害,使他们(指鄂伦春族人民)长期过着原始的游猎生活。他们长年在深山老林,住的是十几根木杆和三、五张狍皮围成的“仙人住”,冬不挡寒,夏不遮雨,病无医药。

“冬不挡寒,夏不遮雨”都是承上文讲居住的情况,突然接

上“病无医药”，尽管在形式上似乎是排比，但在内容上跟上文连不起来。应该在“夏不遮雨”后边句断，再另外起头讲其他方面，如“吃的是……”之类，前后才能相称。



## 后 记

为了尽可能地做到通俗一些,便于自学,我们采取漫谈的方式,从具体问题着手介绍一些关于逻辑、语法、修辞方面的基本知识。采取这种方式来写逻辑、语法、修辞方面的书,我们还是一次尝试。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上钢三厂二转炉车间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上海市长江农场、前卫农场的同志,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师大中文系的同志组成的。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这本书里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逻辑语法修辞漫谈》编写组

一九七七年十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逻辑语法修辞漫谈

作者 = 《逻辑语法修辞漫谈》编写组

页数 = 187

SS号 = 10097666

出版日期 = 1978年01月第1版

## 前言

## 目录

- 一、从“经验”和“经验主义”这两个概念谈同一律
- 二、从任意转换话题再谈同一律
- 三、从一则寓言谈矛盾律
- 四、从“反动势力的捣乱和破坏是坏事，但也是好事”这句话再谈矛盾律
- 五、从鲁迅的《立论》谈排中律
- 六、从两个例子的修改谈概念的限制和概括
- 七、从对书刊的分类谈概念的划分
- 八、从张春桥的“新桃换旧符”的反动实质谈揭示概念内涵的一种方法——释义
- 九、从“这样的整顿，不正是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谈判断的多重否定问题
- 十、从叛徒江青诬蔑民歌的谬论谈判断的数量范围问题
- 十一、从“大干还是小干，这是关系到是不是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大问题”的谈判断的主宾相应问题
- 十二、从讨论种柑橘的一段话谈实然判断、或然判断、必然判断
- 十三、从“看云识天”谈推理的前提必须正确
- 十四、从三段论只可以有三个概念谈推理中的“四概念”错误
- 十五、从两人的对话谈结论超出了前提范围的错误
- 十六、从批驳“四人帮”荒谬的理论谈归谬法
- 十七、从一部小说中的一个情节谈排除法
- 十八、从衣服和炉衬谈类比推理
- 十九、从几个数字谈数词
- 二十、从解放前物价的飞涨谈量词
- 二十一、从“干净了每一个角落”谈动词和形容词
- 二十二、从“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谈名词和副词
- 二十三、从“你一言，我一语”谈代词
- 二十四、从一句话谈结构助词
- 二十五、从几条预测天气的谚语谈时态助词
- 二十六、从“呢”和“吗”的选用谈语气词

- 二十七、从“为了”同“因为”的区别谈表示目的关系和因果关系的连词
- 二十八、从“在哈萨克播种小麦而在北美洲收获”谈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
- 二十九、从句子的基本结构谈主语的省略和残缺
- 三十、从“张春桥在狂吠”谈主谓的搭配
- 三十一、从介词跟动词的区别谈谓语的残缺
- 三十二、从一副春联谈宾语问题
- 三十三、从“争夺冠亚军”谈动宾的搭配
- 三十四、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谈修饰语
- 三十五、从“把竹筏从山区经永路运到加工地点”谈“把”字句
- 三十六、从“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谈“被”字句
- 三十七、从“革命家长送子务农”谈兼语式
- 三十八、从“进”改为“蹲”谈用词确切的问题
- 三十九、从“事情”改为“流言”谈词语的感情色彩
- 四十、从铁人王进喜的一首诗谈押韵
- 四十一、从数量词的位置谈语序的安排
- 四十二、从一段话的修改谈句子的简练
- 四十三、从一首民歌谈比喻
- 四十四、从《庐山颂》的开头谈比拟
- 四十五、从鲁迅的一首诗谈借代
- 四十六、从词的多义现象谈双关
- 四十七、从高志扬的一句唱词谈夸张
- 四十八、从“情意缝在我心里”谈顺连
- 四十九、从“他信力”、“自欺力”谈仿词
- 五十、从替“四人帮”画像的几句话谈同字
- 五十一、从《国际歌》的几句歌词的重复出现谈反复
- 五十二、从刘禹锡的一首七律谈对偶
- 五十三、从感情、气势的表达谈排比
- 后记